

市委书记林峰海谈史志工作

刘爱军主任来临沂对史志工作进行调研，这不仅对临沂市的史志工作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而且对全市各项工作也是很大的促进，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刘爱军主任这次调研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了解史志工作的难得机会。刚才，朱海涛同志汇报了我市史志工作情况，刘爱军主任对我们的工作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做好史志工作提出了符合中央、省里要求和临沂实际的部署，我完全赞同。借此机会，我谈几点想法：

一是临沂史志工作成果丰硕。近年来，在省史志办的关心指导下，经过史志系统同志们的辛勤努力，临沂史志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全国、全省一系列荣誉称号。对此，市委、市政府给予充分肯定。

二是史志工作非常重要。刚才，刘爱军主任讲了中央、省委省政府领导对史志工作的评价，讲得非常好。通过今天的座谈，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对史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史志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基础，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最规范的工具和载体，在修志存史的过程中，起到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是支持一个地方、一个行业发展的正能量。前两天我去河东区调研时了解到，明朝沂州知州李萼在任时，为民谋利，挖了南北走向的排涝渠，后人为了纪念他，将排涝渠叫作李公河，现在传承下来，对我们后人是一种教育、一种示范。归结起来，史志工作是推动地方各项工作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是做好史志工作需要奉献精神。从事地方史志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忠于历史、忠于事实。汉司马迁作为史学祖师，身受腐刑，仍坚持实事求是，编著完成《史记》。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也正是得益于这样一些史志人一代代记录传承下来的。做好史志工作需要奉献精神，还需要极高的文化

素养，史志办同志们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可以说，临沂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也有史志办同志们的一份努力与贡献。

四是史志工作大有作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实。正如刘爱军主任所说，临沂文化底蕴深厚，我们发掘独特的沂蒙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另外，史志工作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中央提出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家都能够接受，而且好多都是通过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潜移默化接受的。所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渗透到每一个民众的心里，史志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史志工作也是人才成长的摇篮，做好史志工作不仅要耐得住寂寞，付出辛勤汗水。具有很高的文化涵养和良好的作风素质，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只要做到了，就可以大有作为。

五是要开创临沂史志工作新局面。刘爱军主任百忙之中来临沂调研，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为我们下一步做好史志工作指明了方向，也给了我们做好工作的动力，我们要以刘爱军主任这次调研为新的起点，不断开创临沂史志工作的新局面。

就下一步如何贯彻落实刘爱军主任的要求，全力做好临沂地方史志工作，我提几点要求：

第一，要以新常态、新时期的要求思考、安排史志工作。一是立场要正，做好工作立场很重要，要立足党和人民的利益、以唯物主义的立场做好史志工作；二是角度要准，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是效果要好，史志工作最终是要为现实服务，要注重社会效果。

（下转42页）



2015 · 05, 3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刘振本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刘振本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高来臣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墨宝鼓雄风
 ——记舒同为临沂史志题字 张秀岳 04

【峥嵘岁月】

蒋介石与台儿庄大战 《黄埔》,2013,02 06

被人误解的一场谍战
 ——记山东隐蔽战线上蒙冤的英雄们 靖一民 09

抗日烽火中的地下党员王从照
 王廷春口述 李祥瑞整理 14

我的抗战记忆 尹建珍 19

【名人素描】

玉碎沂蒙之二：刘震东 国 英 23

萧统与《昭明文选》 青衣问道 27

【探索发现】

范十隐居何处 平 凡 31

抗战文物之一——
 《山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 高 昂 33

【文化掇英】

我跟宋式云先生学国画 涤雪楼主人 34

【蒙山沂水】

古沂城位置考 虚静斋主人 40

“东莞”地名南迁与青、徐士族南渡（四）
 李 泮 43

【史料辑存】

- 祸害沂蒙山区的伪军序列 大荒堂主 50
王小古年谱(续) 刘瑞轩 55

【影像沂蒙】

- 沂蒙革命根据地略影——巾幗铁流(四)
海 涛 高 雷 国 英 59

【史海撷萃】

- 羊祜攻心破东吴 轻拨雨弦 62

【诗画赏析】

- 抗战歌曲选——《军民合作》 本 编 66
东汉平莒男子宋伯望刻石 叶克勤 68

【百家渊流】

- 姓氏百家漫谈——徐姓(上) 赵丹峰 70

【沂蒙名医】

- 站起来能站多高 走起来能走多远
——吴东心路探 惠东波 73

【沂蒙乡亲】

- 矫力鸣：决胜在特殊“战场”
——记解放军军事体育运动大队原副大队长矫力鸣 呼国英 78

【史志动态】

80

封面：《山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

(封面文物介绍见本期《《山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

封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墨宝鼓雄风

——记舒同为临沂史志、博物馆、沂蒙之光题词

张秀岳



舒同挥毫书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勉临沂史志工作者”（张秀岳/摄）

1985年5月，在北京采访期间，我有幸三次拜访了中顾委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原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舒同同志，亲眼目睹了这位蜚声中外的“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支笔”，为勉励沂蒙老区革命文化建设题书的情怀和风采。

手捧“影集”忆峥嵘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来到了军事科学院舒老的住处。舒老正置身在院内幽静的花园里修剪花木，听说我是来自沂蒙山区的史志工作者，格外高兴，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寒暄完之后，把我们引进了他的客厅。

舒老腰板挺直，面色红润，目光深邃，声音洪亮，精力旺盛，一点也看不出是位八旬的老人。我们把向康矛召、杨玲征集的30幅历史照片贴成一本“影集”，呈现给舒老看。那一幅幅激动人心的瞬间场面，即刻把舒老的思绪带进了当年浴血奋战的沂蒙山区。过了好久，舒老才从对往事的沉缅中摆脱出来。当他得知我们在京已采访了十几位老同志，收集了上百幅历史照片，征集了黎玉、李澄之、管易文等曾经战斗在沂蒙山区的老同志的十几件



革命文物时，便高兴起来。他郑重地叮嘱我们：“这些历史照片是战争年代党在沂蒙山区领导革命活动的形象纪实，生动感人，激人上进，宝贵得很呐！你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代表老同志感谢你们！你们回去后要很好的发挥它的宣传教育作用，使其充分地为宜蒙老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我本想向舒老征集一些史料。舒老的夫人王云飞同志告诉我们，舒老战争年代在沂蒙山区的文物和照片，在十年浩劫中荡然一空。我提出了请舒老题字的要求，舒老欣然允诺，请夫人王云飞安排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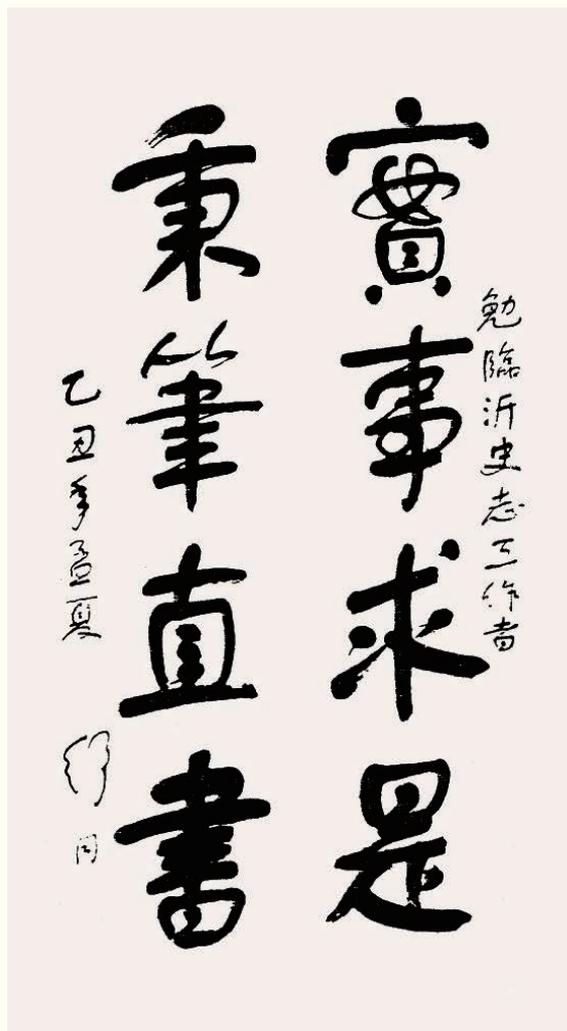
挥毫题书寄深情

5月19日，我接到王云飞的电话通知来到了舒老家，在宽大书桌上公务员小邓早已磨好了墨，铺好了宣纸。舒老戴上套袖，坐在案前，展笔濡墨，凝神静思之后，便挥动大笔写起来。他先写了一幅《临沂市文物志》书名。写完后端祥了一阵，不太满意，又重写了一幅。这才高兴地说：“临沂的文物志可大有纂头噢！有世之珍奇竹简《孙子兵法》，有名扬神州的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有洗砚池、五贤祠、集柳碑，是个名胜众多、文人荟萃、英雄辈出的好地方噢！在现代革命史上也大有名气哩！”随之又问：“这部志书谁来编纂？”我说：“由临沂市博物馆负责。”舒老听后高兴地自语：“临沂市有了博物馆喽！”随即从笔筒里取出一支大笔，泼墨挥毫，“临沂市博物馆”几个大字被舒老一挥而就。接着又铺开一张宣纸，题写了一幅“革命文物陈列室”扁额。

这时不知不觉到了晚饭时间，人们催促舒老休息吃饭。谁知舒老酣意正浓，毫无倦意，又铺开了一张六尺宣纸，凝思片刻，立起身来，提笔悬腕，奋笔疾书，题写了“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大字条幅。上款为“勉临沂史志工作者”，落款是“乙丑年孟夏舒同”，并在条幅由右上角钤盖“舒同八十岁书”长方印一方，左下角落款钤盖“舒同之印”方印一方。舒老书写这幅题词是饱含着感情的，他信笔直书，情绪激越，毫无修饰，一气呵成。

我为亲眼目睹这位当代书法大师为临沂挥毫题书备感荣幸。他那从容老到的神态，那潇洒自如的动作，那老辣娴熟的笔法，令人感叹不已。更为令人敬佩的是他那渗透于笔墨之中的革命热情。我一面从旁拜观，一面用相机把舒老为临沂题书的宝贵瞬间永远珍藏下来。

我们和舒老共进晚餐。王云飞同志向我们介绍说：“舒老对来自沂蒙老区的求书者特别优待，无论工作多



繁忙，总是有求必应。”舒老刚刚写完的四幅作品，正是舒老对沂蒙老区寄托情怀的一种最好体现。诗人“缘物寄情”，书法家亦是如此。舒老墨宝，寄托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沂蒙人民的深情厚意。

用书法激励人民，推动工作，这是舒老的一贯做法。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为沂蒙人民的题字题词。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滨海军区编的《滨海八年》一书上题写了“我们要有更多更多的战斗、生产、学习、拥军模范来巩固胜利，加强解放区建设。”对鼓舞沂蒙军民参军参战，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临沂兴建烈士陵园，他特意为陵园书写了门额和题词，以激励后人缅怀先烈，继承革命传统。

用书法艺术推动工作，这应该说是舒老的一个创举！

蒋介石与台儿庄大战

《黄埔》，2013，02

1937年12月23日，日军西路矶谷师团大举南侵。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畏敌如虎，望风而逃，失陷济南后又连连丢失泰安、大汶口、兖州、曲阜、邹县，日军兵临滕县。与此同时，日军东路坂垣师团在占领青岛后，沿胶济铁路西进，逼近临沂。

面临如此危殆的军事局面，1938年1月10日、11日两天，蒋介石在开封召开了第一和第五两个战区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新的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为了巩固武汉，决计要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线上抵死固守。会上蒋介石作长篇发言，阐述了徐州会战的三个基本方针：一、坚持持久消耗战；二、攻势防御战略；三、在敌后发动游击作战配合正面战场的战



蒋介石（右一）
与白崇禧（左一）在
台儿庄战场

略。另外，还提出要整饬军纪，提高指挥水平，加强后勤保障，加强对敌人的攻心战。开封军事会议上重申奖惩例要，要依例执行。有功者赏，有罪者罚，而且要赏自下始，罚自上起。哪一支部队未奉命就撤退，一定要罚办长官，绝不徇情。对畏敌怯阵者，蒋介石大声疾呼：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如再不铲此种保存实力的落后思想，洗刷这种卑鄙无耻的亡国心理，还要拥兵自重，就一定要重蹈东北四省伪军的覆辙，要被敌人压迫来毁灭祖宗的庐墓，残杀我们自己的同胞，绝灭我们自己子孙的性命。真是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比奴隶牛马还不如。

1月11日逮捕了违抗军令的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1月20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公布抗战以来奖惩将领名单。明令嘉奖者6人，受惩者41人，处死刑者8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韩复榘。

1月底，蒋介石用了三天时间召开参谋会议，专门研究战术问题。29日，蒋介石专门作了一个题为《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重申要变更抗战策略，改守为攻，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游击战的新战略。

3月中旬开始，发生了以台儿庄之役为中心的徐州会战。在徐州会战过程中，蒋介石直接参与了战役指挥。在几次关键时刻，蒋介石都亲临前方视察，指示机宜。

3月24日，当台儿庄激战开始时，蒋即赴徐州视察督导，返回时留下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高级参谋王鸿诏组成参谋团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3月27日，当日军增兵鲁南，战事趋向激烈的时刻，蒋介石亲赴前线车辐山车站，并去台儿庄南站观战。李宗仁劝阻说，委员长之安全系全国长期抗战之成败，万万不可在此久留。蒋介石说：王铭章师长与全师在滕县壮烈殉城前，我痛惜未曾与之谋面，今池师长又将及生死关头，我既来此，不可却步。蒋终于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陪同下去台儿庄南车站会见了池峰城，这使池惊喜有加。蒋拉着池的手说：你的长官说你是忠勇、精干兼备之人，今天看来此言不虚。池说：我师绝对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蒋对池嘉许、勉励一番，挥手告别。

蒋介石亲自参与大战的指挥活动，主要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调配兵力。统帅部从其他战区陆续抽调部队支援第五战区。如调于学忠部、张自忠部、孙连仲部、汤恩伯部、邓锡侯部、孙震部到前方第一线；调卢汉部、樊崧甫部到徐州；调李汉魂、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到豫东开封、归德陇海线。孙连仲所部第二集团军、汤恩伯所部第二十军团，是台儿庄战场的两支主力军，都是战前由第一战区调入。战区与支援部队间出现了意见分歧，均由蒋介石权衡决断，妥善解决。除各战区支援协同外，蒋介石还指令空军部队配合第五战区作战。当时国家的空军力量很有限，在全国各战场上不敷分配。2月17日，津浦南段作战开始后，他给航空委员会代主任黄光锐手令，指示周家口、归德、合肥、徐州各机场应准备三日的油弹量，以备在河西岸蚌埠附近作战。后来中国空军多次轰炸淮河敌军阵地，使淮河阻击战得以成功。3月25日后，中国空军多次飞临莒县、临沂、滕县、峯城、枣庄、台儿庄轰炸，配合地面行动作战。3月28日，台儿庄各战场鏖战正酣之际，因临沂吃紧，蒋介石命令第一战区派兵增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急派在开封驻守的李兆镛所部第一三九师火速赶赴临沂，解救危局。

二是指导作战，部署战略配合。徐州会战主要由第五战区承担作战任务，由李宗仁具体指挥。会战中，有关敌情、战况，战区均向最高统帅部报告，有关战略方针、战役部署、战斗方案，战区均需请示并执行统帅部的指令。战区的作战计划、部署均需报蒋介石审查批准，由蒋介石签署批准意见或发出修正命令。

为防止日军大量抽调他处兵力增援台儿庄战场，1月29日，蒋介石电军令部部长

徐永昌，命第一、第二、第三战区同时对敌出击：第一战区向津浦北段的德州、沧州等地攻击，第三战区向湖州、嘉兴、芜湖等地攻击，第二战区利用优越态势极力反攻，收复晋省。各地游击部队都应明确目标，捕捉战机，极力活跃，痛击敌人而配合鲁南作战。台儿庄大捷后，4月14日，蒋介石又亲自致电程潜、阎锡山、薛岳、李品仙、蒋鼎文、朱绍良等各战区司令长官，令采取积极行动，牵制日军，配合鲁南作战，使之无力抽调兵力，增援鲁南。所以，陈诚说：“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

三是督令攻战。台儿庄大战期间，蒋介石亲自电令前线部队进攻作战的次数很多，这里仅举几例。

3月17日致李宗仁、庞炳勋、张自忠电：……仍须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如敌逃脱，须跟踪猛追，创开战以来之歼敌记录，藉振国军之气势，有厚望焉。

3月19日致电孙桐萱、曹福林部：希贵部神速行动袭敌侧背策应正面之作战，以期各方面确切协同，一举歼灭敌人，挽回国军全盘之战势……

3月21日致李宗仁并汤恩伯电：对津浦北段之敌决依20、21令围攻聚歼之。

3月29日，林蔚转述蒋的电令：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存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罚，即李长官、白副总长、林次长亦有处分。

4月1日致李宗仁电：倘兵力不足，可用援军，并须注意步、炮协同。同日致张自忠电：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应速派有力之部队向向城之敌猛烈追击，免致台峰之敌以届聚歼之时再行脱逸。事关抗战前途甚钜，务希努力为要。

4月5日致汤恩伯电：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应严督各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毋负厚望。有无把握，仰即具报为要。

显然，蒋介石对核心阵地战事的进展，感到不甚满意，此电令既是斥责汤恩伯，亦是斥责李宗仁。次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向蒋明确答复：已严令并督饬各部队于最短时间歼灭台儿庄附近之敌矣。

8日，蒋介石致电曹福林：台儿庄方面之敌迄7日拂晓已歼灭过半，开始北溃，除严令各军穷追外，着贵部迎头猛攻，以期一举歼灭。

9日，李宗仁致电蒋，说他已于8日晚抵台儿庄，将战况作了一个综合报告。蒋回电下令对逃窜之敌“各军分途追截务期歼灭”，“饬令所属地方武力协力截击”。

4月12日致李宗仁、白崇禧电：台儿庄之捷已逾5日，峰枣韩临尚未攻下，踌躇审顾，焦虑至深。以乘胜之军更加主力部队追逐援绝溃急之寇。不急限期消灭，一旦敌援赶至，死灰复燃，是无异堕已成之功而自贻将来之患，万望激励将士，努力进攻，一面分途堵截，庶敌兵再至，我更有以待之。

4月13日致孙连仲、汤恩伯电：仍盼督部迅歼残敌，限两日内攻下峰枣。

以上数电也证明了蒋介石殚精竭虑在部署“决以机动防御及运动战击灭敌人，在鲁南发动凌厉攻势”。在督促前线攻战过程中，充分贯彻既定的攻势防御方针。

被人误解的一场谍战

——记山东隐蔽战线上蒙冤的英雄们

靖一民

在大青山突围战中，有一位名叫马楠的女八路，她是山东分局机关党总支书记，在跟随战友们突围时，左手腕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因流了很多血，实在跑不动了，只好找地方躲藏起来。可敌人还是顺着血迹找到了她，把她押送到鬼子据点里。她宁死不屈，借去厨房找水喝之机，摸起菜刀砍向了自己的脖子……但她没有牺牲，而是被日军宪兵甲部队1415部队队长武山英一带回济南，试图用所谓的怀柔政策感化她，让她为日军服务。

到了济南后，武山英一先安排马楠去医院治伤。可此时的马楠已抱定了牺牲的决心，并不愿意去医院，而是用戏谑的口气说：“你如果真想帮我，就让我去有眷属的人家住。在那里有人照顾，我会很快好起来的。”



济南日本宪兵队

没想到，武山英一果然满足了马楠的要求，把她送到芙蓉巷13号，那里住着蒋光野、丁洁夫妇。这两个人原为中共驻冀南根据地工作人员，被捕后双双投敌叛变。武山英一把马楠交给他们看管，就是想让马楠也能受他们的影响，投靠日军。

马楠是个革命意志坚定的人，她住进蒋家后，曾几次想逃跑都没有成功。这期间，她认识了一个名叫孟昭成的人，虽然只有15岁，却是一位热血青年。马楠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少年，经常讲抗日故事给他听，使得孟昭成开始向往参加革命，并愿意帮助马楠做些事情。后来马楠逃出，果然是这个中学生起了重要作用。

在马楠被捕的同时，还有一位名叫李澄之的重要人物也被日军活捉，他就是山东省战工会的副主任（相当于后来的副省长）、山东省国民党抗日同志协会的会长。日本人在沂蒙山区俘获他之后，也把他押解到济南，由宪兵队看管。武山英一抓到了这么重要的人物，如获至宝，用尽各种办法劝说他，想让他归顺日军，担任伪山东省的代省长。可李澄之却对日本人的“好意”嗤之以鼻，大义凛然地说：“杀了算啦，少废话！”武山英一自然不会轻易杀他，而是将他关起来，慢慢想办法劝降。

李澄之、马楠的被捕，惊动了沂蒙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一天，山东战工会的领导正在开会研究如何解救李澄之，没想到李澄之的弟弟李涛（又名李亦豪）闯进了会场，主动要求去济南营救哥哥。会议批准了李涛的请求，为他筹备好活动经费后，即送他离开根据地。

1942年2月，李涛携妻子张茜琳到达济南后，以药商的身份作掩护，在东关七家村殷若庵27号租房住下，便四处探听李澄之与马楠的状况。等到掌握了基本情况后，他于5月末又回到根据地，直接向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作了汇报。朱瑞对他的营救工作进展情况很满意，给了他40万元法币做活动经费，派人护送他回济南。临走时，山东分局宣传部长陈沂特别委托他，“要照顾”马楠，设法把马楠一同营救出来。李涛满口答应着，表示愿意把营救马楠“当作党的第二任务来抓”。

谁知，李涛回到济南与马楠接头时，被日军特务郭同震盯上了。按说，这时李涛应尽快撤出济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可他再三斟酌后认为，就这样回根据地，没法向领导交待。况且，此时郭同震仅是怀疑他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尚未对他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如果他这个时候离开济南，不仅自己完不成营救任务，而且还会因为他的出逃引起敌人的注意，将来再派别人营救李澄之和马楠，会更加困难。因此，他决定冒险留在济南，想办法完成营救任务后，再作打算。

怎么才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救出自己的战友呢？李涛想起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语，他深深懂得，必须接近日军驻济南的最高长官，才能有实施营救行动。恰在这时，他听说曾与哥哥李澄之共过事的王伯平得到日本人的赏识，担任了伪社会局局长。虽然此人是个汉奸，但可以利用他接近日军高层人物，所以李涛便主动出击，去拜见这位哥哥的老熟人。当王伯平得知李涛是李澄之的弟弟时，对他十分热情，爽快地应允愿意帮助李澄之的逃脱宪兵队的控制。

可怎么才能使李澄之逃出武山英一的魔掌呢？李涛听王伯平说，由于武山英一是“主战派”，而木村义明是所谓的“主和派”，他们对待战俘的处理意见经常产生分歧，如果能利用好日军内部的矛盾，就有希望救出李澄之和马楠。于是，李涛请求王伯平帮助自己，尽快认识木村义明。王伯平想了想说：“那巧了，我还欠木村的一个人情，正准备请他吃饭，到时你也参加吧！”

数日后，王伯平在当时济南最高级的泰丰楼宴请木村义明，李涛也应邀赴宴。席间，在王伯平的热情推荐下，李涛结识了木村义明。当木村义明得知李涛与李澄之的关系时，他喜出望外，因为他对李澄之已有所了解，正想从武山英一手里把他要出来，由他亲自掌控，梦想着劝降后让其为“主和派”效力。因此，当李涛提出让木村义明关照哥哥时，他不仅满口应允，还希望李涛能与他的哥哥李澄之一同创建一个类似北平“中国革新同志会”那样的

反动组织，借此推行所谓的“革新运动”。

李涛以他做地下工作特有的敏锐性，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契机。如果能成立一个政治立场较中性的组织，不仅可以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深入敌人内部，得到重要情报，也会有更多的机会营救李澄之、马楠。本来，他应该把这一重要情况向山东分局领导汇报，得到组织批准后才能进一步与日军接洽。可他没有办法及时与根据地取得联系，又不愿错失良机，就决定“先斩后奏”，答应了木村义明。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决定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难以摆脱的祸根。

经过与木村义明反复协商，李涛组建了一个叫“中国青年协会”的组织，于1942年8月1日公开挂牌宣告成立。因为办公地点设在朝阳街21号，又称“朝阳公馆”。“青协”成立不久，李涛就向木村义明提出，如果能把李澄之从宪兵队要出来，让他成为“青协”的成员，这个组织会更有号召力。木村义明认为李涛的提议很好，立即给日军总参谋部打了报告，请求将李澄之移交给他。得到批准后，他派人把李澄之从宪兵队接了出来。李澄之摆脱了宪兵队的控制后，可以在城里自由走动，为逃回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接着，李涛又想办法让马楠经常参加“青协”的活动。她虽然仍由宪兵队看管，但碍于木村义明的淫威，武山英一也不好阻止她参加“青协”的活动，只好给予她部分自由。

李涛知道，现在营救李澄之、马楠的时机已成熟，可他又不敢擅自行动，担心出意外，想派人去山东分局汇报济南的情况，请示什么时候护送李澄之、马楠逃出济南城。可派谁去呢？李涛与李澄之、马楠反复商量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最后马楠忽然想起了那个对她十分崇拜的少年孟昭成，他此时已在马楠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遂决定派他去根据地汇报情况。孟昭成果然是位英雄少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几经周折，圆满完成了任务。这之后，他便成为李涛与根据地之间的联络员，为营救李澄之、马楠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李涛有了孟昭成的帮助，与组织的联络就方便多了，他在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宣传部长陈沂等领导的直接指挥下，不仅顺利救出了李澄之、马楠，还利用“青协”救出了30多位我方被俘人员，并动员100余名进步青年奔赴根据地，走上了抗日之路。

毫无疑问，对李澄之、马楠的成功营救，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地下工作者对敌斗争取得的辉煌胜利！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没过多久，有人就开始质疑这次营救行动有被敌人利用之嫌，不仅没嘉奖参与营救的有功人员，而且还怀疑他们通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遗憾的冤案……

1943年元旦期间，天气格外寒冷。但李涛的心里却暖暖的，因为他成功营救了李澄之和马楠，还没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是一次大胜利。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是撤离敌占区，还是继续在济南潜伏？他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便派了两个人去山东分局向领导请示。可没想到，这两个人到了根据地后，却被山东军区保卫部扣押了。他们让这两个人老实交代：“日本人把李澄之放回来，是想干什么的？”这两个人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然无法回答，被训斥了一通后押送出境，并明确交代：“以后不准再联系！”

李涛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误会，就再次派了三位地下工作者去山东分局作解释，要求“恢复关系”，但又被军区保卫部的副部长杜明训斥了一顿，驱逐回来。自此，李涛莫名其妙的被切断关系、彻底抛弃。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1943年末到1944年春天，山东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由于声势浩大，个别人吓破了胆，为保命开始编造谎言，甚至诬蔑他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有人对李澄之、马楠被营救回根据地的问题产生了质疑，认为李澄之、马楠之所以能活着回到根据地，不是被李涛、孟昭成等人成功营救出来的，而是敌人在耍弄“放长线钓大鱼”的诡计，故意释放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才切断了与李涛的联系，并开始对相关人员进行审查。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已回到根据地的孟昭成。他在《清扫抗日战争中山东三大案的迷

雾》中，曾记述了对他的“审讯”经过：“1944年暮春，我在滨海区山东抗战建国学校学习，就被山东军区保卫部逮捕扣押。在杜明副部长严厉反复的审讯中，我如实陈述经历，只能提出‘以人格、人头担保自己的真实’。”当时，孟昭成只有17岁，但每次提审都有大批人员持枪押解，且全部扳机拉栓、子弹上膛，那阵势像是对待重要犯人。甚至，还屡次恫吓他，如不老实交代通敌详情，就难保性命。孟昭成虽然年龄不大，却没被吓住，坚持不作假供伪证，实事求是的向组织汇报他参与营救李澄之、马楠的经过。

这时，延安的“抢救运动”波及山东，沂蒙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坦白运动”。二月初，山东分局直属机关在驻地召开了三天的“坦白反省大会”，有26人因坦白反省了各种问题，被当场宣布免于处分。或许是受此影响，孟昭成的哥哥孟昭毅也在会上“坦白”了十几个小时，他说：自己在济南时，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干了特务，并派他监督战俘马楠。这期间，他向日特报告说，其弟孟昭成受共产党指使正营救马楠等人。日特便将计就计，对孟昭成、马楠等人不捕而放，借机派自己随马楠等人潜入根据地，寻机打进山东分局城工部，找机会把济南、青岛的地下党一网打尽。孟昭毅当时在《大众日报》担任编辑，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的“坦白”可谓石破天惊，全场闻之无不震惊。

孟昭毅“坦白”时，他的弟弟孟昭成也被两个侦察员押着，坐在人群中“听会”。孟昭成不知哥哥为什么会如此“坦白”，凭着他对哥哥的了解，他知道这些内容都是哥哥编造的，因为他从没将营救李澄之、马楠的方案告诉过哥哥，孟昭毅并不知情，怎么可能告密？第二天，孟昭成莫名其妙地被解除了禁闭。临放他之前，杜明给予他的结论是：“你和那些人不一样，你年幼单纯，为营救李、马做了工作，但也受骗。”尽管这个结论仍与事实有差距，但不再把孟昭成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他已经很知足了。因为他知道，再过多申辩也无用，许多事都需要时间、证据来澄清自己的清白，他只能耐心等待。

孟昭成获得自由后，立即去找到哥哥孟昭毅，质问他为何说假话？孟昭毅叹着气说：“我被关禁闭后，就被戴铐，轮番审问，不能睡觉，还要枪毙。所以，我只能说假话，才能摆脱现在的困境。”

尽管孟昭成对哥哥的怯懦很反感，也不好过多责备他。只是，哥哥编造的这些谎言虽然暂时帮他恢复了自由，可是后患无穷。当时的大众日报社就受孟昭毅“坦白”的影响，把姚明、于渤、艾森等一批从敌占区来的青年列为审查重点；后来给李涛、孟昭成等人定罪，这更是重要依据。

在营救李澄之、马楠行动中立下第一功的李涛，更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在营救行动结束之后，他就一直被当作“日特”对待，组织上不再与他有任何联系。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地下斗争，又为冀鲁豫边区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45年10月，他被日本军统特务追捕，才不得不离开济南，携母亲和怀孕的妻子回到了临沂。

李涛回到根据地之后，就被山东军区保卫部看了起来，开始对他在济南三年的历史进行全面审查。经过长达一年的审查，不仅没有查出任何问题，还把他为党做的好事一件件都落实了，认为他是一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这时，侵华日军已经投降，济南被国民党接管。受组织委派，李涛再次化名黎浩潜入济南，但很快就被人告密，遭拘捕后押在国民党的“青训队”里。半年后，有个叫董淑明的叛徒出任国民党中统山东省书记，他看了李涛的档案材料后认为此人可用，便派李涛回解放区，试图让李涛为他们做些工作。李涛借机将计就计，不仅顺利回到了解放区，还带回了一批西药、电线电表等紧俏物资，并如实向组织上汇报了敌人派他回解放区的目的，还写了《敌情报告》，列出了他所知道的国民党特务名单。

1948年7月7日，李涛被扣押在惠民，由山东分局社会部副部长扬帆负责审查他的情况。但扬帆尚未给李涛做出结论，就被调离了山东，只好把对李涛的审查移交惠民公安局办理。本来，李涛在敌占区的情况不难查清，可因为他是扬帆让扣押的，扬帆不表态，无人敢释放。就这样，李涛被稀里糊涂的扣押着，直到济南解放时，他不仅没被释放，还被五花大

绑着押送到济南市公安局看管，竟然在监狱里一蹲就是10余年。1960年10月，以李涛曾在济南组织过“中国青年协会”为由，把他定为日本特务、反革命分子，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李涛自然不甘心蒙受冤屈，不屈不挠地申诉了几十年，终于惊动了国家安全部。安全部曾派出两位司局级干部在山东调查了近一个月，最后得出结论：“李涛是冤案。”但不知为什么，即便如此，有关部门仍坚持不给李涛平反。

1995年1月18日，李涛病危住院。国家安全部得知后，即派山东省安全厅的一位处长携价值数百元的慰问品和2000元现金去医院探视慰问。不幸的是，1995年2月24日，李涛终未能盼到给他落实政策，含冤而逝！临终前仍喃喃自语：“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是特务；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反革命！”

一位一生忠于党、忠于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卓绝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地下工作者，就这样含恨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扼腕唏嘘！

前面已经谈到，那位两次出入敌人封锁线，参加营救任务的少年英雄孟昭成被审查后，虽然恢复了工作，有人还是认为他虽然没有当日本特务，但他是“被敌人利用的”人，“是敌人的人”。这个推理出来的结论，成为他一生都难以摆脱的阴影，在后来的“反右”“文革”中，他都因此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妻子与他离了婚，儿女们也不敢认他这个有历史问题的父亲。1980年，已经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马楠，专门写了《证言材料》，证明在营救她和李澄之的行动中，孟昭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可就如同没有人理会李涛的挣扎一样，孟昭成的冤情仍然迟迟得不到澄清。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受孟昭毅假“坦白”的影响，不仅使李涛、孟昭成蒙冤，而且那些得李涛的帮助、从济南奔赴根据地参加革命的上百名进步青年，不管和“青协”沾边不沾边，都被当作特务怀疑对象，受到程度不同的审查，终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污点，有的人还因此丧失了性命。

历史，把滔滔黄河的水都搅浑了；若想把这混浊的河水澄清，真比登天还难。但乌云把太阳遮挡的再久，也难以遮蔽阳光的辉煌。经过当事人几十年不断地申诉和斗争，先是李涛的冤案，在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的直接干预下，于2002年1月11日得到平反昭雪。此时，李涛已蒙冤50多载，逝世7年之久。尽管如此，当国家安全部得知李涛被宣判无罪时，还是当即拨款5万元，对李涛的亲属进行抚恤慰问。

两年后，山东省委组织部又下文为孟昭成等人平了反，承认李澄之、马楠是被我地下工作人员“成功营救”出来的。在营救行动中，李涛、孟昭成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很大贡献。”至此，这桩山东抗战时期最大的冤案得到彻底纠正。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重提这桩隐蔽战线发生的历史疑案，并非仅仅是为了破解马楠的被救之谜，而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会付出怎样的牺牲，这牺牲不仅是献出生命，也包括自己的名誉和遭受的委屈。正因如此，我们除了应给予他们崇高的荣誉外，还要以敬仰之心向他们致敬！因为，新中国的诞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他们也曾用鲜血和生命染红过五星红旗的一角！

抗日烽火中的地下党员王从照

王廷春（87岁）口述 李祥琨整理

我的父亲王从照193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联络员。抗日战争中，父亲带领我们全家人掩护地下党、八路军伤员，参与了许多次战斗。他的抗战经历，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继承革命传统，永远跟党走。

一、监狱中由谢辉介绍入党

父亲王从照1909年出生于莒南县板泉镇后武阳村。村子南边，有一条小河，两岸树林茂密。小河南边一片丘岭，与临沭县交界。这一带村庄稀疏，中间有一座石山（现在山已挖没了），山上长满树木，此处成为抗战时期党组织秘密活动的地方。

父亲从小受传统文化教育，勤劳善良，思想进步。早年父亲和母亲靠烙



王廷春、王廷莲兄妹正在回顾父亲的革命事迹

煎饼、炸油条做小买卖维持生计。看到百姓遭受土匪和反动官府欺压剥削，就产生了革命思想。

那时候，父亲经常到板泉镇和周围各村做买卖，还到远处的筵宾、大店与临沭韩村，临沂洪瑞、程子河，以及江苏黑林等地买粮卖货。有时与朋友聚在一起议论起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土匪横行欺压百姓的现象，都气愤不平。他与周边养鱼池村杨开机、大薛家村薛汉鼎等人，及渊子崖、刘庄等村的朋友，常常一起议论如何反抗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剥削压迫。

1932年后，共产党组织在板泉秘密活动，父亲与地下党员薛汉鼎等人关系密切，成为党组织的外围人员。他以卖煎饼、油条的身份作掩护为党传递情报，我家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父亲担任情报联络员，代号“309”。

一天，父亲和几位朋友在一起秘密商量怎么对付土豪劣绅，被坏人发现告发了，父亲被抓进国民党监狱，罪名是反国民党政府。父亲在临沂城国民党监狱里面受尽了非人的酷刑和折磨，导致双眼失明。国民党官府逼迫父亲说出他平时和谁在一起，准备干什么，有什么密谋。父亲都拒不招认。同时被抓的还有艾义三、王桂芬两人。由于受刑，浑身伤痛，眼睛病得厉害，每到吃饭时自己不能起来拿饭。此时狱中有一个青年名叫谢辉，经常帮着拿饭递给父亲吃，后来得知他是地下党员。当时关押的人特别多，有时一天只给送一次饭，且很少，根本吃不饱。谢辉经常给父亲讲一些革命道理。

父亲在狱中三天两头受敌人严刑拷打，但他视死如归，只字不说，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就是撬不出来半个字。

在监狱中，父亲经谢辉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同时还有艾义三、王桂芬两人。谢辉是党的领导人，受刑特别严重，满身是伤。后来，他被营救出狱。

1934年春，在被敌人关押折磨了两年多后，父亲被党组织营救出来。由于在狱中受酷刑和恶劣的条件，父亲伤病缠身，双眼基本失明。出狱之后，由于缺医少药治疗不及时，双眼没有恢复，左眼彻底失明了，只能靠右眼模糊地看东西。后来，村里人都不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瞎子”。这年我6岁，因家乡不太平，父亲带我去青岛谋生。有一天看到一个路警被日本兵刺了几刀，流血不止。父亲赶紧找了一辆平板车把他送到医院，救了他一条命。警察局为感谢父亲，给了几块大洋。我父亲在青岛待不下去，就用这点钱作路费又回到了家乡。

1938年4月，日军攻打临沂，我父亲在国难危亡中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他按党的要求，在农村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其中有王廷生、王从兴、王全德、王从理、王廷昌、王从香（女，唐武阳村）等人。

二、抗日烽火中传递情报

父亲出狱后，仍利用卖油条身份继续到各个地下党联系点送情报。

1940年农历八月十八，八路军山纵二旅五团攻打凸凸凹村（今名于家湖村），父亲以便衣身份参加了战斗。他和薛汉鼎、丁兆瑞（高榆村）、严东位（严家围子村）通过地下工作关系，劝降了坊庄的土顽头子郭希武，为八路军解放凸凸凹、三义口、坊庄等地，开辟沭水县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此后，沭水县长王子虹，书记吴镜及其妻赵廷云、武装科长赵民三、司法科长刘子峰，还有女干部谢英、肖黎、纪兰君、魏启贞，武阳区委书记张秀坤等人经常住我家。

1943年后，八路军一一五师驻扎莒南，我村驻一个团，团部住王廷秀家。

经军队医院治疗，父亲身体有所好转。联络面更广了。父亲与驻大店一一五师

情报人员吴建辉（四川籍，装扮成卖布商人）相识，以后经常往部队运送油条、煎饼食品等，以此作掩护传递情报。一一五师部队进驻渊子崖村时，父亲经常为部队送食品，司令部的人员非常热情，遇上吃饭时就让他一起吃。

有一次，父亲赶着毛驴，驮着两筐油条，里面藏着土炮弹，秘密送往八路军营部。走到中途，被巡逻的两个鬼子发现了。他们上前搜查，发现了炮弹，就毒打父亲，问这些炮弹从哪里来的，要送往什么地方。父亲一口咬定说是在路边捡来的。鬼子半信半疑，但在询问和搜查后，未发现这个土巴巴的乡村人可疑处，于是，把毛驴油条竹筐没收，让父亲一起去见鬼子军官。父亲一看，知道去了凶多吉少，有可能回不来了。就趁鬼子吃油条的时候，飞快向路边高粱地里跑去。鬼子发现后立即追赶，在高粱地里转悠一阵没追上，就放了两枪。此时父亲已经跑到树林里，侥幸脱险了，但毛驴筐子土炮全被鬼子没收了。父亲心痛极了，忘记了自己身上被鬼子打的伤痛，心里直冒火，嘴里骂着：“早晚要收拾你们这些狗杂种。”

1942年，鬼子对抗日根据地“蚕食”“扫荡”。独立营得知消息后，要求情报员立即通知到各个联系点，让群众转移。情况紧急，父亲就把情报夹在煎饼里，驮着油条筐，黑夜中就出发了，天亮时已将情报送到了十几个联络点，确保了群众安全转移，躲过日军疯狂扫荡的灾难。

父亲负责联络武阳片区、板泉周围养鱼池等村及河西敌战区各联络点。这一带经常有鬼子、汉奸出没。父亲遇到他们，就拿油条给他们吃，应付过去。有一次，游击队3名队员被鬼子追赶，到了武阳村西头，喊着：“老乡们，鬼子来了！”并喊着父亲王从照的名字，叫他赶快撤离。父亲和民兵武装立即掩护三个游击队员一起同鬼子作战。他们用区里发的土枪，向村北放了两枪，想把敌人引向村北。不料鬼子很狡猾，立即分成两路，一路向村北追，一路向村子里追来，游击队员来不及躲避，就往村边小树林跑。敌人向小树林扔了两颗手榴弹，炸弹皮崩到父亲腿上和脚上，鲜血直流。他为了不让鬼子发现目标，强忍剧烈疼痛，丝毫不动。鬼子看没动静就离开了。父亲受伤，大半年后身体才康复。此后，父亲在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战斗中，又多次受伤。但他仍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听父亲说，他几次参与给八路军运



送弹药，还曾秘密护送过几位首长，事后才知道有刘少奇等人。但当时都严格保密不对外讲。

三、带领全家革命经受生死考验

当时我村所在沭水县武阳区地处根据地边缘，向西几里地的沭河以西就是敌占区，到处有日军据点。我父亲经常到敌占区联络抗日工作，要冒着极大的危险。有一次父亲和严东位、丁兆瑞、赵树本（河西曲坊村）四个人去敌占区大古庄找两面村长郭立勋送信。正在他家东屋里谈话，忽然看到有两个汉奸来找村长，郭立勋把他们领到堂屋里。我父亲等四人立即走出郭家。敌人发现刚才出去的人神色不对，觉得像八路军，马上鸣枪追赶。这时，父亲他们已抢先一步跑到村外树林中，摆脱了敌人。在敌占区，这种危险多次遇到，每次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来村长郭立勋因被汉奸怀疑，也只好投奔到八路军在沭河东的根据地来了。

父亲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还带领全家人一起抗战支前。当时，我才12岁，就跟着父亲送情报。区委书记张秀坤经常到我家来。1941年后他派我为八路军送情报。一开始父亲带我认路，先让我到近处联络点联系，以后就到路远的联络点送信。我曾步行几十里路，到沭水县大队政委吴镜（吴冶山）那里送信。还到河西的东庄、小梁家等敌占区的金银首饰店、布店、糕点店送情报。每到一处联系点，接头人都热情留我吃饭。在我送情报的五年中，父亲教我外出时处处谨慎，我从没丢失过情报，也没有被敌人发现。有时遇见敌人就想法躲开，他们见我是小孩也就不怀疑了。

平时，除了送情报，我还与儿童团一起站岗放哨，一旦发现鬼子来了，就分头跑回村里，挨家挨户通知村民转移。

我母亲王德坤，虽然不识字，但对家人抗战全力支持。鬼子扫荡时，老百姓提心吊胆，东躲西藏。年轻妇女都穿上老人的衣服，脸上抹上锅底灰，以防被鬼子汉奸盯上。那个时候，年轻女子被鬼子遇见就大难临头。

有一次，鬼子和汉奸来到我们后武阳村，到处搜查八路军，来到我家砸开大门，从院子到屋里面翻了个遍，没发现什么。又问：“王从照干啥去了，是不是参加游击队去了？”母亲说：“没有！”又问：“你家有八路军来过吗，说实话！”汉奸用枪托把地敲得咚咚响。母亲和婆婆、嫂子三个人吓得紧缩在一起，直打哆嗦。母亲咬紧牙镇定地说：“没有什么人来过，俺家孩他爸早上赶集卖货去了！”

几个汉奸呜呜啦啦了一阵子，就要抓走母亲和她堂嫂。这两个年轻妇女每人怀里抱着个男孩，母亲抱着刚出生5个月的我弟弟（后来夭折），堂嫂抱着10个月的娃娃（小名叫子寨，大名叫王廷孝，现已去世），她们拼死反抗，鬼子便用枪托和皮鞭抽打。奶奶情急之下冲上前用身体护住她们俩说：“她们还有吃奶的孩子，求你们放了她们吧，我跟你们去，我替她们！我替她们！”鬼子将奶奶踹倒在地上，硬是把母亲她们抓走了。

母亲和其堂嫂抱着襁褓中哇哇大哭的孩子，踉踉跄跄地被抓到鬼子驻地，鬼子逼她们讲出八路军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不说就用皮鞭抽，枪杆打，打得她们满身是血。

见她们不开口，惨无人道的鬼子故意将两个幼小的孩子抓过去像扔皮球一样来回扔着玩，摔打够了扔在墙角。一会儿，鬼子又拎起两个被摔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放在火炉上，嚷着要把他们烤了吃，鬼子头目还在一边哈哈大笑。

母亲二人吓得没命地哭喊、哀求，头都磕得满脸是血，鬼子这才把孩子放下来。

面对敌人多次严刑逼问拷打，两个淳朴的农村妇女什么也不说，浑身被鞭子抽得血肉模糊，她们一直咬着牙坚定地回答：“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鬼子

用尽各种办法也没有从她们嘴里撬出他们想要的情况。

在得知母亲及其堂嫂和孩子被抓后，乡亲们都非常着急，托人找汉奸疏通放人。鬼子汉奸见问不出什么线索，便答应每人交100块大洋赎人。亲戚们连夜凑齐送去，才把她们赎了出来。

从此，母亲更加仇恨鬼子，积极抗战。父亲送情报，母亲就在家碾米磨面烙煎饼，做军鞋，支援八路军。八路军到我们家，母亲就主动给八路军做饭。母亲常说：“八路军抛家舍命出来打鬼子不容易，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打仗。”

有一次，一位负伤的八路军来到我家说：“大嫂，我脚扭着了，两天没吃东西了，能给点吃的吗？”母亲立刻请他进屋，连忙拿煎饼、咸菜，端来茶，又用温水给他泡脚。为防鬼子搜查，把他藏到高梁秸柴垛里面。过了几天，身体恢复，临走时，他千恩万谢。看到天冷孩子衣不遮体，他硬要把身上穿的褂子脱下来，送给母亲，给小孩做衣服。母亲坚决不要，说当兵在外打仗，没衣服不行。那人激动地说：“大嫂，你是好人，是我的亲人啊！等仗打完了，我一定回来谢你。”

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母亲掩护救治了许多八路军伤员。家里仅有的米面粮食也都照顾了伤员，自己一家吃野菜、粗粮也心甘情愿。

四、带病回乡不要组织照顾

1941年，父亲的朋友、地下党联络人王子虹已担任沭水县县长（吴镜任县委书记）。他打听到父亲还在家，便于农历九月三十晚上带领一队人前来看望。看到父亲身有伤残，居住环境太差，提出让我家搬到沭水县政府驻地去住，并说现在就带人帮着搬家。父亲不愿给组织添麻烦，就谢绝了。1947年后，父亲因身体伤残等原因，回家务农，领导给他补发了两个月的工资。他在家辛勤劳动，支援解放战争，还参加了组织民兵到江苏黑林运粮和把驻武阳的兵工厂搬迁到马亓山一带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伤残之躯，仍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经常教育子女，一定要跟党走，积极进步，努力为人民服务，不计名利，多做贡献。

此后，父亲一直在农村工作，直到1976年去世。

1980年的时候，在济南工作的妹夫王清荣前去探望时任山东省林业厅副厅长的王子虹。在交谈中，王子虹老人得知我父亲王从照已经去世时，神情激动。他深情地回忆起在沂蒙与我父亲战火硝烟中的革命感情和往事，回忆起在我家吃油条、卷煎饼去抗战的情节，历历在目、刻骨铭心，泪流不止。

在沂蒙山区，那些不为人知的抗日英模还有很多，如今父亲已和他们一同化为尘埃，但他们的精神还在沂蒙老区的青山绿水间永世长存！

转眼父亲逝世已经几十年了，我经常把父亲参加革命的故事说给子孙后代听，让他们知道当年革命前辈艰苦的经历，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继承发扬革命传统，珍惜今天的胜利，开拓美好的未来！

我的抗战记忆

尹建珍

尹建珍，1919年9月出生于江苏丰县华山镇张庄村。1936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4月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40年6月任尹长庄乡乡长兼乡武装分队长，1942年2月任华山区武委会主任。1949年10月任山东湖西专区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1977年10月离休，1990年安置临沂市休养。享受正县级政治生活待遇。



我出生于江苏省丰县华山北张庄村。丰县处于苏、鲁、皖、豫四省交界的位置。抗日战争时期，先后隶属于苏鲁豫区、山东省湖西地区行署、冀鲁豫六行署、十一行署等。

我家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大哥尹建德，三弟尹建珠。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我们三兄弟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经历了生与死的和血与火的考验，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哥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兄弟当时就被称为“革命三兄弟”。

我生于1919年，8岁在丰县尹长庄小学读书三年，后在家务农。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先后任本村党支部书记，乡长兼乡武装分队长，区财务会计、区武委会主任，区委宣传委员等，解放后任湖西专区办公室秘书兼专区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后离职休养。下面是我所经历的几个抗战片断。

华山攻击战

1938年4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徐州，5月17日进入丰县城。华山镇是徐州至丰县的交通要道，敌人往返经常遭到我抗日军民的打击，因此便企图在华山设立个据点，

以便巩固稳定这里的局势。

1939年腊月初三和初六，日军派沛县的汉奸纪兴科部和韩继尧部先后到华山蒋楼、虎王集“抢粮拉户”。我党领导的各村抗日武装团体联合双楼的“红枪会”，一举把他们赶跑了。当时在虎王集的汉奸逃跑时非常狼狈，丢下了衣物和枪支，做好了饭也没来得及吃就逃之夭夭了。这次行动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情绪，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腊月初七一大早，日寇100多人乘三辆汽车、20多匹马来到华山镇，以山南学校为中心，开始在山顶抢修掩体、工事，在大街上放置用作障碍的鹿柴，以备长期占领。当时群众非常恐慌，不知所措，我立即召集全体党员开会，讲明形势，要求党员在大敌当前要沉着应对，并分头动员群众埋藏粮食和财物，准备必要时撤出村子，同时派专人监视敌人的动向。

张庄、双楼两村共集合了70多人、十几条枪，其余的是红缨枪和大刀片子，我们把队伍临时分成三个小分队，分别由“红枪会”宋师父的儿子、尹克银和我各带领一队。8点40分开始行动，我们刚出村就被发现，敌人开始用枪炮轮番向我们射击。大家毫不畏惧，相互鼓劲，勇敢向前冲。不到20分钟，就越过了华山大西门，从西边攻到了山前腰。同时，李新甫的区中队打得也很勇猛，攻到了前山头。

当我们快要接近山头时，敌我双方都已有伤亡。这时敌人已退出山头，但还继续往山上打炮。我们听到了山前汽车的响声，原来是敌人以小部分兵力作掩护，大部人马在撤退。在学校里，我们分发了敌人逃跑来不及带走的一些枪支弹药、食具和衣物等。

此次战斗，敌我双方都有一死三伤，我村的刘伯营牺牲在前山头上，尹克银、满德友二人受伤。

一次伏击战

1939年11月，我苏鲁豫支队一部，驻华山北尹双楼—宋枣园一带村庄。一天，得知日军有汽车、马队约300人的部队，下午三点到四点从华山经过。我军决定利用大小两个山头的有利地形，打个伏击战，消灭这批侵略军。

下午三点，我军在大小两个山头选好地形、挖好掩体。四点，日军先头部队进入我军伏击圈，当他们的部队进入东门里一半时，我军在大小两个山头上同时开枪射击，打得日本鬼子好像掉了头的蚂蚱乱蹦乱撞。一排子枪就打死打伤敌人七八十人，等到他们缓过神、要重整旗鼓反击时，我们又打死打伤他20多人。

到了晚上九点，我军撤出阵地时，敌人还在不停地向华山北部的几个村庄打炮。这一仗，我军伤亡30多人。

战斗开始之前，我三弟尹建珠(时为部队战士)和本村的曹用三(部队战士)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探家(当时他们部队住在尹双楼村)。我三弟刚到家不到十分钟，就听见华山大小两个山头响起了枪声。三弟说，这可能是日本人来了，起身就走。我俩刚出门，便遇见曹用三和张兆祥赶过来了。我们边走边商量，来到住在尹建文家的我军一个团部。见到团长，三弟介绍了我们的身份，说是特地来请战的。团长电话请示上级后说，这次战斗是用少数兵力打伏击战，你们可以组织人参加抢救伤员，部队派人指导，并嘱咐我们注意安全。

我和张兆祥分头找人，组成了包括我大哥尹建德和孟宪梅、孟宪桂、曹广居、刘金魁、尹建章、李保申在内的20个人的救护队，部队派来两个卫生员和两名战士，还带来了四副担架。担架太少，我们又扎了六副。这时，村里的人有不少跑到村外藏了

起来，日本人的大炮不断地向我村发射。

下午四点，我们救护队从尹长庄向华山进发。路上卫生员告诉我们，听见炮声响就要卧倒，炮声停了就往前跑。

5点20分，天已黑。我们刚到大山后边，就接到了从山上下来的伤员。有的是轻伤、自己走下来的，有的是被人背下来的，有的是两个人架着下来的。第一批接过来10人，安置在外场地上。第二批又上去接了，我留下安排人烧水做饭。卫生人员忙着清理伤口、安慰伤员。第二批又接回7个伤员，我们及时进行了救护。

晚上九点，部队从山上全部撤回来了。我们救护队又抬着担架随部队把伤员们送到十几里路外的北黄楼村。部队卫生员很感动，分别时说，你们劳累了大半天，又送我们这么远，回去好好休息吧。他一说，我们才感到累。回家的路上，大家边走边兴奋地议论战斗和救护伤员的事，都挺高兴的。

我军撤走以后的晚上，鬼子在华山的驻地鬼哭狼嚎、火光冲天，原来是鬼子将他们被打死的70多人和个别受重伤医治无望的士兵，燃起大火烧掉了。后半夜，日本人撤走时带走了焚烧的骨灰，拉走了一整车的伤员。

第二天早上，我同张兆祥、李保申、刘金魁等同志又去山上搜查战斗现场，协助掩埋了牺牲的烈士。

这次伏击战，我军有14位同志牺牲，受伤的24人。华山街上有4个平民百姓被打死，3人受伤。因为日本鬼子看到他们死了那么多人就怀恨在心、肆意报复，见人就开枪，有些躲避不及的群众就被打死打伤了。

后来，我三弟来信说，我们村救护队的同志，得到了团长的赞扬，夸奖说尹双楼、张庄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真是好样的。

深入虎穴盗情报

1943年7月，我军王秉章、潘复生部奉命东进，先后在魏楼、龙固和王庄消灭部分沛县顽军，又将顽军冯子固、张开岳的主力包围在魏楼大蔡家，待消灭了来自丰县、铜山县的敌援军后，将冯、张部消灭。

丰、铜两县的顽军为了挽回败局，先后在新樊庄、李丹楼建立了新据点，号称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我军为以最小的代价攻破这两据点，命我扮作顽军情报员，通过两县顽军在华山徐屯设立的情报站，深入敌人内部探明情况，为我军攻克据点作准备。

当时徐屯情报站站长是我姐夫徐振华。利用这个关系，我顶替该站情报员邵登荣的名字，带着他的证章，将写好的日本人的活动情报（驻华山日军人数量、编制、驻防情况，活动时间、地点）送到两个县的政工部门。当时带着情报员证章就可以在据点内自由行动，也可以住在专门为情况员设置的住宿房间。情报员很受欢迎，大家都羡慕，也很受尊重，这也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我利用送情报、打入敌人内部的机会，秘密搜集据点的情况，主要有顽军各单位人数和配置，据点的构造，壕沟的设置，碉堡群和武器装备等等，我把情报内容绘成图并附以说明，交给我党负责人。

为了方便工作，我也交了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大家相互信任、无话不谈。新樊庄据点有个政工干部是陈家老村的，我们是亲戚，按辈份我该叫他表叔。从他那儿我得到不少情况。

1943年10月，我军对新樊庄据点发起进攻。由于掌握了敌人的情况，进行得比较顺利，只用了五天时间就把敌人吹嘘的“铜墙铁壁”给攻破了。丰县顽军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消灭了大部分，剩余残部逃到了铜山县顽军李丹楼据点。

李丹楼据点接受了新攀庄据点被攻破的教训，重新对据点进行了改造和加固。同时，敌人对内部人员的控制和审查也更加严密，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工作的难度，也增加了危险性。有个家是沛县的情报员，发现我每到一地看得细、问得也多，就产生了怀疑。他把情况汇报给政工部的程主任，随即我被叫过去。程说，根据工作需要把你留下做内勤，就不要回去了。我说我要往这儿送情报怎么办？他说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安排。最后他安排我去警务室“休息”。我有个要好的情报员，家是连云港的，名叫史效先，知道我这是受到了软禁，后果严重，就立即动身，跑到徐屯告诉了徐振华。徐晚上九点赶到李丹楼，找到程主任说，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扣留我的人？并说凡是我派来的人都是我信得过的、也是最可靠的，你要不相信我，我就把我的这个站撤了算啦！程连忙说，相信相信，就把我给放了。

当时，要不是史效先及时告诉徐振华，那天晚上我就要遭大罪了。当时史跑得满头大汗，累得他身上疼了两天没缓过来。全国解放后，我俩还常有联系。

从那次以后，李丹楼据点的政工部门对我更信任了，我的工作也更好做了，后来搜集的情报内容也更加详尽和准确，我都及时交给了上级组织。

10月初，我军作出了攻打李丹楼据点的计划。冀鲁豫军区杨勇司令员亲自来湖西部署。战斗由曾思玉、王秉章司令员指挥，我七、九、十团和骑兵团，丰、沛、砀三县地方武装参战。10月19日晚，赵印芳到大史楼找我，说今天就行动。因为我熟悉地理位置和情况，要我立即随部队出发。我们出了村子，发现原先修的1000多米壕沟已被我部队填平，形成了约20米宽的通道，先头部队已到达。

部队出发，我和赵印芳走在队伍最前面。11点多，到达离李丹楼还有五里路的陈老家村时，就与驻守在此的顽军“耿聋子”（耿心斋）所属部队郝寿图团交上了火。我军一部分兵力打“郝团”，大部队迅速前进。这样，消灭了“郝团”，也完成了对李丹楼据点的全面包围。

李丹楼据点周围五里路内没有庄稼和树木，全是平川地，易守难攻。我军采取了坑道作业战术，即用“老鼠打洞”的办法，挖坑道接近据点，不易被敌人发现，又使敌人碉堡的火力不能发挥作用，进而发起攻击。我军一边炮击据点与其周围，打击敌人，一边挖坑道。经过四天四夜的努力，坑道已接近壕沟。这时，“耿聋子”异常惊慌，夜间两点，召集部下召开紧急会议，要坚守到底。会后他便立即带着贴身警卫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偷偷地从地道逃走了。他逃跑的消息很快传开，敌军心大乱，这时我军总攻已开始，敌人溃败不堪，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分缴械投降，我军大胜。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此次战斗，毙敌450人，俘虏700人，还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至此，徐州以西、以北地区全部解放，我党在丰、沛、铜、萧、砀各县都建立了政权。其中，在沛、铜以西建立了华山县，成立了县乡政府。我被任命为华山县毛楼区尹长庄乡乡长兼任乡武装分队队长。

玉碎沂蒙之二：刘震东

国 英



刘震东，字曦洲，山东省沂南县人，生于1893年。

刘家世代务农，唯其父精于木匠手艺，在家乡远近知名。震东受其父熏陶，自幼喜欢书法、绘画和雕刻，并下过一番功夫。其父对培养他热爱美好事物、热爱祖国的思想品德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刘震东少年时代曾读过几年私塾，学习成绩优异，得到老师的赞赏。后因生活所迫辍学，随父做木工，1917年2月入沂水县立师范传习所，1918年3月毕业，在沂水县衙做事，为穷人写状子告权贵。不久他便背井离乡只身逃荒去东北。开始在辽宁省的大连、沈阳一带，以卖字和为人代写快信糊口，后经人介绍入奉军为上士文书。由于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办事机灵，被选送军校，与张学良同年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先后升任排、连、营、团长等职。

1925年11月间，奉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不满张作霖、杨宇霆的专横统治和同日本勾结，秘密与冯玉祥结合，组织了东北国民军司令部，刘震东为第五旅旅长（少将）。郭松龄倒戈失败后，由于张学良的说项，刘震东才保住官阶。1926年南口之役，时任东北陆军步兵第三十四旅少将旅长，刘震东指挥作战勇猛，战功颇著。同年12月，又率部突破西北军韩复榘、石友三等部设防的平地泉、丰镇一线，相继占领包头、五原。1927年4月因功升任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五师中将师长。10至12月，晋奉矛盾加剧，在河南展开混战，刘被任命为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后方警备总司令。

1927年，刘震东入东北陆军大学，为第八期学员，任班长。因他学习有方，常识罗广，学员中曾有这样的赞语：医卜星相高仁级，上下威信刘震东。在此期

间，他结识了李宗仁、卫立煌等人。1930年陆大毕业后，又回东北军供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奉军撤入关内。但也有一部分官兵出于民族义愤，自动留在东北坚持抗日，刘震东就在其中。开始，他任东北民众救国会（阎保航组建的爱国抗日群众团体）第四军团总指挥，1932年成立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团，任总指挥，转战于辽宁、热河、察哈尔一带，在开鲁、喜峰口等地与日军顽强作战，他的战迹和照片曾刊登在当时的《时事报》《东方杂志》和《时代》《病态半月刊》等报刊上。在开鲁战斗中他头部负伤，但仍带伤坚持军务和战斗。

1933年5月，以冯玉祥、吉鸿昌为首在察哈尔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刘震东同邓文、李忠义等人当即给冯玉祥发了贺电，率部参加了该同盟军，并立刻听命投入战斗。

同盟军被蒋介石强行解散后，刘震东任军委会北平分会训练委员会办公厅中将主任。

1935年冬，刘震东随张学良去西安供职，任西北总司令部中将参议兼“督剿”专员。“西安事变”后，任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参议兼总务处少将代处长。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如潘汉年、车向忱等人。

“西安事变”时，刘震东是调解人之一，他奔走和平成了当时报纸的大标题。事变后，张学良被扣，他情绪消沉，常在家中写字、作画、学俄语。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刘震东心系国家安危，坐卧不安，致电何应钦请战，何不作答，遂挂冠径直到南京当局请缨抗日。在刘的多次坚决请求下，终被派到第五战区（驻徐州）李宗仁将军麾下听调。李对刘的到来是欢迎的，但当时兵员不足，武器缺乏，李宗仁任命他为第五战区高参兼第二路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只拨给少量的手雷、饭盒，人员自己募集。为了抗日，他毅然地担当起了这一重任，立即在徐州张榜招募兵员，并迅速派人到沂南老家招兵和筹集军饷。为此，他还给许多亲友写信求助，其中一封家信中写到：“没有国，就没有家，国难当头，先国后家。”为了抗日要“毁家纾国难”。同时致函给其三弟震亚（当时在西安），令他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派政工干部到第二路游击队工作。他写信给董必武要求派政工干部的信，在“文革”之前还展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居中。

经过两个来月的积极筹划，这支游击队发展到400余人。它的成员中，有来自前五十一军少校参谋王再天（中共地下党员），有来自平、津的学生（内有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杨士法、肖方洲、李向群、刘及武等，有来自各界的进步人士徐眉生、彭畏三、耿光波、路雨亭等，有来自胶东、鲁北、鲁南和苏北等地的民众武装。以上几部分人员是游击队的基本力量。但他们的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多数缺乏实战经验。另外，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以及当地的青红帮。大家为了抗日这一大目标，保卫自己的家乡，汇集到一起来了。刘为指挥这样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而感到自豪和兴奋。“游击队刘司令”的名字从此也就“威名远震”了。

1938年初，该游击队从徐州等地汇集到江苏的新安镇（今新沂市），经过短期整训后就向山东进发。刘震东偕同政治部副主任徐眉生和有关人员，先期到达莒县，对当地的土顽进行了清理和收编，为后继部队扫平了道路，对部队给养和人员扩充又作了一番工作，同时对当地政府进行了争取工作，莒县县长许树声及他所领导的县大队，从开始排斥、刁难刘震东，到后来也未公开干预，游击队司令部就驻扎在县政府的东西邻。

当时抗日游击队曾派青年师生徐子干、李福生等20余人分赴乡下宣传抗日，后来这些人多数成为抗日骨干。

游击队要打仗，还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在第五战区内蒋系组织对这支游击队并

不放心，派人到该队进行监视和破坏活动，由于刘震东等人与其巧妙的周旋，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刘震东在西安任职时常与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接触，因此他的思想逐渐倾向进步，对共产党倡导的游击战术非常钦佩，曾号召所部学习游击队战术。后来由于突然变化的情况，他的打游击的愿望未能付诸实践。

1938年2月17日，日寇坂垣第五师团一部配合汉奸武装共五六千人南犯莒县、沂水等地。刘震东奉命率部前往莒县阻敌、扰敌。2月21日，日寇精锐主力板垣师团田野支队在飞机、大炮、装甲车等重型火器的支援下，企图当晚强占莒县县城。莒县县长许树声闻讯，已将县大队撤出城外，弃城南逃。方圆五六公里，人口二三十万的莒县县城几乎已成一座空城，而奉令守土有责的四十军还未能及时赶到，在这紧急关头，第五战区命令刘震东部担任短时间的守城任务，刘不畏强敌，欣然受命。

2月21日傍晚，后继部队在参谋长王再天带领下，开进莒县县城。此时，县长许树声已将县大队撤出城外，而奉令守土的四十军还未能及时赶到。刘震东将军毅然率部400余众坚守莒县县城，刘亲往各处察看地形和布防，进行战地动员，指出莒县战役在徐州会战中的重要意义，关系到台儿庄决战的成败。提出了“誓与莒城共存亡”的口号。当时城墙上岗位，约百米一人，而又无人再及时更换，被刘将军戏称“是乃空城一计也”。天寒、腹饥、迎风孤立，政治委员萧方洲担心没有办法去安慰战士，但是，战士们精神出人意料的兴奋，原来他们曾经目睹日寇杀人放火，耳听过同胞悲惨痛苦的呼叫，早就盼望奋勇杀敌。

午夜，四十军两个团的兵力在旅长朱家麟带领下赶到莒城，二二九团进城防守，二二〇团在城西外钳制。许树声的县大队也被截回，同时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一部集结莒县。为协调全部兵力，刘震东被推任为前敌总指挥，朱家麟旅长为副总指挥。此时，又重新部署了兵力，严阵以待，迎击来犯之敌。

2月22日凌晨，日军开始围攻莒城。刘震东将军亲上前线指挥作战，用抗战必胜、为国杀敌、捐躯光荣的道理，鼓舞将士，勉励他们奋勇杀敌，报效祖国。他指导部队避开敌人进攻前猛烈炮火的袭击，狠狠打击冲锋的日寇。他嘱咐战士：“要注意！要沉着！不到一枪打一个的时候，决不发枪。”官兵见到将军这样英勇善战，个个勇气倍增，决心奋勇杀敌，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誓死坚守阵地。抗日将士冒着日寇重炮雨点似的狂轰和飞机猛烈的滥炸，坚守不退；日伪军在炮火和机枪掩护下蜂拥攻城。刘将军指挥若定，率部奋勇抵抗，专打近敌，敌军伤亡甚多。日寇多次进攻均被击溃，阵地前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刘将军见敌败退，一面请上级增派援兵，一面组织两个营的敢死队，冲出南门，分东、西两路迂回到敌后，包抄敌南城外高地火炮阵地及溃逃的日军，发起突然攻击，给敌以重大杀伤。日军再次以更疯狂猛烈炮火轰炸莒县北城，用重炮集中轰炸城墙，不久，北城一段被敌炮火轰毁，敌一部登上北城墙，架机枪向守军猛烈扫射。城西北角被敌人攻破，刘闻讯，跑步到现场指挥，率军与日寇作近距离搏斗，奋勇厮杀，反复争斗，战况之惨烈，惊心动魄，日寇又被我英勇的抗日将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我军终将失守的阵地夺回。日军大批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与刘将军的部队发生激战。我军援兵因桥梁被破坏，无法赶到。刘将军身陷危局，但他仍率部队拼死抵抗，宁死不屈，奋勇杀敌。刘将军在城墙上临阵指挥，鼓舞士气，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日寇炮弹在身边爆炸，刘不幸头部、腹部中弹，壮烈殉国，时年45岁。守城部队在刘震东将军大无畏精神鼓舞下，更加奋勇杀敌，激战两日，终因力量过于悬殊，战员损失过半，弹药耗尽，在旅长和参谋长带领下只好主动撤离。

刘震东将军为国捐躯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宣传队在临沂为他举行了追

名人素描

悼大会。同年3月9日，第五战区在徐州为刘震东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宗仁主祭，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勉励台儿庄将士向抗日英烈学习，英勇杀敌，并提出了将莒县改为震东县的建议。

刘震东将军殉国后，《新华日报》作了专题报导，其中一篇题为《莒县我军奋勇杀敌，刘震东氏壮烈牺牲》。1938年3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参战人员萧芳洲撰写题为《刘震东殉国与莒城战役》的长篇报道纪念抗日英雄刘震东将军。同年12月，在重庆举行范筑先、刘震东等21位抗日烈士追悼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人为烈士送了花圈和挽联。挽辞为：“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显其忠勇，吾侪尚在誓必长期抗战还我山河。”

1938年3月9日，国民革命政府追赠刘震东将军陆军中将。



临沂战役中发起攻击的国民党部队



萧统与《昭明文选》

青衣问道



萧统（501年—531年），字德施，小字维摩，南朝梁代文学家，祖籍山东兰陵县，梁武帝萧衍长子，母亲为萧衍的贵嫔丁令光，又称丁贵嫔。于天监元年十一月被立为太子，然英年早逝，未及即位即去世，死后谥号“昭明”，故后世又称“昭明太子”。

昭明太子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才子，他所编撰的《昭明文选》成为唐宋以来文人士子学习文学的范本，后人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近日细读《南史·梁武帝诸子列传》，对这位昭明太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么昭明太子萧统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才学，又为什么如此短命呢？这应该与他出生的环境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确切地说与梁武帝萧衍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称昭明太子的短命是因为他给自己的生母丁贵嫔选错了墓地。

历史上的南朝，政治上乏善可陈，地理上半壁江山，偏居江南一隅，国家政权频更，朝代屡有杀伐，皇室之间更是骨肉相残，伦理丧尽，纲纪败坏。相比之下，南朝在文学上多有亮点，文章灿烂，大家辈出。南朝文学上承两晋，下开隋唐，更为重要的是延续了华夏的文脉道统，而这当中尤以梁武帝父子最为突出。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谈到南朝文学，说“至梁武父子间，尤为独擅千古”。

《南史》中有许多关于他们父子为学的记载，如说梁武帝本人，“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南史·梁武帝本纪》）。梁武帝有子八人，其中长子昭明太子“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三子简文帝萧纲“六岁便能属文”；四子南康王萧绩“七岁有人洗改官文书者，即能察出”；八子武陵王萧纪“少勤学，有文才，属词不好轻华，甚有骨气”（《南史·梁武帝诸子列传》）。

在梁武帝以及他的这些儿子当中，昭明太子萧统无疑是其中代表性的人物，也尤为梁武帝所喜爱。昭明太子生于南齐中兴元年，即公元501年，两岁时被立为太子。据《南史·昭明太子传》，“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又说他八岁于寿安殿讲《孝经》，能尽通大义。随着年龄的增长，昭明太子不仅学问越来越大，而且相貌出众，风度翩翩，读书过目不忘。据《南史·昭明太子传》，“太子美容姿，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作剧韵，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后来有人统计昭明太子的著述，计有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故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英华集》二十卷，《文选》三十卷。这样一个庞大的规模，而且是在其短短31岁的生命当中所完成的，不能不说这是个奇迹。

昭明太子的文学成就不仅来自先天的聪慧，还得益于后天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萧衍文学造诣就很高，周围又有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文，如沈约、范云、谢朓等人，昭明太子本人也喜爱文学之士，招纳学人，并集积图典，讨论讲学。据《南史·昭明太子传》，说昭明太子“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宋晋以来未之有也”。据称他的老师沈约当时家有藏书二万卷，号称京师无人能比，但是沈约藏书的规模也只有昭明太子的三分之二，学生大大超过了老师。

梁武帝萧衍建立南梁王朝，有两大特色，一是重文事，二是重佛事。查《南史·梁武帝本纪》，仅在昭明太子少年时，即中大通三年四月以前，国家就有以下五项重大的全国性的文事活动：

- 1、天监四年五月，置集雅馆以招远学。
- 2、天监九年三月，（萧衍）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赐祭酒以下各有差。
- 3、天监九年三月，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从师者，皆入学。
- 4、天监九年十二月，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词各有差。
- 5、天监十年六月，以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右仆射。

这些活动都有昭明太子的参与，这对少年时期的太子影响很大，而且在天监八年九月的一天，当时只有八岁的昭明太子在寿安殿登台宣讲《孝经》。据《南史》称其“尽通大义”，后又亲临国子学讲授。当然，这是有点高抬昭明太子，但是昭明太子的聪慧好学是没有问题的。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环境当中，再加上昭明太子的先天聪慧，造就了他后来的文学才能。

昭明太子只活到31岁，为什么如此短命呢？表面看昭明太子是殒命于一次意外的坠水，但是我们知道，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或者从因果律来看，任何偶然如果拉长来看都是必然。

当时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在国内大建寺院，自己还舍身入寺，又客串经师，亲自登坛为僧俗大众讲经说法。由于梁武帝的示范效应，朝野上下崇佛之风大盛，后人杜牧曾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说的这样一种盛况。这样的崇佛环境对昭明太子当然影响很大。与其父一样，昭明太子不仅亲近三宝，而且聚学讲经。据《南史·昭明太子传》：“帝（梁武帝）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素



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二谛》《法身义》。”

太子天性仁恕，这也与他笃信佛教有关系。据《南史·昭明太子传》，“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天下皆称仁。”其生母丁贵嫔有病，太子朝夕侍疾，衣不解带。生母死，悲恸号泣，从死至入殡，水浆不入口。昭明太子原来很胖，丧事过后，体重大减。“体素胖，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一次，太子看到卫士用荆条驱人清道，命将清道用的荆条换成木板以减轻打在身上的疼痛。当时世风渐趋奢靡，太子带头倡导节俭，生活起居简单朴素，他穿布衣，不吃肉。

太子的行为确是一个学佛者的仪范，他深通经义，持戒精严，赈恤饥寒，广做公益。据《南史·昭明太子传》：“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及有流离道路，以米密加赈赐，人十石。又出主衣绢帛，年常作襦裤，各三千领，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无可敛，则为备棺槨。”当时，江浙一带屡遭水灾，由于粮食连年欠收，社会不稳定，“谷价犹贵，劫盗屡起”。昭明太子为此上书请求予以整治，要求“开漕沟渠，导泄震泽”，永绝水患。“中大通二年，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节发吴、吴兴、信义三郡人丁就役。”以三个郡的力量治一郡之水患，几乎是举全国之力，工程巨大，影响极其深远，由此造就了以后江南千年的富庶。

昭明太子骨子里是个文人。除读书讲论外，昭明太子还喜欢悠游山水，叠山造园，以诗书为娱。据《南史·昭明太子传》，昭明太子“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游其中”。一次，昭明太子与一班风雅之士在“后池”泛舟，番禺侯萧轨说这里应该奏女乐，昭明太子没有回应，只是吟诵左思的《招隐诗》，其中有“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这里一俗一雅，境界顿显差别，萧轨极为惭愧。

有些事情可以说是巧合，也可以说是诡异。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昭明太子和一班文人又在“后池”泛舟。一千人游于万荷之中，水面微风习习，姬人撑船荡舟，众人在舟上探身摘芙蓉，大概操船的这些姬人太不专业，昭明太子自己又不小

心，竟然失身坠入水中，后被人捞起，由此受伤。一个月后，伤情突然恶化，竟命归黄泉，年仅31岁。梁武帝伤心至极，“帝临哭尽哀，诏敛以衮冕，谥曰昭明。”

有人说昭明太子的短命是因为给自己的生母选错了墓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当初，昭明太子的生母丁贵嫔死，太子派人求得上善墓地，就在已经开始在这块地上斩草准备营建陵寝时，被梁武帝突然叫停。原来有一个卖地者想将自己的一块地卖给皇室做墓地，这个人买通了宫内一位叫俞三副的阉人，许诺若这块地能以三百万钱卖与皇室，便分给他一百万。这个阉人见钱眼开，借机密奏梁武帝，称太子选的这块地不如现在这块地对皇帝吉利。据《南史·昭明太子传》，“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于是梁武帝便命人买下这块阉人推荐的墓地将丁贵嫔安葬了。

然而事情还没完，有一位善于看墓相坟的道士，看到这块墓地，说这块地不利于长子，然可以用“法物”将其破一破。“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昭明太子听信此言，按道士所说，以蜡鹅及其他物品埋在墓地旁边的长子的位置上，结果被一个叫鲍邈之的宫监告发。梁武帝得知大惊，将蜡鹅等“厌伏”之物掘出，大怒，要深究此事，大臣徐勉再三劝谏才作罢，只是将那个道士杀了，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但此事由此成了昭明太子的一块心病。

昭明太子的意外死亡，其原因也许还是出在“杀”字上，不是昭明太子本人有什么杀戮之事，而是他的父亲梁武帝曾以“自雪门耻”为名杀了前朝齐明帝萧鸾的儿子，《南史》上说，齐明帝萧鸾有子十一人，梁武帝杀其中六子。梁武帝虽然是历史上有名的菩萨皇帝，但是杀人者最终还是要承担自己行为的责任，果报是逃不脱的。

清人王鸣盛曾不无感慨地说：“明帝子固应杀，梁武似未可为应杀明帝子之人。”（《十七史商榷》）言语之间很是替这位梁武帝惋惜，同时又隐隐点出其家族潜在的悲剧。

萧统编有或著有《文集》二十卷，典故类的《正序》十卷，五言诗精华《英华集》二十卷，历代诗文而成的总集《文选》三十卷。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昭明文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选编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代表作品，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他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准则，为后世推崇。萧统笃信佛教，著名的佛教大乘经典《金刚经》，其中“三十二分则”的，即为他所作。原本长篇连贯的经文，经过他整理成为容易传诵理解的三十二个分则，各段并补充浓缩精要的副标题。

范十隐居何处

平凡

唐代大诗人杜甫写有一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
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
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根据《杜甫年表》，此诗写于天宝四年（745年）。

此前一年（744年）秋末，李白回兖州任城（今山东济宁）探视家小；岁暮，杜甫也到兖州省父（杜甫的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李杜两人在兖州相会。这是李白与杜甫继陈留聚会之后重聚东鲁。天宝四年（745年）春天，杜甫与李白同游于泗水之上。此时，北海（山东益都）太守李邕的从侄李之芳担任齐州（今山东济南）司马，杜甫与李之芳是童年之交，于是杜甫邀请李白同游齐州。盛夏，李邕也自益都来会，一同宴饮于历下亭，杜甫写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秋天，杜甫与李白返回兖州，曾一同拜访范隐士和董炼师，杜甫写下了这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秋末，杜甫回洛阳，与李白分手，杜甫写有《赠李白》诗，李白也有《鲁郡（兖州）东石门送杜二》诗赠别。此后二人再未相见。

临沂人对这首诗非常熟悉，因为很多临沂人都认为，杜甫的这首诗写于临沂的蒙山。他们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诗中的“东蒙客”三个字。蒙山又称东山、东蒙，《论语·季氏》说“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因此杜甫诗中的“东蒙”指的就是临沂的蒙山。明清时期的《沂州志》《沂州府志》，蒙阴、费县等蒙山周边各县的县志，以及新编的《临沂地区志》《蒙山志》，全都收录了这首诗。

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

我读过一篇济宁人写的文章《杜甫写于济宁的诗》，说杜甫的这首诗写于曲阜。而《兖州史话》则认为，杜甫的这首诗写于兖州。

范隐士到底住在何处？

诗中只是比较含糊地提到了“古城”，并没有确指。不过，杜甫不是独自出行，而是和李白一起寻找范隐士的。李白此行也写了一首诗，题为《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可以作为参照。其实，不必看李白诗作

的内容，仅从题目就可以知道，这位范隐士的住处，是在“鲁城北”。他俩出了鲁城北门，秋草丰茂，路径迷离，走不多远，走在前面的李白就迷了路，钻到了苍耳丛中去，粘了一身的苍耳（又称“苍耳子”，临沂人称作“粘抢子”）。

那么，这个“鲁城”又是哪里呢？

一种说法，“鲁城”是曲阜的别称。曲阜曾为鲁国都城，故名“鲁城”。明代李东阳《谒少昊墓》诗有“建都鲁城东，遗址有轩辕”，《谒尼山庙有述》诗有“迢迢鲁城路，望望尼山峰”，指的都是曲阜。

鲁城位于泰沂山脉西南麓的曲阜县，在泗河和小沂河之间，面积约10平方公里。泗河绕于城的西北，小沂河流经城南。城的西南到西北面有辽阔的原野。

另一种说法，天宝元年（742年），兖州改称鲁郡，李白诗题中的“鲁城”二字，指的是兖州。李白还写过一首《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诗，开头两句是：“月出鲁城东，明如天上雪。”此处的“鲁城”，指的是唐代兖州（鲁郡）之治所瑕丘城，即今兖州市。

根据历史记载，曲阜称作鲁城，是在春秋至隋朝之间。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49年），楚国灭鲁国，始设鲁县。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灭楚，鲁县入于秦。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始实行郡县制，鲁为薛郡，郡治在曲阜。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帝刘启改封皇子、淮南王刘余为鲁王，以鲁县为国都。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诏改鲁县为“汶阳”，开皇十六年（598年），又改为“曲阜”，此后不再称“鲁县”“鲁城”。

兖州是古九州之一。隋代大业二年（606年），兖州改为鲁郡。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置兖州，治所设在瑕丘。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兖州为鲁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复为兖州。李白、杜甫寻访范隐士时，恰是兖州称作“鲁郡”期间。此时，李白住在兖州（据考证，是在瑕丘城东门附近，大约在今天的兖州火车站一带），他俩一起到兖州城外寻访朋友，也是合乎情理的。当时住在兖州城外的，除了范十，还有孔巢父、韩准、裴政、陶沔、张叔明等人，都是李白的好朋友。

因此，笔者认为，范十隐居之处，既不是临沂的蒙山，也不是曲阜城北，而是兖州城北。

之所以让临沂人误认为杜甫的这首诗写于临沂的蒙山，全是因为诗中的“东蒙客”3个字误导所致。杜甫的这首诗并不是在蒙山所写，查阅年谱、传记，杜甫和李白也从来不曾到过蒙山。

“东蒙”是临沂蒙山的古称，“东蒙客”却不是字面意思的“蒙山之客”，而是“隐士”的代名词。典故出自皇甫谧《高士传·老莱子》：“老莱子者，楚人也。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后世因以“东蒙客”泛指隐士。例如唐代诗人高适《送郭处士往莱芜兼寄荀山人》有“君为东蒙客，往来东蒙畔”，宋代诗人卫博《病中书怀》有“怜我已深兄弟好，原从之子客东蒙”，都是引用了这个典故。杜甫诗中有“东蒙客”三个字，并不能证明这首诗就是在“东蒙”（蒙山）所写。

抗战文物之

《山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

高昂



《山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6月1日创刊，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即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编辑出版，8开铅印，每期约15万字。它是一个与《八路军军政杂志》性质相同的杂志，它的主要任务，是总结与介绍山东八路军在部队军事建设与政治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及时指导战争和军队的各项工作。每期除了刊载一篇社论性质的“专载”和工作总结外，还刊登一些时事评论、战地通讯、文艺通讯、人物特写及木刻等。创刊号主要内容有，朱瑞所作的《发刊词》、黎玉《抗战两年的山东纵队》、朱瑞《论山东纵队的当前建设问题》、徐向前《山东纵队建设任务及工作》、刘子超《山东纵队宣传教育工作的过去与现在》、孙光《怎样研究兵团战术》、徐向前《孙祖战斗的检讨》、彭明治《东进一年来的胜利与生活》等。

1940年7月1日该刊第二期出了《抗战三周年纪念特辑》，除转载了《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外，还刊登了朱德《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奋斗》和《迎接抗战第四年》，王稼祥《渡过困难危险争取抗战胜利》，徐向前《坚持山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黎玉《中国共产党与山东抗战》和赖可可《一一五师在抗战的第三周年》等文章，集中宣传了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思想。

本期封面图片为《山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原保存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

我跟宋式云先生学国画

涤雪楼主人



一、与式云先生结画缘

和宋式云先生的缘分也许上天早有安排。父亲在莒县人民医院工作，与式云先生是兴趣相投的忘年交。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春天，宋式云先生为父亲画了一套花鸟四条屏，父亲亲手用中药房里包药剩下的纸头装裱后挂在家里。当时正处于“文革”后期，一般家庭里不允许挂与革命无关的饰品，于是父亲请王玉宽老师在式云先生的作品上分别用真、隶、行、魏四体书法题写了毛主席诗词，这不仅见证了宋老、王老早年在艺术上的交流与合作，而且他们此后成了我学习书法、国画的启蒙者和指导老师。宋式云先生作为莒县首屈一指的画家，能够从小就受其直接影响，这种机缘很难得，而我天缘凑泊，恰恰幸运地得到了。

宋式云先生从莒县城里完小退休后曾在城阳美术厂主持绘画车间的工作。父亲第一次带我去拜访宋式云先生，记得是一间狭窄的平房，靠西墙安放着一张大画案，宋式云与任英民先生在一间画室里创作，一人作画，一人题字。父亲和他们寒暄一番后，任英民先生为父亲写了一幅对联：“虎守杏林春意暖，龙蟠桔井水泉香。”取自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典故。第二次见到式云先生是在1984年，父亲带我到县人民会堂平房展厅参观莒县政协书画展，展览仪式结束后，“六老”当场挥毫作示范，已经誉满

临沂地区的式云先生在展览会上当场夸赞宋金鼎画的葡萄比自己画的还要好，奖掖提携后生之情溢于言表。再后来，我考上大学，寒假回家，父亲又带我去宋式云先生家拜师学艺，当时先生看了我带去的梅花作品后，从画案上拿起一只斗笔，蘸着笔洗里残留的淡墨，当场为我画了一幅四尺中堂白梅，边示范边介绍，出枝、结顶、勾花、点萼、点蕊、点苔，最后添上了一栖一飞两只八哥，题款“八百长春”。过了一段时间，父亲邀请宋式云先生到家中做客，在张培桐、王君安、宋金鼎老师的见证下，我拜宋老为师并在家中合影。从此，我便成为宋式云先生的弟子，正式跟从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

二、听式云先生讲画事

跟宋式云先生接触久了，经常听他讲些他学画时候的事。先生从小就迷恋绘画，孩提时期便与国画结下了不解之缘。12岁始，遍访乡里画界名流，当时的莒县书画名家于疆臣、于小臣、李伯羲，民间雕塑家马明江、刘聘三等，都曾经指点过宋式云的绘画艺术。小时候的宋式云喜欢在石板上勾划，或者调制土色在草纸上涂抹，县城的哪家铺号厅堂里张挂着名画，他知道了一定要去欣赏揣摩。每每遇到佳作，就不自觉地伫立于画前，如痴如迷，久久不肯离去。到他上小学的时候，书画才能已崭露头角，学校的美术展览，他都力拔头筹。翰林庄陔兰看了他临摹的郭熙《早春图》后，大加赞赏，并当即挥笔在其画上题诗褒奖。

贾家花园又叫“城市山林”，在莒城后营街城垣南面（今县文心宾馆南门附近），是清光绪年间莒城贡士贾珣建造的私家园林，至解放前几经辗转易主，扩建开放，成了妇孺皆知的莒城“耍场子”。园内老藤、古木、名花、盆景众多，鸟雀成群，台榭内集陈了大量古书画和先贤遗墨。宋式云年轻时经常在此观察花鸟、揣摩古画。当时庄陔兰正任贾府西席（教书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执画求教的年轻人，不仅悉心教诲传授画艺，还经常在其作品上题诗鼓励。宋式云因此深受鼓舞，画起画来更加用功。有一年秋天，他画了一幅鸡冠花，自己左端详右比划，觉得非常满意，一心想拿给庄陔兰看看，就下上工夫在鸡冠花上添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蛱蝶，心想，这次一定是要讨庄老师的表扬了。孰料，庄陔兰看了这幅《鸡冠花栖蝶图》后，不仅没有表扬宋式云，反而严肃的批评了他作画不注重观察生活的盲画行为。指出，蛱蝶的习性是循香落花、代花传粉，而鸡冠花是没有香气的，蛱蝶一般不会落在鸡冠花上。绘画艺术固然允许在生活的基础上想象发挥，但是在学习阶段，首要的是要观察生活、理解生活，因此这一阶段应该是画理服从物理。这个故事宋式云先生曾经多次讲过。

宋式云先生还讲过一个和著名画家于希宁到菏泽牡丹园写生作画的故事。那年春天，二老在菏泽牡丹园写生，住了二三十天，恰巧天津印染厂也有人在写生，两方不期而遇，带队的领导便邀请于老和宋老过去作画示范。等到了印染厂的住宿地，于老让宋老先画，宋老说：“于老师是山东省的大家，请您先开笔。”于老于是提笔作画，宋老一看，于老画了一幅蜀葵，心想，这花不容易画好，恐怕要费点劲。结果画了老半天，于老才完成，连声说不满意。等到要宋老画时，宋老画了一幅梅花，刚起笔，旁边的一位老师傅看他们已经站了很长时间了，就说：“你画着，我去提壶水来泡茶你喝。”说罢就走了，茶炉子当时离房间也就不足50米，结果那位师傅水还没提回来，宋老就已经画完了，而且效果非常好。从此，天津印染厂的画家都对宋老高看一眼。事后宋老说，笔会作画，必须干脆利索，出手快捷，把最成熟的技术表现出来。

据王君安先生和宋老的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宋老在上海朵云轩举办个人画

展，刚开始联系布展时，展览部主任应师流在办公室里接待的宋老一行，看到是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来的，可能认为是到大都市出来瞎忽悠的，说话总是爱搭不理的，打着官腔接待。等宋式云先生在展厅布展的时候，应师流恰好从展厅经过，看见了宋式云先生已经张挂出来的几幅画，便停下脚步，看了一会，等看完画，发现宋老亲自在布展，马上走过去说：“哎呀，您的作品可是真正的大家手笔啊，张挂作品这样的粗活，怎么能让先生亲自劳动。快拿板凳请宋老坐下……”宋老说，通过这件事他体会到，真正遇到识家，是不看名气大小的，关键是手底下要有真功夫。即使有时不被认识，作品和时间将会说明一切的。

三、从式云先生悟画理

开始学画时，学哪一家的呢？古人学习绘画注重启蒙、讲究师承，认为吃的“第一口奶”好坏非常关键。事实也是如此，在学习的道路上，最早接触的东西往往印象最深，有些会影响一辈子。启蒙教育是个一切从无到有的过程，一上手框架打成什么样，基本上也就什么样了，以后再改变就相对比较困难了，所以古人就有“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感慨。现在信息技术发达，影象、印刷资料铺天盖地，个中水平良莠不齐，初学画者往往望洋兴叹，一旦上手又歧路亡羊，稍有不慎误入歧途，则积习难改贻误终生。

什么样的画作和画家算是“上”呢？这里面有一个对作品和画家评判的标准问题。一般说来，算得上经典的作品，必须经过“时间”“空间”“专家”的认可。因为古人的作品能够流传至今，是经过了历史检验、沉淀下来的，必有可取之处；画家在某地，作品传全国，没有过人之处，是难以流传的；不懂画的人可以根据个人爱好随意评判作品，但是专家们一致说好的作品，肯定是真正的好画。另外，一般好的作品，除去笔墨、构图不谈，他的细微之处如题款书法、用印也都是非常讲究的，而且往往是诗、书、画、印皆出自画家本人。再看画家。现在笔会活动比较多，如何识别画家真实水平？那么请注意了：如果身边有女学生带进带出的、经常手拿毛笔看着白纸久久不动笔的、每一幅画都要拿手或拿木炭条在纸上左打右打稿子的、还没有画上几笔一盆清水就漆黑如墨的、画画时毛笔与纸经常成15度按擦点的、手上的笔头一直是左歪右倒的、落款书法写得一塌糊涂的，一般是画得不好的！

因为中国画讲究章法、讲究用笔、讲究用水用墨。如果一个画家连章法、纸性、笔性、水性都不懂，如何是个好画家？相反，如果见到一个画家拿起笔就画，蘸水就画，蘸墨就画，笔杆大多时间是垂直的，每一笔都是回锋的，一边画一边谈笑风生嘴里哼哼小调、唱唱京剧的大多是高手。

初学国画，必先掌握用笔用墨。在看式云先生作画时，我认识到，所谓墨分五彩，一笔下去，自然就有，而且是随着笔中的水分从湿到干、出现从湿浓墨到干淡墨的自然过度，再稍微蘸点水，则出现从湿清墨到干浓墨的过度。这期间只需蘸一次水即可，所以高手作画往往是一盆清水画到底，只在最后洗笔时换一次水，但凡看到某家作画时频频涮笔、频频换水者，往往不是深谙画理之人。所以要求初学者在训练时只单独练习墨分五彩，而不能晓之以理，不仅不利于掌握，恰恰相反，只能使笔墨更加僵硬。

如何看待中国画的创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有的人过分推崇创新、厌恶传统，把传统与创新简单对立起来，认为传统必须抛弃，“凡是传统的，就是旧的、坏的；凡是没有传统的，就是新的、好的”，主张另起炉灶，搞“全世界没有重样的”。对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窃以为，如果不是出于无知，恐怕就是别有用心。应该说，





如何对待传统，是每个画家都不能避开的问题。对待传统的态度：一种，认为传统是不可违离和超越的，因而躺在传统上原地不动或向后开倒车，这是顽固保守派；另外一种，认为传统要尊重，但必须发展，这是科学创新派。从宋式云先生的艺术实践看，他是属于后者的。学习传统，关键就是学习他们是怎么画的，体会古人为什么这么画，至于古人画成什么样，最终只是提供一种参考。所以式云先生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某家的作品，但是别人说我的作品像某家，这不是坏事，因为这说明我所想的、所表达的，与某家契合，这是某家就我而非我就某家，最多算是“英雄所见略同”罢了。式云先生的画来自于传统，但决不与前人的画雷同。式云先生师法自然而不抄袭自然，他经常讲，书画传统的精髓，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妙造自然必须要高于自然，高于自然还要不脱离自然。要让人看起来就知道你画的是什么，而且生动不俗，这是第一步。要是行家来看，就要仔细推敲，总结所画实物的生长规律，再大胆变形，该夸张的夸张，该删掉的删掉，叫人一看就是实物，与自然实物对照起来却又不全是，虽然不全是，但是比原来更加有神，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历代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宋式云先生作品的魅力在哪里？据参观过式云先生晋京展和上海展的权威人士说，先生的国画“大、老、新”。“大”即尺幅大、气魄大，常有丈二巨幅，纵横捭阖，气势逼人；“老”即用笔老辣、用墨老到，尤其是用淡墨作画，笔力雄强，不飘不浮，入木三分；“新”即构图新颖、气息清新，不僵不板，没有老年画家的陈腐气。根据笔者对宋式云先生画作的学习和研究，先生的画有“四美”。一是顺畅飘逸用笔美。式云先生的画强调“顺”，用笔因势生发，顺其自然。先生曾经告诉笔者，作画用笔最忌讳枉生圭角，枉生圭角则气不畅，气不畅则理不通，理不通看上去就别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先生的写意画，在用笔方面融入了工笔画的用线精神，精到、利索、圆润，讲究起笔收笔，先后有序。这种境界是很难得的。有的画家一旦写意起来就乱了阵脚，云山雾罩的交代不清，其实是暴露了基本功的不足。二是浑厚华滋用墨美。式云先生作画最擅长的是用墨、用水，墨色浑厚而不平板，水渍氤氲而不涣散，有点北人南相的意味，画面上少见北派画家惯用的焦墨渴墨，更多一些海派画风的滋润。这一点在先生的自述中也曾专门提及，足见先生自己也是相当认可的。三是雅丽平整用色美。先生的用色经过了几个不同时期，最开始是借鉴历代画家用色，后来达到了色彩斑斓，晚期作品则突出了色彩整合简约这一特色。在用色方面，他与潘天寿有暗合之处，喜欢将色平涂，与变化的墨色形成对比，以显色彩的张力；喜欢色彩本身的纯净，主张“墨不碍色、色不碍墨”，因此即使用高纯度的颜色也能获得雅的效果。四是变幻莫测构思美。宋式云先生作画驾轻就熟，随心所欲，而作品极少雷同，他抬手就画，从容不迫，几乎是不假思考。其实，宋老的“不假思索”是建立在他早年博览群书勤学苦练的基础上的，据说他青年时期，常常是一手抱着孩子一边画画；70岁高龄时，仍然每天作画50多幅，他在浮来小区的二层住宅楼，就是他画了一个月的画，用卖画款购买的。听父辈说，先生早年家境并不殷实，家里人多屋小，先生的“画案”就是厨房的大锅顶盖，作画时先铺上一块麻袋片，画幅大时就一点一点的卷着画，日积月累，先生练就了心识默记的本领，胸有成竹、心怀丘壑，构思层出不穷。从这个角度说，在构图上的变化，宋老是超过吴昌硕直追任伯年的。

名家就没有平庸的作品流传吗？答案是肯定有。名家确实会有一些应酬的平庸之作，这可能是当代任何一位书画家都不能避免的事情。当一个画家从开始买书买纸买墨、拜师学艺、废画无数辛辛苦苦几十年，到了好不容易出名、卖画的时候，不出钱就想从画家手里弄到好画，一般是不可能的，除非对画家有特别的感情投资，使画家给予特别的重视。因此日常交往碍于人情不得不画的画，即“应酬之作”，其艺术水

准是不能代表书画家真实水平的。就式云先生来说，真正能够反映式云先生最高艺术水平的，首选先生画的巨幅作品，再是先生的小品画。无论是式云先生的巨幅大画如《安居乐业》《旭日瑞鸟图》《青旗沽酒趁梨花》《玉堂富贵》《山雨骤来》等，还是小品册页如《斗蟀》《毛驴》等等，精湛的技艺背后，无不凝聚着他毕生的心血。

四、跟式云先生学画技

宋式云先生画路工些兼善、题材涉猎广泛，信手拈来，不落陈窠。他对几种花鸟反复提炼，总结出一套面貌独特的典型程序。

牡丹画法。牡丹是大花头的花卉，它品种繁多，色彩丰富，娇艳动人，深受国人的喜爱，有“国色天香”美誉。它是我国特有的花卉，也是中国花鸟画中最常见的表现题材。式云先生的牡丹画法脱胎于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海派大家，取法自然，融牡丹、芍药、大丽菊等大花花卉之精华，夸张花朵的大小而减小叶子的比重，往往花大叶小，花多叶少，花整叶碎，花层叠叶平整。基本的作画规律是：画花朵时，在笔肚着重色，在笔尖蘸白粉或朱膘，注意控制水分，保持最笔尖和最笔肚处的色彩纯正无杂，下笔时用捻笔法，每簇花瓣的运笔顺序如反写的“小”字，像山水技法中画山石的“大间小”法。花朵的整体形象像两个底座连接的碗。花艳、叶精、枝干细，删繁就简。其代表作品，是进京展的一幅丈二横披。画中综合了几大类形的牡丹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光英曾经亲笔致信答谢宋老与张静波老师所赠书画，信中洋溢赞美敬佩之情，现将复信内容照录于下：

静波、式云同志：

接到书画，非常高兴，书法苍劲有力，牡丹跃然欲出，实为大家之作，我当珍藏。我把静老两幅与中奇同志书法放在一起欣赏，真是各有千秋，堪称名家。我把式老牡丹与“牡丹王”（王道中）并挂，式老牡丹更加生动。式老《张衡侯风图》尝悬客厅，客人无不赞美。两老书画可惜宣传不够，今后当加强宣传，临书不胜敬仰，谨祝新年愉快、健康长寿！

王光伟、王澍，上

十二月廿三日

笔者在学画之初曾经学画式云先生的彩牡丹，记得当时还作了一首打油诗记录自己学画的感受：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世写牡丹花，吾师最传神。

雍容富贵颜，窈窕绰约身。小子学识浅，邯郸一效颦。

诗很幼稚，意思也比较浅显，开头引用苏东坡的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临”。就是说，衡量一幅画的艺术价值的大小，如果是拿形状像与不像自然物来评判，那么他的见解就跟小孩子一样了。在我见到画牡丹花的画家中，我认为宋式云先生是真正把握住描写牡丹花的神韵，能够达到东晋士大夫画家顾恺之所崇尚的“遗貌取神”的境界了。式云先生把牡丹花的花头夸大，描绘出了牡丹花雍容华贵的气质，表现一种盛世景象。他把牡丹的干进一步简约变细，只用细细的一划，就产生了铮铮铁骨的力道，将整个花头撑到了半空，拉大了画幅的空间，细细的花干如亭亭的舞女的腰肢，轻盈苗条。式云先生喜欢画风中的牡丹花，枝干在风的作用力下微微弯腰，花叶翻遮着花头，有种淑女临风回眸一笑裙裾飞动的美，下垂的花苞也有那种羞涩的少女伫立在小池边对着水中的倒影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味道。花与干、面与线、粗与细、动与静、雍容与妩媚、情与境，这里的对比统一是何等的完美！式云先生笔下的牡丹花完全被赋予了高贵的人的品格！环肥燕瘦、百般风情集于一身，这是多么的

美妙啊！我初涉此道，学识疏浅，不能深深的领悟宋式云先生绘画艺术的妙处，只好仿着画了一张宋式云先生的牡丹，算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吧。

梅花。历代鲜有先生画法，枝干交叉有序随意生发，尤其以巨幅见长。据先生介绍，画梅花要先学会结顶，欲下先上，欲左先右，构图有侧出折枝、有居中的。勾花要有聚有散，攒三聚五，不可平均用力，还要符合梅花的生长规律。点萼要用小笔，形状像“小”字，两侧点讲究圆润如珠，中间一点略呈“钉头”。梅花花蕊中间有一只稍长的雄蕊，其余的蕊要向花心收紧，画的时候要等到水分基本干了以后再画，用浓墨去点，要画得像眼睛一样炯炯有神。

菊花。笔者曾经对式云先生画的菊花与历代菊花作品作过比较，比较发现，式云先生笔下的菊花姿态万千，婀娜舒展，与历代大师的作品相比，鲜活生动许多。从这一点上看，与任伯年、赵之谦画菊作品伯仲之间，其他前贤作品具不足抗衡。其主要原因是式云先生的画更多的来自生活。他具有极高的天赋和超人的记忆，每到初秋时节，式云先生家中就多了几盆含苞待放的菊花，等到花开，式云先生总是极其专注地观察花的形态和神韵，然后走到屋里挥毫泼墨，画下刚刚看到的菊花形象。

鸡。宋式云先生画的鸡，有张书旗、任伯年、徐悲鸿的影子，气魄非常大。跟式云先生学画鸡，我的体会是，画鸡应该有鹰眼之神、凤尾之姿、鹤足之力；头要紧、脖要松、翎宜放、腹宜收。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画鸡也不例外，最重要、最传神的地方是鸡的眼睛，因此画好了眼睛，作品就成功了一大半。怎样才叫画的好？那就是要传神、要有神采，鹰的眼光是禽类中最敏锐的，鹰眼什么样？上边线压半个眼珠，看上去往里凹，略呈方型，因此借鉴一下画鹰眼睛的技法，点眼珠时稍微靠前上方一点，更有人性化，显得有表情，活了。鸡冠一般头顶上的夸大略呈方型或梯型，突出一些，下部的稍小一点作椭圆型，为辅，耳朵后的画圈或半圈，再次之。这样在形状上、大小上都能形成对比，用笔上注意用圆笔多一些，水分稍大一些，表现鸡冠的质感（肉的，噜噜嘟嘟的）。古人讲画鸡冠用色一般用朱砂，忌用胭脂，因为鸡冠发紫一般是瘟鸡。但是乌鸡除外，现在也有画家喜欢用胭脂画鸡冠的，如中央美院的赵宁安。画鸡的喙，用干笔重墨，出手要利索。鸡的头骨与颈连接的地方应该表现出一定的弧度，显出后头的硬度。画脖翎一般用散笔稍干淡墨，画的蓬松一点、流畅一点，表现鸡翎的光滑感。背部湿笔重墨大块点虱，要见笔，略有弧的意思，体现鸡背突起感。两侧用干笔淡墨勾勒鸡翅上的小翎，然后用重墨从外向里画出长翎。然后用干笔淡墨扫出尾部细羽，注意要虚一些，留足空白，再用大笔浓墨抡出尾翎，三五笔足矣，用笔不可黏糊、碎，既要洒脱飘逸，还要能收得住笔，所谓“凤尾”。最后画鸡爪时要略微比真实的鸡爪粗壮一些，才显得有力。这样鸡的身上就有了黑白灰三色对比，头、颈、身子、尾羽、尾翎就形成了“实—虚—实—虚—实”的节奏。

鹰。集雕、鹭、隼等猛禽之精神，取法八大山人、林良、吕纪，与李苦禅、潘天寿等画鹰高手拉开距离。

鹤。取王雪涛画鹤之头脸，取任伯年画鹤之笔墨感觉，特别是吸收了任伯年工笔画鹤翎的程式，并进行了夸张，节奏感更加强烈，身段婀娜潇洒。纵观古今画鹤者，从数量上看，十只鹤已经算多的了，宋徽宗所绘群鹤飞翔图，亦不过区区16只，而县政府办公室就有先生1990年画的一幅《百鹤图》。从姿态上看，古代大家画鹤多取其飞翔之态，当代高手画鹤多作静止、行走之姿，而先生所绘群鹤，有栖崖、有行走、有振翅、有飞翔、有戏水、有啄羽、有远飞、有下潜……大小形态各异，集历代之大成，又自出心意，不与古人同。

古柘城位置考

虚静斋主人

《春秋·隐公八年》记载：“三月，郑伯使宛来归柘。庚寅，我入柘。”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说：“柘，郑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费县东南。”杜预是西晋人，西晋时期费县县治是鄆城，位于今费县西北二十五里的上冶镇西城、古城村一带。

杜预所说柘邑“在琅邪费县东南”的具体位置，专家学者持有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柘邑就在今费县县城，当地志书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临沂市博物馆的李玉亭等人则认为，柘邑在费县探沂镇的许由城。他们的主要依据，是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的一段话：“柘，郑祀泰山之邑，在今山东费县东约三十七里处。由此可知‘柘’应是今费县探沂镇东北的许由城，此城北之河现仍名柘河，当以此城为名。”《费县文化志》也认同李玉亭先生的观点，把古柘城遗址定位在探沂镇许由城。

笔者认为，要想弄清这桩历史悬案，还得从《春秋》谈起。

大家都知道《春秋》有“三传”，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关于“郑伯使宛”这一事件，在《左传》中所记载的《春秋》经文是：“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而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中所记载的《春秋》经文却都是：“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庚寅，我入邴。”一个说是“祊”，两个说是“邴”，出现了明显分歧。

《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用汉时的隶书写成的，称为“今文春秋传”；《左传》则是古文，秦始皇禁毁诗书后，《左传》不见于世，到了西汉初年，由荀子的门生张苍献出，称“古文春秋传”。左、公、谷“三传”，都是转受《春秋》经旨以授后世者，但《左传》详于记事，《公羊传》《谷梁传》详于诂经。诂经必须依经训解，所以《春秋》中所没有的，《公羊传》《谷梁传》未尝言之。左氏记事则不同，有的是《春秋》经文中没有的，而《左传》特记其事；有的是《春秋》经文中有的，而《左传》却不记其事。因此，西汉今文博士曾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与《春秋》没有直接关系，而认为《公羊传》《谷梁传》得《春秋》真意。

依此看来，《公羊传》《谷梁传》所称“郑伯使宛来归邴”更真实可信。何况，“三传”之中，称“邴”者与称“祊”者形成二比一的局面，本身就很有说服力。公羊高是齐国人，谷梁亦是鲁国人，两人不约而同地称“邴”而不称“祊”，绝非偶然。有人认为“祊”与“邴”是通假字，过于牵强附会，是受了“春秋三传”分歧的影响，试图抹平分歧。其实，“祊”自是“祊”，“邴”自是“邴”，互不相干。

由此可以断言，今费县探沂镇东北的许由城，就是古代的“邴邑”，也就是杜预被《左传》误导的所谓“祊邑”。杜预说“在琅邪费县东南”，大致方向还是正确的。鄆城东南25里是费城（祊邑），费城正东偏南37里是许由城（邴邑）。

至于“祊”，原是费县的一处祭祀场所，与“郑伯使宛”这一事件没有什么关系。

“祊”的本义是庙门，泛指祭祀场所。据《后汉书·志第二十一》记载：“费侯国，故属东海。有祊亭。”说明在东汉时期，费县的祭祀场所“祊”的附近有一个亭子，供旅客停宿之用。此处濒临河流，适合居住，随着人口渐众，乃以“祊”为中心，扩建为城邑，曰“祊城”。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费县县治从鄆城迁到此处，并加以增修扩建。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今县之外城即故祊城。”《光绪费县志·城池》记载：“县城在古祊城北。”《费邑古迹考》也说：“古祊城城址即今县治外城。”外城即今天的县城南关一带，考其具体位置，应该在今天的颜真卿公园内，东濒祊河。

有一点需要特别申明：流经费县县城的这条河流，自古不叫“温河”，而是叫“祊河”。它之所以叫“祊河”，就是因为它的岸边有个祊城。《光绪费县志·古迹》说：“惟治东之水，土名曰祊，当因祊邑得名。”早在北宋嘉佑七年（1062年），曹辅撰写《唐鲁郡颜文忠公新庙记》，其中就说道：“其十一世孙安上者，祈自出缗钱，买地祊河之东。”（《光绪费县志·金石》）这是史籍中第一次出现“祊河”。现存的《康熙费县志》作“祊河”，《光绪费县志》作“祊水”，从来没有叫过“温河”。1982年《费县地名志》所附《1896年费县行政区划示意图》《1930年费县行政区划示意图》中，都是标注“祊河”而非“温河”。祊河是沂河的支流，源头在平邑县的太皇崮（古称大匡固），从太皇崮到沂河交汇处，全程都叫祊河。流经上冶镇的那条浚河，是祊河的支流，在南东洲汇入祊河。

费县确实有一条“温河”，在梁邱镇，是祊河上游“温凉河”的支流，发源于镇西马家沟附近的山泉，全长14公里。1944年1月，抗日民主政权在费县南部成立了一个“温河县”，就是得名于这条河流。“温河县”这个名字只存在了两年多，1946年4月改称费县。

1995年费县人杨文学、刘金保创作的电视连续剧《温凉河》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温凉河”这个名字开始在费县越叫越响。从此，“沭河”这个名字逐渐被“温河”“温凉河”所取代。受此影响，近几年出版的一些书籍、地图，把流经费县县城的河段称作“温河”或“温凉河”，把浚河汇入沭河之处南东洲以下的河段才称作“沭河”，这是极不妥当的，不仅与费县古代志书的记载不符，也与沭河名称的来历不符。

（上接卷首页）

第二，要按照“走在前列”的要求思考、安排史志工作。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山东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的明确要求。今年省人代会期间，省委书记姜异康同志参加临沂代表团讨论时，提出临沂要按照“走在前列”的要求谋划和推进工作，我市史志工作同样要“走在前列”。要按照刘爱军主任的要求，出色完成规定动作，同时要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分清轻重缓急，选准着力点，开展有临沂特色的自选动作。

第三，要按照临沂加快科学跨越发展的要求安排、部署史志工作。特别是在挖掘历史文化、发扬红色文化、弘扬沂蒙精神等方面，要有新的思路，取得新的突破。我们在历史上很辉煌，要形成一些具体成果，增强临沂干部群众的历史自豪感。但也要看到，我们现在处于相对欠发达状态，还要增强临沂干部群众搞好当前工作、实现科学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临沂人在历史上、在文化里、在骨子里就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有这样的历史传统，现在更应该敢于担当、敢于亮剑，在推进临沂加快科学跨越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四，要用改革的思维、法治的办法推进史志工作。这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对史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市史志办向社区基层党组织赠送《沂蒙革命根据地志》，推进史志成果进社区、进农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开通的“沂蒙史志”官方微信、研发的“智慧临沂”手机软件，都是改革创新精神的体现。下一步，要注重运用法治的方法推进工作，研究制定相应的办法、规定。

第五，各级党委政府要为在新形势下做好史志工作提供保障。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史志工作，把史志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为史志工作提供必要的人、财、物，要关心史志部门同志们的成长，在生活上、政治上等各个方面给予关心。党政领导干部也要懂史志工作，成为做史志工作的行家里手。

临沂将以这次刘爱军主任的调研为契机，全面加强史志工作，也希望刘爱军主任、省史志办继续给予我们更多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史志工作非常重要，只要我们扎实苦干，就没有任何力量、任何事情能拦住我们前进的步伐，在任何岗位上都可以做出成绩，大家要积极努力，继续做好临沂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沂蒙精神的挖掘工作，进一步扩大研究成果，做出一些有历史价值、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扎扎实实的东西。

“东莞”地名南迁 与青、徐士族南渡（四）

李 泮

四

（一）葛洪与东官

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分南海，立东官郡，置宝安县。（《宋书·州郡志》）

广州刺史邓岳表葛洪补东官太守，辞不就。

东莞县地在晋成帝六年时，属东官郡宝安县。与东官郡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葛洪。《晋书·葛洪传》载：“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祖玄，吴大鸿胪。父悌，入晋为邵陵太守。”《晋书》说葛洪是丹阳句容人，《太平御览》说葛洪为琅琊人，恐怕这两种说法都对。葛洪祖上是琅琊人，汉末祖父葛玄避乱江左，居丹阳句容（句容为晋时南东莞地），为孙吴政权的高官大鸿胪。父亲葛悌，入晋后为邵陵太守。葛洪少好学，性寡欲，尤好神仙导养之法。祖父葛玄，学道得仙，以炼丹术秘授弟子郑隐。葛洪就隐学，悉得其法。后又师南海太守鲍玄，玄以女妻洪。石冰作乱，葛洪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稽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广州刺史邓岳表葛洪补东官太守，辞不就。坚持在罗浮山炼丹，并“著述不辍，自号抱朴子。”

葛洪，祖籍琅琊，南迁后居丹阳句容，喜欢神仙导养之法，避乱广州罗浮山，炼



葛洪论道

丹成仙。邓岳荐他作东官太守，他不就。东莞是他的故乡，东官是他的住地，这两个同音字在他和他的门徒口中，有可能互用。《抱朴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葛洪在东官甚至于整个广州影响深远。东官、东莞的混淆、互用，恐怕跟葛洪有关。

（二）卢循、琅琊人与广州

公元399年10月，琅琊人孙恩率农民军在南徐州会稽起义。

琅琊大族孙氏，“世奉五斗米道”，孙恩叔父孙泰，南迁吴郡、会稽后，为五斗米道道首。百姓对五斗米道“敬之如神”，东晋政权惊恐，晋孝武帝（公元373—396年）时，将孙泰流放到广州。

孙泰被杀后，孙恩于公元399年10月，在会稽揭竿起义，江浙八郡一时而起，“旬日之中，众数十万”。（《晋书·孙恩传》）孙恩军的主力，都是侨居南徐州、南青州的北方流民。孙恩起义军与刘牢之的北府兵转战各地，最后因临海之战失利，于公元402年率部投海而死。孙恩死后，起义军推举其妹夫卢循为首领，卢循于公元403年正月开始，率部攻打东阳、永嘉，又退居晋安（福州），次年十月，泛海攻下番禺，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刺史事。此时，北府兵将领刘裕（即宋高祖武帝）掌握了东晋大权，因无暇南顾，承认卢循为广州刺史。卢循率领以琅琊、东莞等青、徐南渡流民在广州经营五年多。

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刘裕迁建威将军孙处，振武将军沈田子率众三千自海道袭番禺，卢循与孙处、沈田子转战各地，最后广州一役，“循乃破走，所杀万余人”。（《宋书·孙处传》）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孙处卒，追赠龙骧将军、南海太守。

以琅琊五斗米道为旗帜的孙恩、卢循农民起义军，最后在广州惨败。广州惨败后，被杀万余人，因此随卢循远征交、广二州的青徐流民恐怕有数万之众。数万青徐流民除被战死或被俘虏者外，很多残余恐怕就流窜交、广二州隐蔽为民。民间也有传说广州有卢循遗民，广州东南有卢亭，南海县有卢循城，这里有民以“采藤蚶为业”，“相传为卢循遗种”。（《图书集成·职方典》）“大奚山三十六屿在莞邑海中……传系晋海盗卢循遗种”。（《岭海见闻》）值得注意的是《岭海见闻》把卢循遗种所居地称为“莞邑”。南海有循江，此地一度名循州，这一切恐怕都与卢循有关联。

（三）关于广州刺史韦朗作莞蓆事

文帝元嘉（公元424—453年）中，御史中丞刘楨奏：“风闻广州刺史韦朗于广州所作银涂漆屏风二十三床，绿沈屏风一床，杂白莞蓆三百二十二领。请以见事追韦朗前所居官。”（《图书集成》引宋元嘉起居注）

莞蓆，即用莞草编织的蓆。《汉书·东方朔传》云：“莞蒲为蓆”。古人蓆地而坐或跪，《诗·小雅》：“下莞上簟，乃安斯寝。”郑玄注：“莞，音官，又音完。莞，小蒲之蓆也。”《周礼》曰：“凡大朝觐，设莞蓆。”《汉书》曰：“文帝以莞蒲为蓆”，表明莞蓆是很高贵的坐具，是宫廷用品，始自周朝。《盐铁论·散下不足篇》云：“大夫士蒲平单莞，庶人单蔺。”莞蓆为官人所用，庶人用蔺蓆。

莞蓆因为是宫廷用品，历史悠久，不可能是广东的土特产，《唐六典》曰：“京兆出粲草蓆，扬州贡莞蓆，广州出竺蓆。”但元嘉中，广州刺史在广州做“杂白莞蓆三百二十领”，韦朗拥有这么多莞蓆，与那些众多高贵的屏风一样，有违宫廷礼制，属不正当行为，因此须查处。

莞蓆本来是宫廷用品，原产地在中原，或者扬州，不是广州土产。但这时广州也出白莞蓆，恐怕与琅琊的孙恩、卢循遗种有关，与卢循的“莞邑”有关。

（四）刘宋王朝中的琅琊、东莞人

宋武帝刘裕，彭城人，但其祖刘旭孙始过江，居晋陵丹徒县京口里。晋陵，南琅琊、南东莞、南兰陵、南东海的集居地；京口，以青、徐士族为主体的北府军大本营。刘裕起事，其三核心成员是同乡刘毅和琅琊人何无忌；“并同义谋”起兵事的有琅琊人、晋陵太守诸葛长民、东莞太守檀凭之、琅琊内史魏咏之、东莞童厚之；“高祖（刘裕）托以游猎，与无忌收集义徒。”所收同谋异徒除上面所列何无忌、刘毅、檀凭之、魏咏之等人外，还有东莞人臧熹、臧熹从弟宝符、从子穆生，东莞人童茂宗等。总之宋武帝刘裕的先祖、刘裕的起事地和起事成员，都与南徐州的琅琊、东莞等有紧密关系。

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刘裕打败卢循的农民起义军后，因孙处卒，命琅琊临沂人王镇之出使持节、都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

元嘉（公元424—453年）初，徐豁为始兴太守，后为广州刺史。徐豁，东莞姑幕人，中散大夫徐广兄子。始兴郡是三国旧名，在今广东韶关南。《宋书·徐豁传》载：“在郡著绩，太祖嘉之……。以为持节，督广交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

（五）对宋、齐、梁书纪传中“东莞”的分析

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分南海立东官郡。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晋安帝分东官立义安郡。

《宋书·州郡志》载，这时的南海郡领县十，有番禺、博罗、增城等，无东莞县；东官郡领县六，有宝安等，无东莞。博罗、增城、宝安，都涉及后来的东莞县地。

《南齐书·州郡志》载：南海郡领县13，东官郡领县八，均无东莞县。

《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只有南海、东官郡，无东莞郡，也无东莞县。但《东莞县志·前事略》，从宋、齐、梁书纪传中引用了七处有关“东莞”之文，以此证明宋、齐、梁时，广东就有东莞。这七处引文能否证明宋、齐、梁时，广东就有东莞？或者说广东的“东莞”与“东官”有某种联系，下面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1、对阮长之任东莞太守的质疑

《宋书·阮长之传》中有“寻补卢陵王义真车骑行正参军，平越长史，东莞太守。”之文。

这件事很蹊跷，因为义真为宋武帝刘裕次子，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封卢陵王，永初二年，以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与陈郡谢灵运、琅琊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宋书·卢陵孝献王义真传》）表明卢陵王义真有政治野心，空口许诺同党得志后封宰相、都督之官。高祖刘裕崩后，太子义符继位。刘义符做了两年皇帝，游戏无度，不亲政事，东莞人徐羨之等人密谋废立，即“帝（少帝义符）后失德，（尚书徐）羨之等将谋废立，而卢陵王义真轻动多过，不任四海，乃先废义真。……乃废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安徽徽州）。”景平二年（公元424年），“羨之等遣使杀义真于徙所”。因此卢陵王义真，始终没有得志，而且宋武帝死后不久，便被贬为庶人流放在外，不久又被诛杀。

在上述背景下，卢陵王义真补阮长之为平越长史、东莞太守，只是空头支票，与得志后封灵运、延之为宰相属于一个性质。再说，卢陵王也从未分管交广二州事，但深得他信任的颜延之，恐怕与此说有些关系。颜延之，琅琊临沂人，祖颜约，零陵（治始安）太守。妹适东莞莒人刘穆之子刘宪之。少帝继位后，他出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把阮长之封为平越长史、东莞太守，可作为他在交广二州的一颗棋子，

但只不过是梦想掌权后的一种政治安排，随着卢陵王义真被贬、被诛，这一切安排都成泡影，因此，补阮长之为东莞太守并没有成为事实。

2、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齐王世子“与南康相沈肃之、前南海太守何县直、晋康太守刘绍祖、北地傅浩、东莞童禽等，据郡起义”。（《宋书·邓琬传》）

这里提到东莞童禽。这个“东莞”是徐州东莞还是广州东莞？从字面上无法确定。但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是齐王世子（齐王萧道成之子萧贇）与这些人“据郡起义”。齐王世子萧贇为南康赣令，南康赣，也即今江西赣州。与他一起起事的有前南海太守何县直，此时何已不是南海太守，已与南海无涉；晋康太守刘绍祖，晋康郡治元溪，于永和七年从苍梧分出；北地傅浩，（北地，一说三国魏晋侨治，今陕西耀县、富平。东莞童禽，既不是太守也不是县相，看来只是齐王世子的随从或者朋友。

《宋书》这段引文中还有“世子腹心萧欣祖、桓康等数十人，奉世子长子奔窜草泽，召募得百余人。”然后“据郡起义”。所有这些人都是跟随齐王世子萧贇在南康郡起义，与南海，与东莞均无关系。因此“东莞童禽”，只能说明童禽是东莞人，宋武帝刘裕起事时，他的核心成员中就有东莞人童厚之、童茂宗，很可能这位“东莞童禽”与童厚之、童茂宗是一个宗族的。因为童禽既不是东莞的守或相，他也不是在东莞起义，因此这里的“东莞”是“徐州东莞”，与广州无涉。

（2）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羊玄保兄子羊希，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初请女夫镇北中兵参军萧惠徽为长史，带南海太守，太宗不许。又请为东莞太守。”晋康太守刘思道反，“东莞太守萧惠徽率郡文武千余人攻思道”（《宋书·羊玄保传》）

《宋书》纪传中的这一条十分明确，萧惠徽为东莞太守，而这个“东莞”为广州东莞无疑。

（3）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妖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希，龙骧将军陈伯绍讨平之，迁东莞太守。”（《宋书·明帝纪》）

明帝泰始五年（公元469年）“东莞太守陈伯绍为交州刺史”。（同上）这个东莞无疑也是广州东莞，但这个“东莞”不是东莞县，而是东莞郡，即东官郡。

（4）齐武帝永明六年（公元488年），尚书令王俭迁陶季直“太尉记室参军，出为冠军司马、东莞太守。在郡号为清和。”

《梁书·陶季直传》中的这个“东莞”，很可能与广州无涉。在刘秉、褚渊、王俭任尚书令时，陶季直均在朝廷。刘秉以“齐高帝权势日盛，将图之。秉素重季直，欲与之定策。”季直拒之，秉被诛；“褚渊为尚书令，与季直素善”，渊卒，“季直又请（王）俭（渊卒后王俭为尚书令）为渊立碑。终始营护，甚有吏节，时人美之。迁太尉记室参军、出为冠军司马、东莞太守。”陶季直在处理与刘秉、褚渊、王俭三位尚书令的关系中，贤德过人，时人美之。因此在王俭任尚书令或太尉时，“迁太尉记室参军、出为冠军司马、东莞太守。”该传续说：“在郡号为清和。还除散骑侍郎、领左卫司马、转镇西谘意参军。”这些记载表明：陶季直主要是在朝廷尽职，因此这个东莞应为南东莞，即在都城建康附近晋陵的南东莞，不可能远在广州。

（5）齐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七月，“以中书郎萧遥欣为兖州刺史，东莞太守臧灵智为交州刺史。”（《南齐书·郁林王传》）

这个“东莞”可能是广州东莞。《南齐书·武帝纪》载：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六月甲午，“以宁朔将军臧灵智为越州刺史”；武帝永明八年（公元490年）

“以振威将军陈僧授为越州刺史”，表明这时臧灵智已经不是越州刺史，很可能为东莞太守。因此，臧灵智为太守的东莞很可能是广州东莞。

（6）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广州刺史王琳迁副将孙瑒先行据番禺，孙瑒破黄

洞蛮贼有功，“除东莞太守，行广州刺史。”（《陈书·孙瑒传》）此东莞无疑也是广州东莞。

上述六条关于东莞或东莞太守的文字中，（2）（3）（5）（6）条中的“东莞”，确实是指广州的“东莞郡”。（2）（3）出自《宋书》，（5）出自《南齐书》，（6）出自《陈书》。但《宋书·州郡志》明载，广州有东官郡，无东莞郡；南海郡有增城、博罗县，无东莞县；东官郡有宝安县，无东莞县。《南齐书·州郡志》与《宋书·州郡志》同，即广州有南海郡和东官郡，无东莞郡。南海、东官二郡有增城、博罗、宝安县（即后来的东莞县地），但无东莞县。《梁书》《陈书》均无州郡志。对此，《东莞县志》的说法是：纪传中“字也皆作“莞”不作“官”，文史不应抵牾。至此，考《晋书·葛洪传》云：邓岳表葛洪为东官太守，是晋时称东官，不云东莞，疑宋初改东官郡为东莞郡，故《纪传》皆称东莞，《志》特沿晋时旧称，仍做东官。”《东莞县志》的“疑宋初改东官郡为东莞郡”的说法，史无据。

一个地域之名，在同样的一本书的不同地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称谓？看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既然是客观存在，就必然有其产生的原因。因从文献中找不到产生此问题的直接答案，因此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做一些分析判断，甚至是猜测。

笼统地说，产生此问题必然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从客观原因讲，就如《宋书》的作者沈约说的：“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土，夕为卢、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混淆。”（《宋书·纪传总序》）东莞地处博罗、增城、宝安之间，原为南海郡，后又分出东官郡，为东官郡宝安县地。由于这个特殊时期“版籍为之混淆”，在这个大背景下，“东官”与“东莞”混淆不清，有其客观必然性。

如前所述，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青、徐士族南渡，在江左侨立南徐州、南青州。南琅琊、南东莞、南兰陵等若干侨州、郡、县都拥挤在一个区域，犬牙交错，如“梁境内共有23州，350郡，1022县……。在一个村落里就设立起州或郡县。”名称和隶属关系也改来改去，如《宋书》所曰：毗陵郡，“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永嘉五年帝改为晋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兴初，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毗陵、丹徒、晋陵、京口，变来变去，实为一地域，也即南东莞、南琅琊、南兰陵所在地。这时侨居江左的琅琊、东莞、兰陵等北方士族，共处一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圈子、生活圈子、文化圈子，他们的文化习俗逐渐趋于一致。

主观原因很多，主要如前面所述，在这个时期有大量青、徐，尤其是琅琊、东莞、兰陵等士大夫及其族人、附庸，或在交、广二州任职，或避乱在交、广二州，或军伍战败后流落交、广二州。总之，在岭南，或者说在广州，或者说在南海郡，都有晋、宋、齐、梁、陈的官员、客属和附庸，或任职或久居。这些人士的故乡叫“东莞”，而居地叫“东官”，久而久之，“东莞”、“东官”就模糊、混淆了。这样在他们的书信往来、奏折、文学作品中，“东莞”、“东官”就混合交替使用。由于东莞、琅琊、兰陵、东海人都杂居一处，非东莞的琅琊、兰陵、东海人，也把“东莞”、“东官”混合、交替使用了。

东晋、宋、齐、梁、陈，从皇帝到百官，其核心主体为青、徐士人。公元307年，晋怀帝任命琅琊王司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西晋灭亡后，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东晋王朝开始。司马睿的政治依靠是琅琊临沂人王导，军事依靠是王导堂兄王敦，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王与马共天下”。

宋高祖刘裕，祖为徐州彭城人，但世居京口。前文已提到，京口为青徐士族聚居地。刘裕起事，其核心成员多为琅琊、东莞等青徐士族。替刘宋王朝南征北战，功勋卓越的，主要是北府兵（驻京口）将领。如：世居京口的东海何无忌，建威将军东

莞莒人、世居京口的刘穆之，东莞姑幕人徐澄之家族（徐邈、徐广、徐豁、徐浩），左司马、司空东海郟人徐羨之和徐羨之之侄徐湛之，东莞莒人臧熹、臧质父子，北海剧人参军王镇恶等。其嫔妃也多为青徐士族，如孝懿皇后为兰陵人，武敬皇后为东莞人，孝武皇后为琅琊临沂人，明恭王皇后也是琅琊临沂人，

齐高帝萧道成远祖为汉相萧何。萧何居沛，孙彪侍中免官居东海兰陵，中朝乱时，子孙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东海兰陵与东莞为相邻二郡，南兰陵、南东莞又都居晋陵武进，因此兰陵萧氏齐国与南东莞各士族大家共居一处、密切交往由来已久。

梁武帝萧衍也是侨居南兰陵的士族，博通五经，依靠士家豪族维持国运百年。

五

综上所述，东晋和宋齐梁陈的政治中心始终在长江下游的建康（今南京），军事大本营在京口（今镇江），而侨居江左的青徐士家大族又多聚集在毗陵（今常州）。这样就在建康、京口、毗陵间，形成了一个原青、徐，尤其是原琅琊国士家豪族组成的政治、军事、文化圈子，皇帝、嫔妃、文臣武将是这个圈子的核心。在这个显赫家族和位重权大人物众多，而居地狭窄的圈子里，琅琊、兰陵、东莞这些地名，与他们的祖宗、身世、地位紧密相联。在交际语境和官方文书中，琅琊、兰陵、东莞都是引为骄傲的亮点。

从孙吴开始的历届朝廷，对政治疆域的管辖中，都十分重视广、交二州，因为那里资源丰富，又远离军事政治争夺的中心，因此不断地派遣官员去治理，其中就有不少东莞士族去任广、交刺史和郡守。这样在江左朝廷和广交二州的人员交流、文书来往中，就有意无意、经常不断地把广州的“东官”与徐州的“东莞”混淆、交替使用。

编纂史书的史官受此影响，也就把语言和文书中的这种混淆，不经意地移植到史书中。因为有些史官，他自己就是琅琊或东莞人。

现在的《宋书》是由（梁）沈约撰，但早在沈约的刘宋时，著作郎何承天等已经开始编纂《宋书》，“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六年，又以（徐）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宋书·徐爰传》）

何承天，东海郟人，五岁丧父，由母亲徐氏一手哺育。徐氏，东莞姑幕人，徐广之姊，熟读四书五经，故承天自幼训义儒史百家。何承天深受东莞徐邈、徐广及徐豁（广州刺史）的影响。

徐爰，琅琊人，后因罪徙交州，又“除广州统内郡”。

毫无疑问，沈约之《宋书》，是以何承天、徐爰的《宋书》为蓝本。因此《宋书》先天的带有青、徐或者说古琅琊国的痕迹和韵味。

《南齐书》，萧子显著。萧子显，祖为兰陵萧氏，生长于南兰陵郡兰陵县（今常州西北），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属于皇族成员。参加编史的还有檀超，檀超祖弘，为琅琊太守，檀超在琅琊长大。同理，琅琊人写琅琊事，就很容易留下琅琊的痕迹。

六

《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中，广州有“东官郡”，但均无“东莞郡”和“东莞县”。《梁书》《陈书》和《南史》，均无州郡志，此时广州有无东莞郡或东莞县，不清。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罢天下诸郡”，取消郡

一级建制，以州统县，行政单位就改为州、县两级。开皇九年，隋共有三百州。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改州为郡”，变为郡、县两级制。

据《隋书·地理志》载：当时广东这个地域，有南海郡、龙川郡、义安郡，无东官郡。南海郡统县十五，有增城、宝安、始兴等；龙川郡统县五，有博罗、海丰等；义安郡统县五，有海阳、海宁等。由此看出，有隋一代，既无东官郡，更无东莞郡和东莞县，今东莞县地的宝安、增城、博罗，分属南海和龙川郡管辖。

广州东莞县，根据史书记载，是唐肃宗李亨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设立的。

《旧唐书·地理志》载：“东莞，隋宝安县，至德二年九月改为东莞郡，于岭外其为名也。”《新唐书·地理志》载：“东莞，本宝安，至德二载更名。”《元和郡县图志》载：“东莞县，本汉博罗县地，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隋开皇十年废郡，以县属广州。至德二年，改为东莞县，取旧郡名也。”新旧唐书和元和志，均说是至德二年将宝安县改为东莞县，因此，广东的“东莞县”，从严格意义上讲，始自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这是历朝史书州郡志或地理志的记载，也是今《辞海》的定论。

至此可知，《东莞县志》“东莞县，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按此为东莞立县之始”的说法，主要依据是（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和（清）洪亮吉的《东晋疆域志》，即《元和志》的“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和《东晋疆域志》的“县与郡同立”。

按照后人的研究，《元和郡县图志》的最初刻本，是南宋淳熙三年张几仲用程大昌的钞本刊刻的，程在钞本叙说：“志传写久，有缺逸，讹误。”到了清代，张刻早已无存，惟抄本流传。而数百年的转相传抄，其错讹甚多。清代张驹贤以孙本为依据所作考证，对于“匡谬正疵，探本朔源。功绩不小。”张驹贤的《考证》与“东莞”有关的有三条：

“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张《考证》曰：“《晋志》‘莞’作‘官’。”

“晋于今县西三里置兴宁县，属东莞郡。”张《考证》曰：“‘莞’宜作‘官’”。

“东晋于此置海丰县，属东莞郡。”张《考证》曰：“王象之引‘莞’作‘官’，与《晋志》合，后仿此。《隋志》始作‘莞’。”

清人张驹贤的《考证》表明，他坚持《晋志》说，《元和志》里的“莞”，宜作“官”，是“东官郡”，不是“东莞郡”。

至于清人洪亮吉，在《东晋疆域志》中说的“县与郡同立”，也就是说东莞县与东莞郡是同时立的。（唐）房玄龄的《晋书·地理志》，只有南海郡，无东官郡，更无东莞郡和东莞县，因此“（东莞）县与（东莞）郡同立”，与《晋书》明显不合，不知本自何书。

祸害沂蒙山区的伪军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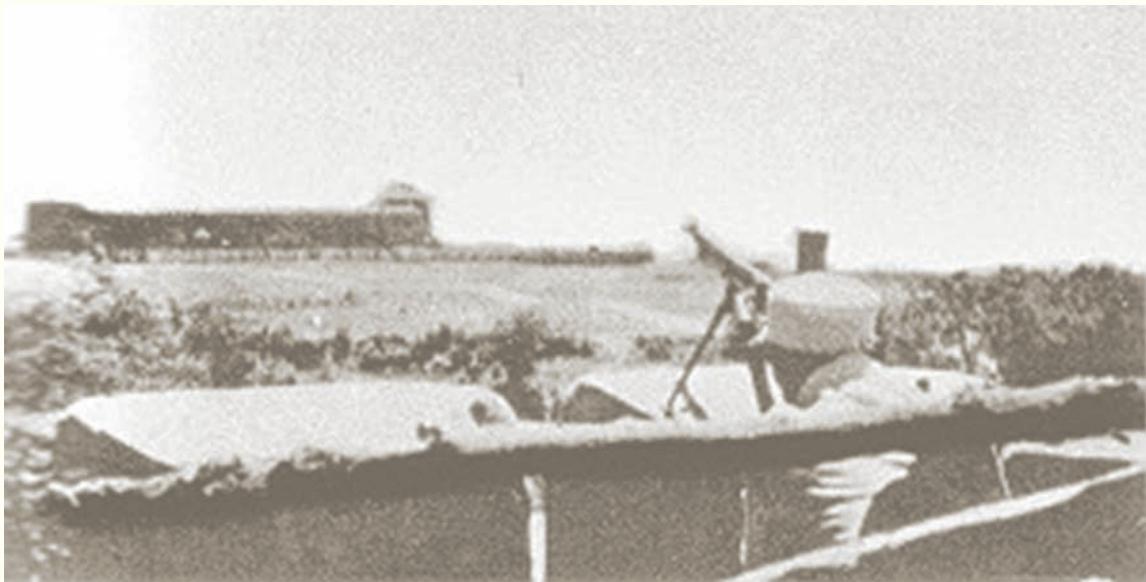
大荒堂主

抗日战争时期，祸害沂蒙山区的伪军，根据其隶属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日军编制内直接编成配属的伪军；二、伪满洲国军、汪伪政府军、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皇协军)等所谓的正规仆从军，属于日本扶持的各个伪政权掌握，以独立形态配合日军作战；三、区域性的伪军，如省、道、县的警备队、保安团，由所在省县的地方伪政权组织管理，作战时直接归日军管辖；四、乡村汉奸民团，在日军占领区内守土戍卫。伪军的来源多为投降的国军，以及收编的土匪，就地征召的“良民”，还有极少数叛变的八路军。下面分别叙述：

一、山东自治联军

1938年，伪满当局派遣伪满军配合日军作战，奉天省警备军第三旅是首批入关的帮凶，入关番号为满洲国派遣军李支队，2月抵达山东胶县。第三旅的副旅长叫张宗援，日本人，本名叫伊达顺之助，祖上是日本战国时代仙台藩的初代藩主伊达政宗。北洋军阀混战之时，伊达顺之助来中国给山东大军阀张宗昌作过顾问时，取中国名字叫张宗援。张宗援率主力赵保原部侵入山东后，根据日军尽快建立傀儡政权的意图，谎称是张宗昌的亲兄弟，借“狗肉将军”的影响招兵买马，先后收编了张宗昌的旧部程国瑞、高玉璞和土匪刘桂堂、张步云等，改称山东省自治联军，自任总司令。参与了进攻临



滨海部队围歼
伪军李永平部

沂，台儿庄战役等。1940年山东自治联军在日照解散。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张宗援作为战犯被判处死刑，于1948年6月1日被枪决。

赵保原部：1938年，伪满奉天省警备军第三旅骑兵六团赵保原部随日军侵入山东，改番号为伪山东省自治联军卫队师，随日本侵略华北的先遣部队南下山东。1938年3月，赵保原部在台儿庄战役中战败，5月退至胶县、即墨一带。1938年10月，赵保原率部1600余人反正，在昌邑接受了山东省第八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的收编，改番号为山东省第八区保安第三旅，很快得到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赏识，被任命为莱阳县代理县长，后又任山东省第十三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1940年苏鲁战区将赵保原部改编为陆军暂编十二师，赵保原任少将师长，从而成为胶东地区最大的实力派。1946年6月，赵保原在解放军攻打胶县的战斗中身亡。

刘桂堂部：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桂堂再次投靠日军，充当皇协军前进总司令。同年12月，刘匪随日军南下，进攻胶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先后进犯栖霞、莱阳等地，队伍扩充至3000多人。日军遂委任他当“皇协军司令”，驻掖县，曾参与日军进攻临沂。1939年2月，刘桂堂驻鲁南之部队与日军发生冲突，毙伤日军多人，刘桂堂借机打出了“反正抗日”的旗号，率驻胶东余部逃往蒙山。途中多次与日军发生激战，损失惨重。后投靠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担任新编三十六师师长，移驻费县。1943年3月，刘桂堂勾结国民党李仙洲部九十二军一四二师进扰鲁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八路军鲁南军区奋起反击，于4月23日攻克刘桂堂老窝锅泉。8月，又在大井村给予沉重打击。刘桂堂率部1500余人逃至费县南部柱子村，并公开投日，被任命为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师长。1943年11月15日夜，鲁南军区发起对柱子村的围攻，全歼该部，刘桂堂被击毙。

张步云部：1938年秋天，张步云通过高密汉奸第一次投降日军，被编为“山东自治联军”，所部编为4个旅，得到了武器弹药的补充，以诸城为基地，活动于高密、平度、安丘一带。

二、剿共军第四路纵队

1939年1月底，张步云在驻高密日军队长伊黑介绍下，脱离张宗援部，投靠了伪北平临时政府，被委以“剿共军第四路纵队”总指挥，辖4个独立团5000余人，活动于诸城、安丘、高密、平度、昌邑一带。1939年冬，张步云率部脱离日寇投靠国民党，随后被改编为山东保安第二师。

三、北支派遣军桐四七二〇部队（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直属伪军

司令项世荣，参谋长甄作周，七个中队。北支派遣军桐四七二〇部队驻青岛一带。

四、华北治安军（皇协军）第八集团

1940年1月14日，华北治安军在北平武庙建军仪式，第八集团驻山东平度。辖原独立第二十一、二十二两团（原独立第二十一团，驻山东济南；独立第二十二团，驻山东益都）。历任集团司令为：少将宋廷裕（1941年11月1日任命）、少将徐贯一（1942年10月4日任命）、王铁相（1943年任命）。历任集团参谋长为：上校祁继忠（1941年11月1日任命）、中校冷兆一（1942年2月4日任命）。

独立第八团，独立第二十七团，驻山东济南。

五、滨海地区警备军

1940年，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二团团团长李永平率部投靠日军，被编为滨

海地区警备军，司令李永平，参谋长谭永久，辖3个团2800余人。1944年10月李永平病死青岛，李贤斋接任司令，副司令于炳臣，参谋长谭永久，增至5个团、5个大队共4000余人。1945年11月八路军滨海部队攻克泊里镇，活捉副司令于炳臣以下官兵3500余人，击毙500余人。

六、山东省警备总队

1940年成立，总队长唐仰杜(兼)，副总队长王琦，直属警备本队，队长秦文斗，辖5个大队。1942年改称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唐仰杜(兼)，副司令王琦、曹若山、熊毅。是年底，省保安司令部辖10个支队4000余人。多时达到直属11个大队，1.1万人。

七、山东省第一警备旅

1940年临清的山东保安独立第4旅旅长冯寿彭部叛变，被汪伪军委会收编为山东省第一警备旅。

八、中国和平建国军

1941年组织，莒县人陈成功自任少将司令，有部属800余人，盘踞日照涛雒、栈子、夹仓等临海地带。1949年8月在济南被捕，次年5月在涛雒被处决。

九、灭共建国军

临淄保安团：原八路军临淄独立营1941年1月由营长王砚田叛变带出部分，被日伪编成灭共建国军临淄保安团，王砚田任团长。1944年春天，王砚田部被伪山东省政府改编为临淄县警备旅，王砚田任旅长。辖三个团，一个特务连，计4500人。

第八团：原国民党暂编第一师第二旅队伍，1942年10月由参谋长王道带出投靠了日寇，被编为伪“灭共建国军”第八团，王道任团长，1944年6月王道及“灭共建国军”第八团2000余人反正，被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王道为旅长。

十、鲁中地区汉奸民团

山东中部民团：原国民党苏鲁战区秦启荣部20旅11团，1939年8月公开投敌后被日军改编为山东中部民团。司令陈三坎，1941年下半年，陈部扩充到7000余人。1942年3月，陈听到日军要整编他的部队的消息，连夜带7000余人窜入蒙阴一带投靠沈鸿烈。后逃向沂水，改投吴化文部，被委任为独立旅旅长。1944年9月，被八路军鲁中部队包围，其部在隋家店全部被歼，陈三坎被俘自杀。

新汶煤矿剿共团：原国民党别动队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部第八梯队四团，团长万金山。1942年投降日寇，在新汶煤矿组织剿共团，自任团长。日军投降后，改任国民党军矿井大队长。

剿共治安军：原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九旅，旅长张文政，1941年10月在莱芜投降日军。编成“剿共治安军”，张文政任司令。1942年春，率部逃到沂源、诸城一带，先后投奔张步云、吴化文等部，日军投降后，被八路军俘虏枪决。

十一、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

即华北治安军第八集团，1944年1月1日，伪治安总署改称绥靖总署，华北治安军改称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辖第二十一、二十二、三十四团（即原第107团）3000余人，司令王铁相。该部于1945年9月被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歼灭在平度，司令王铁相被俘。

十二、和平建国军

第三方面军：该部由国民党军吴化文部投敌改编而成，吴化文在抗战前为韩复榘第三路军手枪旅旅长，1938年初韩复榘被枪决后，该部滞留山东，隶属山东省政府，1939年后隶属鲁苏战区，1940年被改编为新编第四师，吴化文任师长，驻鲁南临沂地区。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伙同该师参谋长徐子珍、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

鲁西保安司令部宁春霖等投敌，当月20日伪军事委员会将该部改编为山东方面军，吴化文为总司令，宁春霖任副总司令，郭受天任参谋长，于怀安为第一军军长。7月29日改编为第三方面军，辖第六、第七军2个军及直属第五十师。第六军，军长于怀安，副军长徐日政。第四十六师，师长许树声，辖3个团1290人。第四十七师，师长贺钊，辖3个团1250人。第七军，军长杨友柏，副军长赵光兴。第四十八师，师长赵光兴（兼），辖两个团1000余人。第四十九师，师长王桐宇，辖1个团550人。独立第五十师，师长徐日政（兼），副师长黄子才。1944年11月11日，经伪军事委员会点验后，取消“暂编”字样。1943年1月该部投敌时，兵力有12000人。是年1月、11月和1944年3月八路军山东部队发起3次讨吴战役，至1944年底仅余残兵6000人，1945年经补充有9000人，是年2月伪军委会将该部由山东调往安徽蚌埠地区，担任津浦路南段的护路任务。日本投降后，该部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改编为“先遣军”第四路军，吴化文任总司令。是年11月初该部第一、第六师2个师主力又被八路军歼灭。余部改编为徐州绥靖公署山东保安第二纵队，吴化文任司令。

暂编第一军：1943年7月张步云在山东诸城再次率部投敌，被日军编为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暂编第一军，军长张步云，副军长靳子栋，参谋长关镛。第一师，师长王吉祥，副师长李丹宸。第二师，师长郭竹亭，副师长郭信赖。第三师，师长张步云（兼）。

暂编第十军：1943年6月国民党鲁苏战区鲁南总指挥部所属第一一二师师长兼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率所部投敌，兵力4000左右，位于鲁南临沂、郯城一带。1944年5月汪伪军委会将该部编成暂编第十军，荣子恒为军长，副军长陈镇藩，辖3个师。第五十二师，师长荣子恒（兼），副师长朱纪勋，辖4个团。第五十三师，师长孙荣弟，参谋长张蕴珊，辖3个团。第五十四师，师长朱富玉，副师长李冠英，辖4个团，所部受到山东八路军的多次打击，1945年2月八路军又发起讨荣战斗，将荣子恒击毙。

鲁东和平建国军：1943年3月城顶山战役中鲁苏战区挺进二纵队司令厉文礼被俘投降日寇，所部编为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厉文礼，副司令申集安，司令部正副指挥胡鼎三、韩寿臣，独立一团团长胡殿楹，特务团团长胡鼎三，独立三团团长单勋臣，独立四团团长王治平，独立五团团长侯聚五，独立十团团长韩寿臣（包括原第八团王子春部）。第一旅旅长申集安，所属第一团团长王林茂，第二团团李鸿藻，第三团团张瑞麟，第四团团辛永功。特务二大队大队长秦冠三，手枪一大队大队长许子昌，手枪二大队大队长宿景玉，手枪三大队大队长赵××，手枪四大队大队长尾景元，手枪五大队大队长孙更川。大约有1.2万多人。

和平建国军独立第七十一旅：旅长李亚藩，原是国民党五十七军的副官长，辖两个团。1943年11月赣榆战役中全旅被歼，李亚藩被俘虏，后被处死。李亚藩死后，日伪重组七十一旅，杨步仁代理七十一旅旅长。杨步仁原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化名，1940年10月投敌。后不知所终。

和平建国军独立第一旅：原鲁苏战区第3三纵队第十八梯队，司令高松坡，1940年2月率1700余人投降日寇。1942年5月被日本人以改编为县伪警察队的名目缴械，士兵大多被日本人送到东北做了劳工，余部被编入和平建国军独立第一旅。

十三、山东国民自卫军第一集团军

司令张步云。第一军，军长张步云（兼），副军长靳子栋，参谋长关镛。第一师，师长王吉祥；第二师，师长张天和；第三师，师长郭济三；教导旅，旅长靳子栋（兼）。第二军，军长黄爱军。第一师，师长姚子栋，辖4个旅；第二师，师长纪叔和；第三师，师长张松山。

十四、警备队等地方伪军

诸城保安队张希贤部：1942年9月，山东保安十二旅张希贤率部向日军投降，被编为伪皇协军第一支队，张任支队司令，下辖六个大队，2000余人。不久，该部归属伪诸城保安队，张任副大队长。1945年1月张希贤部起义，率部一、四、五团近千名反正官兵进入八路军滨海根据地莒南县，被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三旅。

莒县保安大队莫正民部：原国民党苏鲁战区独立第三十二支队，司令莫正民，1942年春，莫正民再次投靠日军，被委任为鲁南剿共司令，队伍很快发展到30多个中队，3500多人，并进驻莒县城编为伪莒县保安大队，莫正民自任副大队长。1944年11月莫正民率领驻莒县部队30个中队、3500余人反正，被山东军区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莫正民任旅长。

伪沂州道尹公署保安大队·警备大队：伪沂州道尹公署剿共队1940年组建，由伪沂州道尹兼任总指挥。日军将山东划为十道，每个道均建警备大队，伪沂州道警备大队长由伪临沂县长吴志清担任。1943年辖6个大队，17个中队，计1200人。后又扩充到5000人，编成15个大队。1945年9月八路军解放临沂城时被歼。

伪沂水县保安大队：1941年由叛徒牛仙元组建，牛仙元任大队长。后改为县公署警备大队，扩充为15个中队，计千余人。1944年8月解放沂水城时被八路军歼灭。

伪费县警备队·伪保安大队：1939年由汉奸陈世彝组建，1943年扩充到9个大队计1500人。1944年12月大部被八路军歼灭。之后又组建伪费县保安大队，邵子厚任大队长。1945年9月在临沂城解放时被八路军歼灭。

伪蒙阴县自卫总团：1941年蒙阴县伪政府组建各区自卫团，1943年被编为伪和平建国军山东方面军教导一旅。1944年春又改编为伪蒙阴县自卫总团，辖4个大队，17个中队计1300人。1945年3月蒙阴城解放时被八路军全歼。

其他还有：李松山、王普江两部1400余人，活动于高密一带。鲁南益临清乡队，赵益增部400余人，驻临朐。警备团伊苛春部500余人，驻博山。鲁南第一路“剿匪”司令，刘仙洲部1500余人，活动于泰安、莱芜一带。鲁南“剿匪”司令部，鲁南自卫团丁懿千部1000余人，驻滕县。尹庆林、朱康怀两部500余人，驻曲阜。王敏萱部1000余人，驻泗水。刘金贵部500余人，驻邹县。临邾费民团刘克西部1500余人，活动于临沂一带。杨铭忱部300余人，驻胶县。

十五、兴亚建国军

原为八路军山纵四支队独立三营，后叛变为苏鲁战区第三纵队第二支队，司令杜心斋，再投靠周村日寇，自封兴亚建国军（皇协军），辖有三个大队，三个直属中队，共计1500人以上。活动周村、淄川一带。1942年被日军歼灭。



1945年1月17日
诸城伪军张希贤率
部1300余人反正



王小古年谱 (续)

刘瑞轩



1973年 癸丑 59岁

1月16日，相公中学语文老师刘瑞轩，通过朋友介绍，到红校拜小古为师。小古在看过刘作的花鸟、山水二件作品后，同意收为弟子。

1月18日，为瑞轩作工笔画《牡丹猫蝶图》，边画边讲褪色（牡丹）、晕染（月季）、撞粉（丁香）等染色方法，及猫蝶画法。共用两天完成。

1月22日晚，为学画者演示小写意画法，作《花鸟四条屏》（包括：《紫藤双燕》《桃花白头翁》《菊花绶带》《月季双雀》）。

1月24日晚，为学画者作范画山水《人民公社锁蛟龙》（夏蔚水库），并讲解山水画法。

1月25日晚，小古因担负重体力劳动，粮食不够吃，每月18元工资，也很拮据。瑞轩赠50斤粮票和20元钱给老师。

2月，作《花卉册页》（共12页），计有春天的花卉碧桃、玉兰、芍药、牡丹；夏季花卉荷花、虞美人、萱花、牵牛；秋天的花卉秋海棠、垂丝海棠；冬天的花卉水仙、梅花。每幅题上画法要点，如《牵牛》上题：“牵牛枝虽细，但须挺劲。”《芍药》上题：“牡丹富贵，芍药潇洒。”《梅花》上题：“此幅重点在于老干的画法。”此册共用四天完成。

2月1日，学生赵庆元、蒋怀宗二人相约冒雪去相公探望小古，小古作《墨梅》相赠并题诗：“淡墨聊作知己泪，只缘风雪夜来人。”

3月，为学画者作《墨葡萄》《枇杷》，并演示蔬果的画法。

4月，为乡友卜星光书毛主席诗一首《和柳亚子先生》。

5月，为振东兄作《猫蝶药苗图》斗方。

5月，为学画者作白描花鸟斗方四幅，包括“牡丹鸪鹑”“月季鸪鹑”“玉兰八哥”“菊花双鸡”，并附一纸说明白描与线描之异同。

5月16日，学生马世治自莒南大店小学来红校，看望老师。小古安排他在刘瑞轩处住宿。

6月，用学生从上海买来的好熟宣，作工笔《四季花卉册页》，每季20页，春、夏季花用勾勒填彩法，秋、冬季花用没骨法。此册共用两

月完成（令人惋惜的是，后40页被学生李某拿去散失）。

6月25日，马世治来信，向老师请求花鸟画构图方法。瑞轩代老师复信回答。

8月，作写意《忘忧草》轴，并题诗：“画个忘忧草，挥来含笑花……”

8月21日，学生李某来，请教月季花朵（翻瓣）画法。小古亲为示范，李某将范画带回。

9月，瑞轩调离相公中学，去临沂师专任教。临别赠粮票和钱给老师。小古亲自下厨，办家常饭菜，为学生饯别。

本年，五次写申诉书，由三子开端和学生等人送交县革委、地区革委、省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央联合接待室等处，要求平反，落实政策。但材料均被转下，不予解决。

1974年 甲寅 60岁

1月，为相公孙光耀老师作《葡萄》《丝瓜》二轴。

3月，写申诉书，交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要求重行处理，调回原单位。

4月，为厚山作《紫藤双猫》，仿崔白《寒雀图》作《梅雀图》卷，赠给来看望的学生孙振国。

为灌南卜星光作《樱花双猫图》《松鹰图》二幅中堂。由三子开端送回灌南。

6月，作《鹤梅双寿》轴、《菊花鸽子》轴、《月季白鸡》《紫藤双燕》。

7月，为学生瑞松作《花鸟四条屏》（包括：《紫藤双燕》《红蓼白鹭》《映山红雏鸡》《茶花喜鹊》）。又作《紫燕长藤》。

秋，为学生李厚山作《菊花三公图》，并题词：“厚山学弟习画有钻研性，吾不及也。”

10月，作《葡萄双鸡》。

10月，为学生刘某作《菊花》，作范画。

10月，因长期劳累，右肩长一硕大脂肪瘤，经领导批准，到医院接受手术。瑞轩带礼品、药品（治咳嗽气喘）前去看望。

作花鸟四条屏：“柳燕”“风荷”“芙蓉”“冬梅”。

同月，为季华作《紫藤小猫》轴。

作《菊花》轴，共画六种不同品种菊花。

11月，作《玉兰牡丹图》《海棠无香》轴、《月季》轴。

为振国作《白菊》轴。

本年，虚岁60，自刻《古年一甲》《古年甲子又从头》二枚印章。

本年，作品还有《芍药》轴、《葡萄双鸡》轴、《葡萄雏鸡》中堂、山水画《三峡》。

为学生厚山作《荷花图》。

为景云作《小猫》轴。

为学生刘某作《红月季》轴。作山水《三峡》。

1975年 乙卯 61岁

1月，作写意《芍药》轴。

春节，为刘心健用生宣作工笔《牡丹》中堂。



作《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堂、《墨竹》轴。

春节后，牟乃江邀小古去家中作画，并设宴招待。作品有《四季花卉屏》《牡丹》《梅花》等10多件。作陪的有段希洪、胡一民、李汝农、王顺喜、李肃等人各得画一幅。

春，为书杰作《牡丹孔雀》。

2月26日，写申诉书，转交地革委朱奇民等领导。由于领导的过问，临沂政法部门重新做出判决：“撤销原判，改处对被告王小古免于刑事处罚。”此后，小古回到临沂城家中（九中）。

6月，书行草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0月，作没骨工笔牡丹《风华正茂》。

初冬，作《菊花鹤鹑》轴。

冬，为瑞轩书行草联：“宝剑锋从磨练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冬，为振国作《月季双鸡》轴。

11月，夫人钱廉因患胃癌，在县医院开刀。

因本单位不愿接受，小古只好到临沂聋哑学校工作。开始帮校办木工厂画骨灰盒，以后自画国画。

为小女钱潮作工笔《荷花翠鸟》，并题诗：“小潮年不大，很爱画个画。……”

本年，为临沂汽车站画巨幅《韶山杜鹃万代红》《二柏万岁》；为临沂县招待所画巨幅《红梅》《临沂新貌》；为临沂县教育局画巨幅《牡丹》；为临沂县供销社大楼画巨幅《牡丹》数幅；为蔬菜公司画巨幅《山东大白菜》等。

为学生刘某作《菊花》扇面，并题诗。

为学生作《大鸡鸚鵡图》中堂。

作《玉堂春富贵》轴。作《双鸡图》轴。

作《月季蜜蜂》轴。作《桃花黄莺》中堂。

作《牡丹鹤鹑》中堂。作《秃鹰》中堂。

作《猫蝶牡丹》轴。作《苍鹰》轴、《葡萄》轴。

1976年 丙辰 62岁

春节，作《牡丹雏鸡》。为建章作《海棠》中堂。携女儿回灌南。为亲友作画多幅。作写意《荷花》轴。

春，为临沂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从义作写意四条屏：《金鸡报晓》《孔雀开屏》《菊花锦鸡》《松龄鹤寿》及《月季》轴、《葡萄》轴、《雏鸡相争》轴，工笔《鸟语花香》。为从义书魏碑鲁迅《自嘲》诗一首。

第二次去菏泽画牡丹。同去的有马世治等十个学生。期间，去美术公司讲课一天，又被山东艺术学院请去为学员讲课一天。

4月，作工笔《美人蕉》。作工笔《风华正茂》轴（牡丹）。

5月，作写意《荷花》，为龙宽作《天竺葵》。

为学生作没骨工笔《芍药》轴。为天楼作没骨《牡丹》轴。作《芙蓉图》。

同月，为明山作山水《锦绣河山图》中堂。为瑞轩作没骨花卉《芍药三种》。作写意《桃花》。

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帛画出土。与高天祥、张鹤云（济南）一起临摹复制帛画。原件存临沂文管会，复制品送故宫博物院。此画后发表于《文物》



杂志1977年11月号。

夏，为学生商开栋写印稿“银雀山下”。

7月，为顾林作写意《月季》轴。为伯立作《柳荫得趣》（双猫捕蜻蜓）。

作写意《鸡上树》轴。作写意《大鸡紫藤》轴。

作《芙蕖鸳鸯》，题诗：“芙蕖红灼灼，鸳鸯影双双。……”

8月，为立振作《葡萄》轴。书行草《牡丹八大色》作《双猫图》。为文物组刘心健复制帛画局部《纺织图》。

10月，作写意《老梅》，并题诗：“老干新枝世世红，不争春风报春风。……”

作《雄鸡图》，参加山东省美术展览。

11月，作山水《自古华山第一峰》。

12月，夫人钱廉病故。

12月9日，为感谢给钱廉治病的医生，小古在家设宴招待县医院宋景云，146医院李贤、张宏等大夫。瑞轩作陪。饭后，小古给每人作写意花鸟各一幅。

冬，为星光作《葡萄》轴。

为朝俊作《虞美人》轴，《芳春花灼灼》（桃花）轴。

为××弟作《大桃如斗》轴。

为书法家陈允升作《墨牡丹》二幅，《墨菊》一幅，并书对联：“荆山奇异人珍爱，铁砚功夫自不知。”

岁末，携女儿回灌南。住老友卜星光单位（县广播站），为卜星光和亲友作画百余幅。其中，为卜星光作《葡萄》，题诗：“今日重相见，回忆三十年。……”为卜坤扬作4尺中堂5幅：《葡萄小鸡》《莺歌燕舞》《牡丹猫蝶》《大鸡梅花》《年年月月开不败》（月季）

本年，通过画家宋式云，为莒县城阳书画社及莒县工艺美术厂，作工笔《牡丹》《月季》《杜鹃》《樱花》等多批次，共约几十张。通过青岛口岸，出口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

本年，作品还有：

为方田作工笔《白鸡菊花》中堂。为振国作《白牡丹》轴。为庚成作《小猫捕蝉》。为难友张占文作《牡丹》等画多幅。为葛长德作《菊花蝓蝓》轴。

为坤扬作《葡萄双鸡》中堂，并书一联：“宝剑锋从磨练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为飞尘作《葡萄大鸡》中堂，《小猫捕雀》轴。作山水《药农》中堂。作写意《墨梅》中堂。为学生作写意《三猫捕雀》轴。作《白鸡图》中堂。作写意《紫藤雏鸡》轴。为天楼作《葡萄》轴。作写意《老干新枝世世红》（梅花）。



巾帼铁流（四）

海 涛 高 雷 国 英



祁青若（1917—2006），原名綦馥，山东利津县人，1936年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组织决定祁青若跟随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到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机关党总支书记、教导员，1939年进入鲁南抗日根据地后，于1940年3月当选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省政府前身）委员，同时被选为山东省抗日总动委会执行委员。这年7月，山东省妇女救国总会在沂南县青驼寺成立，祁青若当选为副会长（主持工作）。同时被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1年10月，又兼任中共山东分局群众工作委员会委员。在担负这一系列工作中，显示了她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华。抗战时期，祁青若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山东妇救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妇女解放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市委秘书长，山西省煤炭设计院院长、党委书记，安徽省煤炭厅政治部主任等职。

刘孟（1914—2000），曾用名刘梦兰，淄博市人。1929年在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左联”。1937年10月协助丈夫李人凤成立“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任医院看护员，政治处宣传干事，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清河区妇救会副会长，1941年进入中共山东分局高级党校高级班学习，1942年任清河区妇委会主任，1944年1月任中共渤海区党委妇委会书记，1949年后历任中共华东局妇联秘书长，司法部人事司副司长，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第四届全国妇联执委。



方兰亭（1898—1964），兰陵县月庄村人，20岁嫁于小岭乡东盘石沟村周振苍。1937年入党。先后担任边联县动委会长、妇救会长，劝说石帮杰率领地方武装300余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1940年，边联县遭受灾荒，方兰亭家里住着八路军的一个班。为了给战士们弄粮吃，她偷偷把小女儿小兰卖给人家换回20斤谷子。1942年，大众日报社记者陈化鲁曾跟踪方兰亭进行报道。



刘时铁（1918—1998），原名刘秉慧，山东烟台人，曾国华中将夫人。1918年5月出生，1938年5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入党。长期做做妇女工作，先后任山东蓬莱县妇救会干事、鲁中区妇女救国联合会会长。1944年秋调入部队工作。历任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政治协理员、直工干事、副科长，1944年1月，在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期间与曾国华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军区子弟学校主任，四十九军干部军抚科副科长，空三军干部部任免科副科长，辽宁省科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空军政治部印刷厂副政委。

刘浩（1916—1989），山东沂水人。张仁初中将夫人。原名刘瑞徽。1916年5月生，在济南读了一年高中，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后在沂水小学教书。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同年7月入党。1940年12月与张仁初结婚。历任中共山东分局岸提干校宣传科长、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二旅宣传干事。解放军第二十六军政治部宣传部副科长、军后方留守处办公室主任、青岛市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等职。





汪瑜（1919—2004），原名瑜臣，山东泰安人，廖容标中将夫人。1937年7月毕业于济南女中，同年10月参加了“泰安抗日自卫团”，12月入党。1938年1月参加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当宣传队员。1939年至1942年，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妇委会工作员、鲁南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山东省妇救总会常委、宣传部长，鲁中区党委妇委会副书记。长期从事妇女工作。1940年与廖容标结婚。建国后于195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任上海市监察局监察处副处长，1956年1月调安徽省委，任纪检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安徽省委候补委员。1966年4月至1977年调任江苏省纪检副秘书长，江苏省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1978年2月任江苏省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省政协四届委员。1982年12月离休。

孙湘（1915—），河北省定县大王藕村人，1915年生。1932年在河北省定县简易师范参加革命活动，5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至1936年在北平育华中学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党团和市委总交通、民生总交通。1936年3月在北平入党。1936年夏在陕西省保安入抗大学习，1937年8月在抗大一队毕业，而后去中央党校五班学习。1937年在延安和赖传珠同志结婚。1938年任南昌市工作委员会委员、泾县张家渡区委书记。1939年任庐江县路西中心区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40年任六合县县委联抗组织部长，联抗主任。1941年任华东鲁艺学院总支书记，教导员。1942年任新四军卫生部总支书记，协理员。1943年到1946年任华中学院、建设大学，组织科长。1946年任一纵队后勤政治处副主任、山东华丰煤矿劳工处副处长。1947年任吉林军区司令部协理员，总支书记。1948年任东北铁道学院辅导处长。1949年任天津铁路局人事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铁路分局副局长，铁道部统计局局长、教育局长，交通部人事局长，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党组成员（副部级）。



王新宇（1918—1986），曾用名桂芬、平男，笔名心玉。1918年2月19日生于山东省诸城相州镇徐洞村。父王善亭为民主人士，曾在农村兴办平民学校，免费招收贫困农民子弟上学。王新宇在家庭民主思想影响下，于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荣立一等功。解放初期任山东临沂地区地委妇委会书记兼妇联主任。解放后历经政治坎坷、生活磨难。1965年身患癌症，仍自强不息。文革后被平反，担任徐州专署计委副主任，徐州市工会负责人、党组书记。1983年3月离职休养。1985年12月癌症复发。1986年2月13日病逝。

羊祜攻心破东吴

轻拨雨弦

三分归一统的最后一战进行得异常顺利，西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东吴像样的抵抗，一路势如破竹，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东吴的首都建业。吴国皇帝孙皓也像刘禅一样，把自己捆绑起来，抬着棺材向晋军投降。

从孙策占领江东算起（199年），到东吴灭亡（280年），东吴已经建国80多年，一个根深蒂固，传了四代帝王的政权，为何会如此不堪一击呢？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东吴的综合国力虽然不如曹魏，但也不可小觑。首先，东吴幅员广大，它拥有荆、扬、交、广四州之地，相当于今天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九个省份，以及现在越南的全部。

其次，东吴拥有200多万人口，以及20多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还有长江天险以及5000多艘战舰。当年曹操率领近30万大军下江南时，孙刘联军加起来也只有五万军队，但东吴却能把曹操打败。以后曹操一次又一次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讨伐东吴，但都无功而返。

到了魏文帝时期，曹丕雄心勃勃，很想挥师南下，完成统一大业，但他率领魏国大军来到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呼！固天所以隔南北也。”（《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吴录》）曹丕知难而退，只得将军队撤回，就这样，魏吴之间的拉锯战持续了数十年。谁也奈何不了谁，那么为何到了公元280年，这样一个建国近一个世纪的东吴政权，就突然土崩瓦解了呢？

众多史家认为，“吴蜀唇齿之国，蜀灭则吴亡，理则然矣。”（《三国志·孙皓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但事实上也未必如此，赤壁之战时，虽然名义上是孙刘联盟，但刘备地无一寸，兵不过数千，将不过关、张，力量弱小到几乎微不足道，东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曹操。何况，孙皓时期的东吴，无论是国土面积、经济实力，还是军队数量，都是赤壁之战时期的三至四倍。故而东吴的灭亡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寻找深层次的原因。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谋略上看，西晋伐吴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它在伐吴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这个准备并不仅仅是军事上



羊祜（221—278），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平邑县）人。西晋开国元勋。博学能文，清廉正直，娶夏侯霸之女为妻。曾拒绝曹爽和司马昭的多次征辟，后为朝廷公车征拜。司马昭建五等爵制时以功封为钜平子，与荀勖共掌机密。晋代魏后司马炎有吞吴之心，乃命羊祜坐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在之后的十年里，羊祜屯田兴学，以德怀柔，深得军民之心；一方面缮甲训卒，广为戒备，做好了伐吴的军事和物质准备，并在吴将陆抗去世后上表奏请伐吴，却遭到众大臣的反对。咸宁四年（278），羊祜抱病回洛阳，同年十一月病故。

的准备，而是军事上的攻心战。在三国历史上，使用攻心战术取得胜利的并不少见，著名的有吕蒙在攻取荆州之后，优待关羽及其部下将领的家属，从而迅速瓦解了关羽军队的军心，使关羽军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另外，还有诸葛亮南征孟获，七擒七纵，使用的也是攻心战术。

西晋使用攻心战术最成功的是荆州都督羊祜。“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闻。”（《晋书·羊祜传》，下同）晋武帝有灭吴之志，因“祜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謇謇正直”，故以其“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卫将军。”担当平吴的重任。

自古以来，凡用兵打仗，将帅都尽量要采取各种谋略来欺骗对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兵不厌诈”，但羊祜用兵却反其道而行之。载：“每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之以醇酒，使不得言。”不仅如此，在一次战争中，羊祜杀死了吴国的两个将军，但羊祜却没有把他们的首级砍下来向朝廷请功，而是“美其死节而厚加殓殓”。凡吴军士兵中有兄弟二人同时被晋军俘获的，“祜遣送还其家”，唯恐绝了别人的后嗣。

羊祜镇守襄阳期间，不轻开战端，而是广布仁义，怀柔人心。他“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

羊祜经常率领将士们打猎，东吴的将军陆抗亦喜狩猎，二支队伍离得很近，羊祜遂下令，“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如此一来，“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而不名也”。

三国时期，守边将士常常偷偷地跑到敌国地盘上抢割已经成熟的稻谷，以补充己方军粮的不足。有一次，晋军越过边境，收割了吴国土地上的粮食。东吴的将领当然非常气愤，但也可奈何。出乎意料的是，过了几天，羊祜居然派人送来一批布和绢，以赔偿吴军的损失。此后，“吴、晋之间，余粮栖亩而不犯，牛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猎，吴获晋人先伤者，皆送而相还。”（《三国志·陆抗传》注引《汉晋春秋》，下同）

东吴镇守荆州的大都督陆抗乃名将陆逊之子，他颇有乃父之风，是三国后期杰出的人才。陆抗看到羊祜并不采用武力，而是“增修德信，以怀吴人”，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招，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他告诫将士们说：“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为细利。”从此，陆抗、羊祜两人各自镇守自己的边疆，多年来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陆抗有疾，不寻医诊治，反“求药于祜，祜以成合与之，曰：此上药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诸将或谏，抗曰，羊祜岂酖人者”。不久，陆抗的病就痊愈了。

陆抗、羊祜的频繁往来，传到了吴主孙皓耳中。孙皓不悦，派使者诘问陆抗。陆抗回答道：“夫一邑一户，不可以无信义之人，何况大国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陆抗认为羊祜是用仁义道德来感化吴人，而吴国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就会中羊祜“攻心”谋略的圈套。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尽管陆抗已经意识到羊祜“攻心”谋略的厉害，并且也想方设法地尽量去弥补，但问题是吴国这时的政治已经腐败不堪，这一切都是暴君孙皓造成的。孙皓是吴国废太子孙和之子。吴景帝孙休于公元264年病死，孙休死的时候刚好蜀国灭亡，且吴国的交州又发生叛乱，“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左典军万或昔为乌程令，与皓相善，称皓才识明断，是长沙

桓王之畴也，又加之好学，奉尊法度，屡言之于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三国志·孙皓传》）于是，濮阳兴等人就下了决心，立孙皓做皇帝。

不料，孙皓刚做皇帝还不到几个月，就本质大暴露。他宠幸中常侍岑昏，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濮阳兴和张布前去进谏，他居然把这两个立他做皇帝的功臣杀了，又杀死朱太后和先帝孙休的两个儿子。据《孙皓传》记载，孙皓在位期间，“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惶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

孙皓还大兴徭役，广造宫室，“《江表传》曰：皓造新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左丞相陆凯力谏，孙皓不听。东吴原建都于建业，孙皓决定迁都于武昌（今湖北鄂城），作为首都必须建造新的皇宫，这是极其劳民伤财的事。“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于是编了民谣唱道：“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三国志·陆凯传》）。

孙皓荒淫好色，穷奢极侈，吴国自孙策以来，几代人经营的国库、粮仓被孙皓挥霍一空。陆凯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蓄，国有露根之渐也”（《三国志·陆凯传》）。

由于孙皓的暴虐无道，完全丧失了人心，当晋军发动全面进攻之时，吴军基本上不做抵抗。史载：“吴军土崩瓦解，靡有御者。”为何会如此呢？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孙皓积恶已极，不复堪命故也”。正是由于对暴君孙皓的了解，对吴国国情、民心的了解，羊祜才采取了“以德易暴”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确实收到了奇效。《晋书·羊祜传》载：“南州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为了哀悼羊祜，街面上都停止了买卖消费，商店打烊关门，这就是“罢市”一词的来源。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羊祜去世，不仅百姓悲伤，甚至连吴国的“守边将士亦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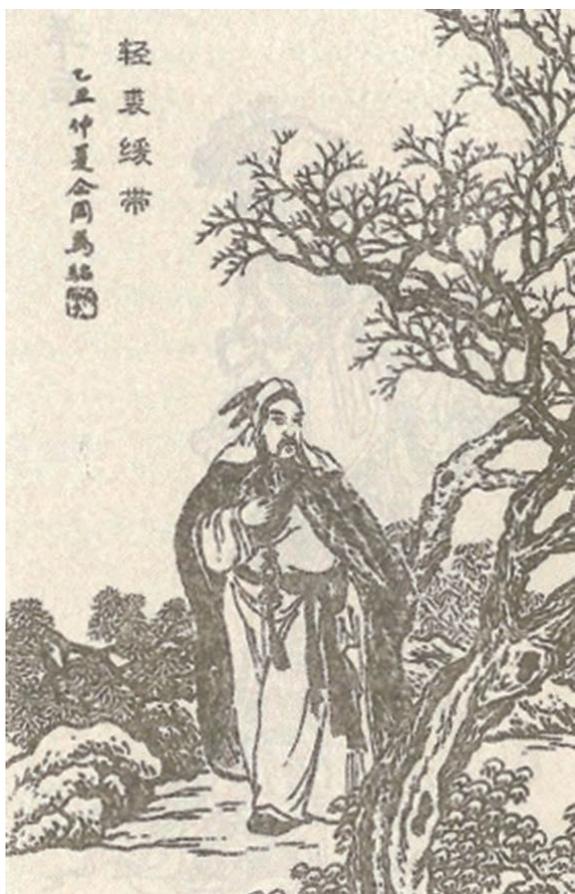
羊祜“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贍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他死后，襄阳百姓在羊祜常游览的岷山上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因为羊祜的“祜”与户同音，荆州人为了避讳，从此房屋之门户就不再称“户”，而只称“门”。另外，又将朝廷中的户部也改为“辞部”。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羊祜的平吴之策正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王者之师 有征无战

讲仁义不等于不讲武力，仁义道德和武力征服是统一天下不可或缺的两件法宝，两者不可偏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羊祜的“德攻”是为“武攻”作前期的准备，他是在等待时机，待时机成熟了，就以排山倒海的军事力量给吴国以致命的打击。

公元276年，陆抗病死，羊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向晋武帝上疏。疏中言道：“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平心而论，羊祜的分析非常有道理。综合晋、吴二国各方面的情况，无论是人力、物力、兵力、财力，晋都远远超过吴。

羊祜上表之后，晋武帝让大臣讨论此事，“而群臣多以为不可”，特别是贾充更是极力反对。在西晋王朝中，贾充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曾经助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司马昭死后，又充当了逼宫的马前卒，迫使魏主曹奂将皇位让给司马炎。以后贾充又把自己



女儿嫁给了皇太子，晋武帝封贾充为太尉，太子太保，录尚书事，鲁郡公，其地位之高，与皇帝关系之密切，朝中无人能与之相比。

由于贾充等人的极力反对，晋武帝也颇为犹豫，所以伐吴之事就拖了下来。天不假年，公元278年，羊祜一病不起，临终之时，羊祜再三叮嘱晋武帝赶快伐吴，并推荐杜预代替自己。杜预也是三国后期的杰出人才，他文武双全，且是“左传学”的创始人。

除了羊祜、杜预之外，张华也是坚定的伐吴派。

《晋书·张华传》记载：“初，帝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其后，祜疾笃，帝遣华诣祜，问以伐吴之计。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张华在晋武帝最后拍板，下决心伐吴的这件事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晋武帝伐吴，兵分六路，统率各路军队的都是当时的名将，但晋军的最高统帅却是贾充。贾充是朝中反战派的首脑，晋武帝却“诏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贾充推托道：“臣已老迈，非所克堪。”晋武帝硬要赶鸭子上架，他对贾充说：“君不行，吾便自出”（《晋书·贾充传》）。在武帝的再三恳求下，贾充才被迫同意。贾充当大都督，实际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没有杜预和张华的抗争、抵

制，西晋的统一战争几乎要功败垂成，化为泡影。

杜预领兵从襄阳出发，一路所向披靡，“吴州郡皆望风归命。”杜预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向东吴首都建业进兵，在贾充的授意下，有人对杜预提出“东吴乃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杜预反驳道：“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晋书·杜预传》）。

龙骧将军王浚从巴蜀进兵，东吴军队一触即溃，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但“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张华独坚执，以为必克。”（《晋书·张华传》）贾充知道后，大怒，于是上表说：“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

张华在伐吴的问题上和贾充针锋相对，惹恼了当朝权贵贾充，贾充嫉贤妒能，为了摆出自己是全军主帅的威风，竟然要腰斩张华以泄私愤。杜预得知这一情况，十分着急，赶紧向晋武帝上表，主张一鼓作气平定东吴，不让孙皓有丝毫喘息的机会。幸好，晋武帝这时的头脑还算清醒，他支持杜预、张华的战略决策，命晋军继续前进。

晋军攻势凌厉，王浚的水军浩浩荡荡，所向无敌，直逼石头城，孙皓黔驴技穷，只得效仿刘禅“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向王浚投降。当平定吴国的消息传到洛阳，晋武帝激动得泪流满面，说：“此羊太傅之功也。”诚如司马炎所言，如果不是羊祜的“攻心”战术，不是杜预、张华的“庙算”准确，伐吴之战就可能那么顺利，三分归一统的局面还得延迟。

抗战歌曲选—— 《军民合作》

本 编



田汉（后排右八）、舒模（后排右六）等人赴台儿庄前线前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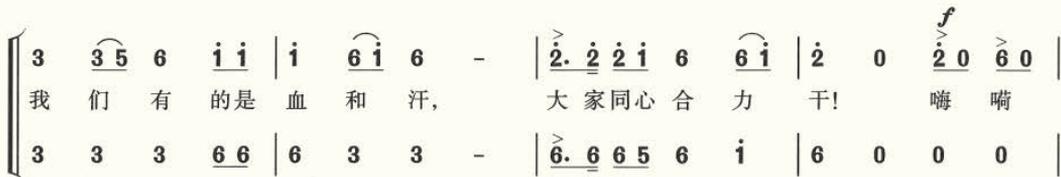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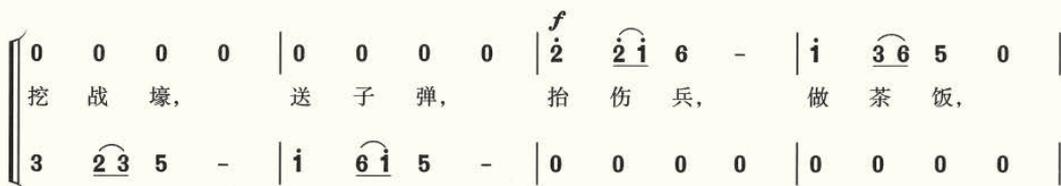
舒模（1912—1991），原名蒋树模。江苏南京人。1931年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音乐。“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敌剧团，台儿庄战役时，曾赴前线慰问演出台儿庄当时大部属峰县，一部属临沂县，两县共归山东省三专署（临沂）辖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抗敌演剧四队副队长。抗战胜利后，随队至武汉、无锡、杭州开展反战活动。1949年后，历任浙江省文工团长，中国音协浙江分会主席，浙江省文联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戏曲研究院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剧协第三届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创作有歌曲《军民合作》《你这个坏东西》《大家唱》《跌倒算什么》等。《军民合作》是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之后，作者随抗敌剧团赴前线慰问演出时，见一老汉背着受伤的士兵在断垣残壁中一步一步向后方走去的情景，心中深有所感而创作的。

军民合作

舒模词曲

1=C

慢、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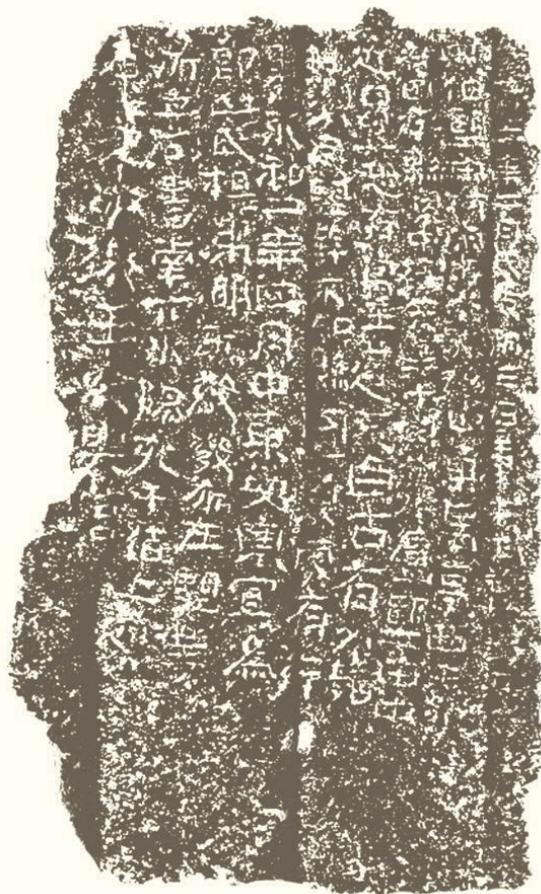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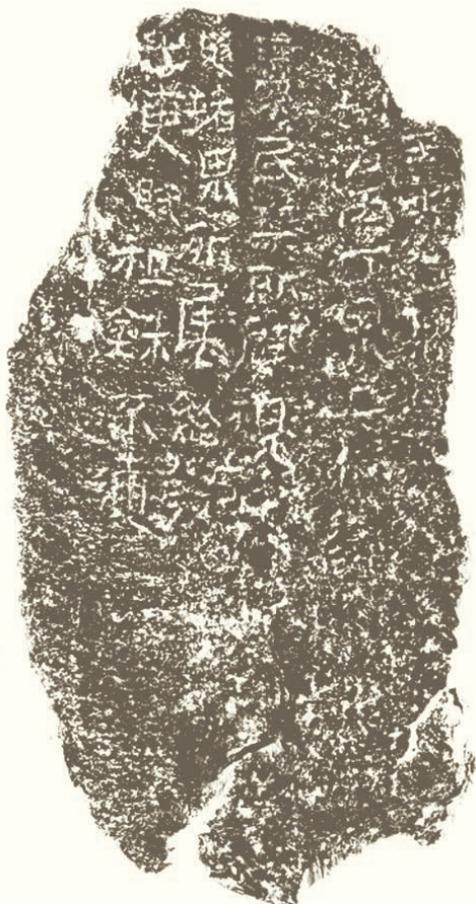
1938年8月作于武汉。

东汉平莒男子宋伯望刻石

叶克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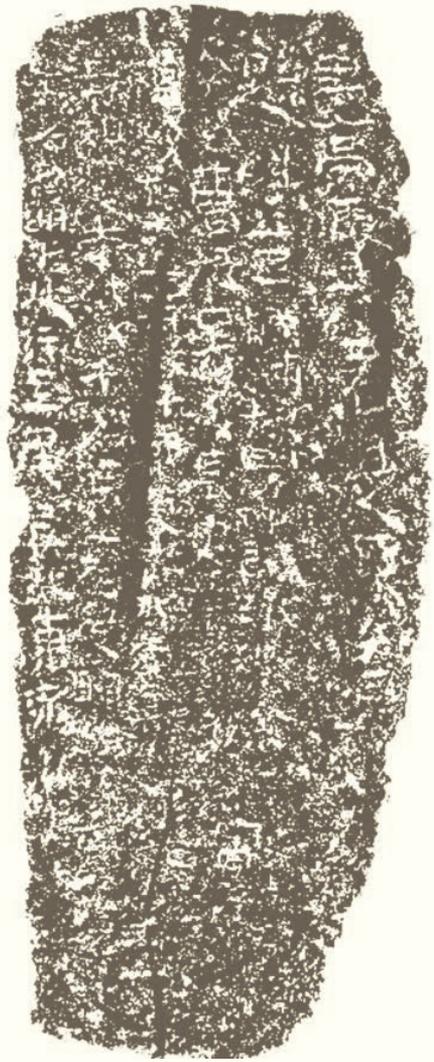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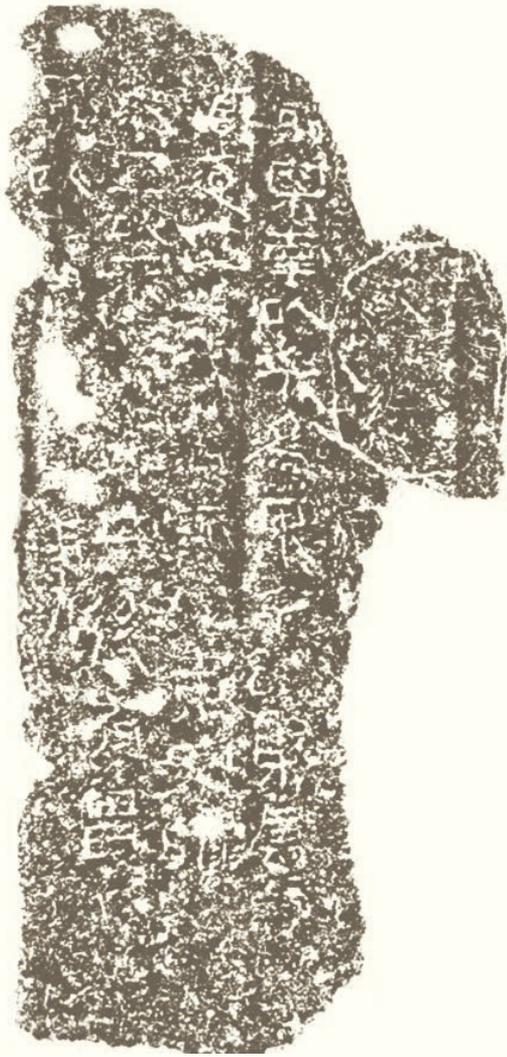
平莒男子宋伯望刻石，又名莒州汉安三年刻石、平莒男子宋伯望买田记、平莒男子宋伯望等分界刻石。东汉汉安三年（公元144年）二月三日立石。光绪十九年（1893）出土于山东莒县西孟家庄，曾归邑人庄钰（余珍），现存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

该石四面环刻，铭文皆为隶书，章法竖有行横无列，书风随意率真，结体大小参差，奇正相生，颇具奇趣，在汉代刻石中别具一格，颇堪效法。因刻石剥落较甚，铭文可读者仅十得七八。



正面：汉安三年二月戊辰朔三日庚午，平莒男子宋伯望、宋何、宋□□在山东禹亭西□有田，在县界中□，元年十月中，作庐？田中近田，？恐有当王道□酉，古有分境无分民，？等不知县图，□更有行事，永和二年四月中，东安塞宜为节丘民相？保(7)冢？等所立石书，南下水阳，死於伯上，□□[本]安[游]？王纪与莒

背面：别□南以千为界，千以东属莒道，西□水□流属东安，□杀宜以来，界上平安，後有烛鸡界以立石，□□□□□事，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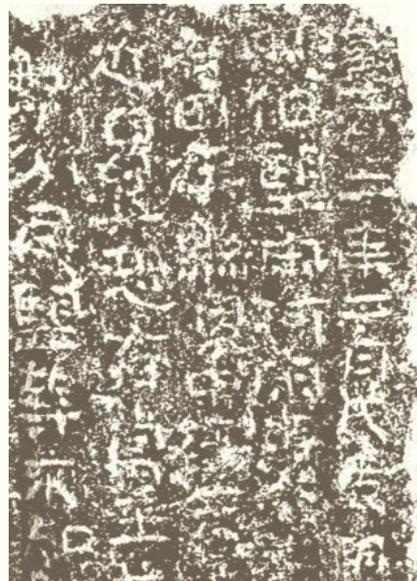


左面：禹亭长孙着是□□□归□莒贼曹？□仲诚，游缴徐□审，□贼曹？吴分，长史蔡？，？等古福□□上有故千□纪冢，有北行车道，千封上下相属，南北八千，石界□受，？□□□，立名分明，千北行至侯阜，北东流水

右面：壬癸□□□□□在丙子，界上□□立冢，民无所建租，道堵界所属，给发出，更赋租铢不？？。



背面局部



背面局部

姓氏百家漫谈——徐姓 (上)

赵丹峰



一、徐姓渊源

徐姓作为中华大姓之一，与以前记述的赵姓和黄姓一样，均系东夷部落首领伯益的后裔。其时，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舜命禹治理洪害，禹感责任重大，便向舜推荐伯益参与治水，伯益遂成为大禹治水的得力助手。大禹领命后，“与益、夔遂行四渎”，共谋治水大计。他们总结汲取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采取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方略，带领民众劈山凿道，除壅疏堵，使水畅其流，洪入大海。经过十数年的艰辛努力，基本上消除了水患。因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被任为掌管山川原野和湖泽的虞官，并被舜赐姓嬴氏，作为东夷少昊部落嬴姓的继承者。后，夏禹继舜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伯益亦成为禹的副统。禹在东巡途中死于会稽，遗命“天下授益”。伯益认为，夏禹的儿子夏启较自己更有威望，遂将帝位推让于启，而后便返回东夷部落的封地费颐养天年。《竹书纪年》云：“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说的即是这一史实（亦说伯益因与启争帝位，被启所杀。但笔者倾信于前说）。启继帝位后，感念伯益当年佐其父大禹治水之功，便命伯益的长子大廉继任伯益的职位，又封伯益的次子若木治于“徐”，这便是徐国之始。徐国在若木及其以后数代国君的治理下得以迅速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东夷诸族中势力最强者，史称徐夷、徐方或徐戎。到徐偃王时，徐国“地方五百里”，向其朝贡者“三十有六国”。

讲到古徐国，人们不禁会问：徐国的疆域特别是徐国的中心辖区究竟

在何方何地？过去较普遍的传统说法是，徐国疆域在今淮河中下游地区，其统治中心在今江苏泗洪一带。凡是从事历史研究和地方志编修的人都知道，史料是一切史论赖以成立的基础。作为一名史志工作者，笔者在编修方志之余，多年浸淫于东夷文化的探研。根据尚已掌握和了解的有关文献资料和文物遗存（含文物和文化遗址等），窃以为上述结论不够确切，存有以偏概全之弊。现举例以证之：一是徐氏始祖陵位于山东临沂市郯城县内。在郯城县城北数里处有一高阜，其封土比周围地面高出约15米许，耆旧相传，称之为“豹公墩”。当地徐姓族人则皆称之为“老祖坟”。每逢清明，鲁南苏北一带的徐姓人士来此祭祀扫墓者络绎不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经专家进行实地勘考，确定此处实为徐氏先祖之墓群。从笔者在北京、上海、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的各类徐氏谱牒中，皆发现有如下记载：伯益和徐国诸位国君，如一代若木、二代征国、三代房、四代仁、五代豹、六代谦、七代金、八代晔……20余代徐国国君，均葬于山东郯城北七里处。这种对先祖埋葬地一致认同、绝无“杂音”的文字记述，在其他姓氏的族谱中是十分少见的，更与当下各地为争名人出生地与卒葬地而各说各话的“流行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陵墓埋葬的惯例，徐国众多国君的陵墓群坐落地应当位于当时徐国的统治中心地带，是毫无疑问的。二是徐子鼎在费县出土。1965年，在临沂市（时称临沂专区）费县台子沟出土了春秋时徐国的青铜礼器徐子鼎。这尊铸于西周时期的国家一级文物，系徐国君主赴蒙山祭祀时的祭器（徐偃王为周穆王所败后，周王朝别封徐国的主政者为“徐子”）。该珍贵文物在古费城附近出土，对研究古徐国的发展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徐子鼎的出土表明：今蒙山一带及其以东地区，当时属徐国之疆域。徐国的统治者祭祀蒙山，既是为自己的邦国祈福，亦是对自己先祖伯益的慎终追远（伯益又名大费，系因其被封于费而得氏名）。三是伯禽伐徐的首战之役发生于临沂市境。伯禽系周公姬旦长子、周武王姬发之侄。周灭商后，武王封周公于鲁，因周公留京辅政，遂派其子伯禽代其就国。成王时又下令将奄国和“殷民六族”赐于伯禽。主政鲁国的伯禽作为周王朝的嫡氏宗亲，对东夷诸族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与姜太公（吕尚）在齐国对东夷族实行的“因其俗，简其礼”的国策明显不同，从而在文化的价值取向方面与徐国等东夷部族产生了矛盾与碰撞，不久，便发生了武庚、管蔡之乱，徐夷、淮夷和南方的熊盈以及纣王的猛将蜚廉亦闻风而动，纷纷向周王朝在东方的代表鲁国宣战。危急关头，伯禽从驻地曲阜率周王朝军队抵费誓师，其誓词被史官记作《费誓》，后收入《尚书》一书。誓师后的鲁国军队在齐国军队的支援下（齐、鲁系周王朝开国后在东方设置的两大桥头堡），经奋力作战，终于平定了此次东夷之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费誓》这一历史文献再次证明：直至鲁国创建之初，今费县及以东地区仍是徐国的中心地区。因为此次鲁、齐军队攻打的是徐国的大本营。通过上述三例，我们便可以肯定地得出以下结论：今临沂市的平邑、费县、兰陵、罗庄、郯城一带地区，确系夏、商两朝及周朝初期古徐国统治的中心地区，而埋葬20余代徐国国君的郯城，极有可能系当时徐国国都所在地。

此次战役对徐国历史的发展是个重要拐点。它不仅拉开了新兴的周王朝与东夷部族之间征服与反征服的帷幕（包括刀光剑影的武力挾伐和文化范畴的渗透、互渐与融合），而且亦为日后徐夷统治中心的南移埋下了隐忧。周穆王时，徐国国君徐偃王趁穆王乘八匹神骏周游天下之机，联合淮夷等东夷部族（时称九夷）伐周，此役东夷集团虽被周朝军队击败，偃王因此而走避彭城山中，但周穆王考虑到徐夷尚有强大的势力，仍别封偃王之子孙为徐子，继续治理徐国。鲁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68年），鲁国又联合齐国与宋国合力伐徐，迫其中枢由今鲁南地区南移至今江苏

泗洪一带。其后，国力渐衰的徐国被楚国打败，其势更趋式微。东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徐国终为吴国所并。历夏、商、周三代长达1600余年的徐国发展史自此画上了句号。其王室与黎民不泯念国之志，遂以其国名为氏，这便是徐氏一姓的起源。

二、徐姓郡望与堂号

徐姓作为得姓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姓，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众多郡望与堂号，较著名者有东海徐氏、琅邪徐氏、高平徐氏、东莞徐氏、濮阳徐氏等，其中最具有名望者，当数东海徐氏。东海郡系秦代所置，治于郯（故址在今山东临沂市郯城县城略北处），因此处系古徐国发祥地，汉武帝所设十三刺史部之一的徐州刺史部亦治于此（“徐州”之名或含有纪念古徐国之寓意），故此时的郯县城，也同时被称为“徐州”和“东海”。东海徐氏这一郡望和“东海堂”这一徐氏的总堂号便由此而来。除“东海堂”这一总堂号之外，在全国各地，徐氏尚有许多分堂号，其中如“圣交堂”与“麦饭堂”即颇有来历：宋朝名士徐大受久仰理学大师朱熹盛名，二人相见后交谈甚洽，但此时的徐大受家道贫寒，在诚留朱熹吃饭时，只能用葱花汤与麦饭款待朱熹，但朱熹对这餐粗食淡饭却吃得很香，二人边吃边聊，遂成挚友。此事被传为佳话，于是徐大受的后裔为秉承祖上懿德，便以“圣交堂”和“麦饭堂”作为这支徐氏族人的堂号。

三、徐姓族群的繁衍与发展

徐姓发源于鲁、苏、皖边联即今大淮海地区。徐国为吴国所灭后，徐姓已扩衍至今江西、浙江一带。东汉时，今甘肃、陕西一带已有徐姓族群迁入。西晋末发生“永嘉之乱”后，以东海徐氏为代表的中原徐姓族群，与中原其他世族一起举家南迁，江南广大地区遂成为徐姓族人新的中心生活之地。到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重新统一，在南方生活的不少徐姓房支，又开始返迁回江北故土繁衍发展。如南朝梁时重臣徐勉的后裔中的一支，又从江南迁回徐氏始祖陵所在地的郯城，繁衍成为该县人口众多的大姓。故苏鲁一带有“郯城县，徐家半”之说。宋、元时，广东、福建等华南地区已有不少徐姓人来此居住。明清时，徐姓族人不仅广泛分布于中国大陆各省，一些居住于福建、广东的徐姓人士又开始跨海涉洋，分别到台湾和南洋（今东南亚）地区谋生繁衍。



郯城徐氏祖
庙——东海堂

站起来能站多高 走起来能走多远

——吴东心路探
惠东波



站立与行走，似乎是始终伴随生命的。婴儿一岁左右，开始倔强地脱离母亲怀抱，颤微微地站起来，试探地迈开步，好象宣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独立存在；待年老时节，或因体衰或因疾病卧床，失去了站立和行走能力的时候，也预示着这一生命个体的即将终结。

但是，世上却有那样一群孩子，到该站时站不起来，到该走时走不出去——他们是被小儿麻痹等病魔折断翅膀的天使。

正是这群孩子，十几年前吸引了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医务工作者的目光，揪住了他的心，以至他的全部身心投向了他们，心灵一步步与他们走近、融合，从而书写了临沂市康复史上一篇波澜壮阔的史诗。他就是临沂市人民医院康复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吴东。

心灵的血印

所谓偶然，或许就是近代西方所指的机会，或许就是古代东方所言的命运，总之，似乎有着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把吴东和那群被称为“小儿麻痹症”的小儿脊髓灰质炎的孩子们联系在了一起。

1995年，30岁出头的吴东风华正茂，凭着优良的医术和十几年从医的经验，被市人民医院从郯城县医院抽调帮助工作。在各方面条件都比县级医院优越的新环境下，他隐隐感到内心创业欲望的躁动，隐隐看到未来美好生活

的招手。那段时间，天空格外蓝，沂河水分外清，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一天，在处理大量医疗事务的时候，他需要和南京爱德基金会联系工作，看到了一份资料，称位于鲁东南的山东省郯城县，于1989年曾局部流行脊髓灰质炎，留下一批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孩子。这个总部设在美国的慈善组织，准备予以救助。家乡的疫情表述刺痛了吴东的眼睛。他马上与之交谈，了解到这个组织急需在当地医疗机构寻找一个项目主持人，以尽快把这项救助工作开展起来。

“你就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但必须放弃市医院的借调，专心回郯城开展这项工作。这是一个条件。”对方很善解人意地说。

语音一落，吴东脑海中好象经过、又好像没经过瞬间的犹豫，转而被那些趴在地上仰望其他人、仰望世界的孩子们充斥了，神使鬼差般，他答应了！

在很快得到院方同意支持的情况下，他回到郯城县医院，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工作。他首先根据要求和自己的理解，制定出项目推进计划。然后到县残联查找资料。但当时由于该病康复工作刚刚起步，资料尚不完全，只好骑自行车，到几个重点乡镇走村串户，摸清患儿底子。

在县医院，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救助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周末休息时自不待言，他早出晚归，风尘仆仆，为了赶时间，常常把自行车搬到顺路的简易三轮车上代步；工作日下班后，也是尽可能在县城附近乡镇奔波，披星戴月成为家常便饭。他知道，早一天摸清底子，患儿就可能早一天得到救助。他真的很着急。

一天，他来到高峰头乡阴村，如同这个村名，那一天阴云密布，让人心情抑郁。他踏进一个名叫肖银龙的6岁男孩院门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小小的孩子正趴在院里，浑身是土，拖着畸形的干柴般的下肢，艰难地活动，吃力地挺着脖子，翻着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他这个陌生人，而孩子的左脸颊上正流着血！

在小银龙父母断断续续的诉说中，他泪眼中一幕幕闪现着令人怜悯的场景：直到周岁，小银龙都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三翻六坐八爬”，和别的孩子一样健康。再大一点，开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扶着凳子走起来了。然而，一场高烧，孩子竟然不会走了，两腿开始萎缩，眼睁睁只能在地上趴着、爬着。苦难不能泯灭孩子的天性，他逐渐长大，看到门前有同龄的孩子玩，他便向他们爬去，其他孩子看到残疾的他来了，要么不理他，要么一哄而散。他又试图和小狗小猫甚至小鸡小鸭玩，却无奈跟不上这些动物玩伴。孩子在寂寞中看好了家里养的一头半大的猪，不会跑远，便爬过去趴在猪的身边玩耍，这不，刚才不知道怎么把猪惹急了，啃了他的脸一口……

他为小银龙清理伤口，却分明感到，血印正印在心里。

他更加不知疲倦地奔波着，两个月的时间，他跑遍了5个重点乡镇的每个村，近距离接触了100多个患儿。期间，他不知道流了多少汗，说了多少话，只知道小银龙的形象总是如影相随。

站立的尊严

救助行动开始了，限于每年区区2万美元救助款，他在100多个患儿中，逐个筛选出34个最需要救助的孩子。

在我国，政府始终对儿麻后遗症患儿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具体救助，其主要措施是每年对部分患儿进行矫治手术，即通过手术，把瘫痪造成的下肢畸形矫正过来，这的确是救治的基础工作。我国的这种手术质量较高，整体上超过美国。但这种手术进行后必须立即辅以康复训练，才能收到效果。然而致命的是，我国的康复

事业起步太晚，尤其是农村，基本是空白，造成术后患儿仍一如既往，收效甚微。久而久之，绝望的情绪逐渐在患儿及其父母心中弥漫，听天由命、自生自灭了他们中许多人痛苦万分的无奈选择。

那么，对患儿至关重要的康复治疗，以什么样的方式做、怎么做，却好像横在面前的一座山，必须想办法越过。眼前摆着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集中，开设专门的康复场所，所有患儿进入后封闭治疗，设置专门人员，专门设备，可能在肢体恢复上有些效果，这得到了美方的认可，兄弟省也有这种做法。但这种方式不仅需要大量投入，还容易造成患儿的依赖，治疗生理缺陷的同时，极易形成之后回归社会的障碍。这显然有违救助患儿的初衷。另一种是完全分散，由有限的康复人员自带设备逐个患儿训练，由于这种康复训练必须坚持连续性，周期较长，而康复指导人员的确有限，势必选成效率低下，也不可取。

吴东如一个智者，没有照搬照抄，也没有将其简单化，而在苦苦摸索着一种适合本地实际和诸方面条件的方式。他尝试着在每个乡镇发展一两名康复员，经过培训后，回去负责治疗本乡镇的患儿。他独出心裁，创造出一系列因陋就简的康复器材：可以吊在农村房梁上的滑轮，用树干横棍搭成的单、双杠，用砖石水泥就地砌成的阶梯、斜坡等等，这些康复治疗必须的器材便得到了推广。他要求每个适龄患儿都要上学，使他们确保心理上与社会的融合。

赵静静是郯城县新村乡赵楼村的一个婴儿瘫女孩，与同病患者一样，经历着同龄人难以想象的瘫痪与心理的双重折磨，但她却是一个视读书如生命的不屈的女孩。为了满足孩子的求知欲望，妈妈每天将其抱到学校，放学再抱回。因孩子在校期间不能去厕所，因此小静静坚持每天去学校前不吃不喝，其痛苦可想而知。吴东为此专门找到校长恳求，为这个孩子建了一个简易专用厕所，又同班主任商量，在这个班级成立了“红领巾助残小组”，轮流背小静静上厕所。孩子矫正手术进行后，吴东亲自为其制定了康复治疗方案，及时配备了支具，加强了残余肌力恢复训练。不久，孩子从轮椅上站起来了！这是吴东投入婴儿瘫康复项目中第一个站起来的患儿。小静静睁着大大的眼睛与周围的人平视片刻，瞬间泪如雨下……

吴东猛然悟出：人站立着与别人平视，原来是人最本能的要求，是人的最基本尊严的体现，他的眼睛也在模糊。

赵静静站起来的照片被登上了《中国青年报》，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全国各地千万双关注的眼睛。一天，他接到了来自浙江省奉化溪口一座寺庙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15岁的出家人。他详细地诉说了见到赵静静站立消息的感动和震撼，捎去省吃俭用200元零花钱，用于患儿的救治。吴东将这笔钱买了《张海迪的故事》的励志书籍，分发给孩子，并将孩子读书的照片寄回给这个同样是孩子的捐助者。小师傅之后又寄来500元，成了这个项目的固定捐助者。

赵静静站起来了，一个个瘫儿陆续站起来了，吴东在实践中创造的社区康复模式也随之“站”了起来。山东省残联专门在郯城县召开了全省规模的现场会，推广吴东创造的模式。2000年5月，他也被授予“全省志愿者助残先进个人”称号。

足球的启迪

在吴东眼里，孩子是祖国的花朵这句老话十分形象，婴儿瘫患儿同样是万紫千红花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个体可能因风吹雨打少了几个花瓣，但他们共同用生命色彩构成的大好春光却无比完美。精心培育他们，他们同样可以结出硕果，完成自身孜孜追求的完美人生。

在郯城县重坊镇的一次患儿集中活动日里，吴东正在办公室工作，突然听到院里一阵阵喧闹、嬉笑，其间夹杂着哨音。他出门一看，被眼前的一幕震动了：10个残疾儿童在场地“奔跑”，有的坐着轮椅奔突，有的拄着双拐跳跃，原来他们正在“踢足球”。自己推举的裁判，自己商定的规则，生龙活虎，好不热闹。这在康复训练中是他这个医生从来想所不敢想、闻所未能闻的活动项目。那一刻，他似乎与孩子们又近了一步，已经贴近孩子们的心扉，听到孩子们心脏的跳动。他们的精神追求从来就没有缺陷，他们的生命张力从来就不曾衰减。他动情地回到办公室，拿出纸笔，一篇名为《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赛》的新闻特写，一挥而就，几天后在《临沂日报》刊出，成为他见报的唯一文字作品。

有些事其实已经超出了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范围，但吴东一点也没觉察到。他决定象培养健康孩子一样，挖掘孩子天性中的无尽宝藏，启迪他们用自己聪颖的智慧和灵巧的小手，编织他们应有的梦想。他组织了宣传队，利用训练之余尽可能让孩子体味美的甘甜。2000年春节，这支病残儿组成的合唱队，竟然入选了郯城县春节联欢晚会。大幕开启的舞台上，20个病瘫儿童或扶双拐，或坐轮椅，相互推着、扶着、簇拥着来到舞台中央，聚光灯射去，台下许多观众已不能自抑。他作为指挥，朗诵起自编的主持词，《世上只有妈妈好》《小草》等歌声骤然响起，台下在隐约的啜泣声中掌声雷动。

很难用“热爱”来说明他此时与康复事业的关系，康复事业似乎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当时在医院的职务是院办公室主任，但因康复事业已被做大，二者难以兼顾，他在众同事的不解的目光中，辞去了办公室主任职务。

事业的提升往往是可以物化、可以感知的，而其间伴随着精神的升华却将更具价值。

行走的本质

为了故乡的儿麻后遗症康复项目，他离开市人民医院5年，5年后，同样因康复事业的发展，他又重回了市人民医院，这貌似回头般的转身，其中蕴含着不为外人察觉的华丽。

2000年，新世纪的清新之风吹遍大地的时候，他又因其在郯城县卓有成效的康复工作业绩，并因为市人民医院的工作需要，回来了。当时，市人民医院刚刚成立了康复科，顶起门头的，其实只有吴东一人。由于条件所限，他暂时居住在骨科病理值班室，一张折叠沙发，白天接待患者，晚上铺开当床。这意味着他在市人民医院的工作将从零做起。早春时节，乍暖还寒，他漫步于沂河岸边，愣愣地盯着柳枝上微绿的嫩芽，片刻，长长地舒了口气，敞开嗓门叫了几声，顿感豪气上升。

上班后的第二天，一阵阵急促的笛声响过，救护车送来第四中学不慎从楼梯摔下的一名学生，名叫刘中财，经过检查，医生为其胸投截瘫。手术很成功，但骨科医生遗憾的摇摇头：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

接下来就是吴东上场做康复方案。他详细地查看了病情，结合1997年在香港学习期间所掌握的知识，给出了一个令周围所有人惊愕的预期：这孩子3个月以后可以走路。这个自信的判断，自然令孩子的家长悲中生喜，将信将疑的围着他询问可靠程度，用期盼的语气表达着自己难掩的渴望。同时，也有同事对此表示可以理解的质疑，因为，同类病例中尚无下地行走的先例。

手术一周后，他开始让刚刚恢复部分体力的刘中财做上肢训练，每天躺在床上定时定量提沙袋，举哑铃。不久，便坚持打破惯例，给患者装置背架，辅助着每天



坐起来。三个月快到了，为他装配了支具，试着站起来。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他把中财同学用轮椅推到院中，在众目睽睽下，他按着自己的节奏，引导中财同学下轮椅，站起来，迈步，一步、两步、三步……真的走了起来。虽然只有几米，虽然又痛又累，但中财的脸上却始终笑容。地方各媒体闻讯赶来，随后便是集中的报道，连《大众日报》也做了宣传。

之后便是省内多地患者的纷至沓来。莒县中楼镇的张兰兰，因先天性脊膜膨出，从小到大没迈出过一步，母亲带她几乎跑遍全国，收效甚微。来到临沂求医，一位老大夫劝她到康复科试试，训练了两个月，就拄着拐走动了。淄博市的一位女患者，曾被省级某医院宣布不可能站起来，更不可能走动。来临沂后，吴东通过康复训练恢复了部分肌力，装上支具后，辅助拐棍就可以在走廊移动了。尚未出院，这位女患者消失了几天后又出现了，吴东严肃地问她到哪里去了，她竟得意地告诉他，到济南那所判她再不能走的医院骨科走廊上，遛达了两趟。吴东忍俊不禁，在他并不幽默的康复经历中，偶然享受了一次难得的喜感。

他常常觉得，他是在推着那些不能行走的生命体迈步，这就是康复事业，他今年被评为“十一五”全省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个人，更从心底为从事这项事业感到自豪直至有些许伟大的成分。

他也在推着康复技术的前行。近年来，他每年都被邀参加在比利时、台湾、波多黎各、印尼巴厘岛召开的亚太或世界康复大会，把先进的理念和医术带回来，把自己的积累传播开来，造福于人类。

他还在推进着临沂市人民医院康复事业的进程。十多年前只有他一个人的康复科已发展到现在的150多人，4个病区，300多张床位，年营业额从几万元增长到几千万元，在全省市级综合医院名列第一。根据院领导规划，他们还即将在全市建立完备的康复网络体系，实现县、乡级医院康复体系互联互通，免费培训，资源共享，双向转诊，实现康复事业的新飞跃。

走向前方，应该是人类的常态。正所谓事物总是运动的——那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

决胜在特殊“战场”

——记解放军军事体育运动大队原副大队长矫力鸣

呼国英

在被誉为“捍卫军旗之战”的国际军事五项赛场上，从1981年首次参赛以来，我人民解放军派出的军事五项队共获得78个世界冠军、64人次打破世界纪录，实现男子团体“十四连冠”、女子团体“九连冠”，铸造了中国军人扬威国际军事舞台的英雄丰碑。而从沂蒙走出的矫力鸣就是这个英雄群体的杰出代表。

1976年12月，在临沂拖拉机厂工作的矫立鸣参军入伍，来到南京军区炮兵414团服役。那年，他只有19岁。入伍后，他先后参加了师、军、军区组织的军事体育大比武，取得了优异成绩。1977年9月被选入南京军区军体大队集训，1980年2月，解放军军事五项队正式成立。矫立鸣成为第一批运动员。

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由北约军队发起创立。它包括300米（部分举办国为200米）大口径步枪射击、500米障碍跑、50米障碍游泳、手榴弹投准和投远、男子8公里越野跑（女子4公里越野跑）等5个竞赛项目，被称为“铁人中的超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体育竞赛，而是完全模拟实战，集中体现陆军单兵实战训练基础要素，挑战军人的意志品质，成为和平时期各国展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舞台，被视为各国军人较量的特殊“战场”。上世纪50至80年代，西方军事强国一直把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当作炫耀自身军力的舞台。一位西方将领在一次国际军事交流会上甚至断言：“戴布鲁斯杯起于欧洲，也将永驻欧洲。”

为了打破西方神话，展示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坚定步伐，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决策组建解放军军事五项队，赋予他们这样的“使命”：打入国际军事舞台，展示我国我军崭新形象，带动部队基础军事训练，扩大我国我军政治影响……

回首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矫力鸣至今依然激动不已：“1981年9月，首次出征瑞士布莱尔戈尔滕。我们肩上背着20世纪30年代打一发退一发子弹壳的老式‘水莲珠’步枪，脚上穿着普通士兵都有的解放鞋，与拥有先进装备、征战国际赛场几十年的西方军事强国同场竞技。赛前有人说，中国军事五项队不过是来凑热闹的。”而矫力鸣憋着一股劲：“剑不如人，但我们敢于亮剑，敢于搏击。我们心里装的是祖国！”初出茅庐的中国队，





居然夺得团体第八名。

当时的组委会主席齐格勒曾兴奋地说：“你们是第一支在欧洲亮相的亚洲军队，你们的表现让世界震惊！”

1983年8月，矫力鸣再次入选解放军体育代表团，第二次参加国际军体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面对16次夺冠的瑞典队、7次折桂的西德队，以及从海军陆战队挑选精兵强将组成的美国队，面对西方媒体“‘戴布鲁斯杯’不会旁落、中国队只不过是一个‘陪衬’”的说辞，队员们纷纷表示：请把担架放在终点，我们就是爬也要第一个爬到终点！

正是有了这样的斗志和勇气，中国队以骁勇战阵奋勇冲刺，最终将团体冠军“戴布鲁斯杯”高高举起。这是33年来“戴布鲁斯杯”首次进入亚洲，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国家。

1984年底，矫力鸣从运动员改任教练员。1987年，任解放军军事体育运动大队八一军事五项队男子教学组主教练，1995年任队长兼总教练，2001年任解放军军事体育运动大队副大队长。

从1988年起，矫力鸣先后20多次率解放军军事五项队、解放军射击队、解放军现代五项队、解放军击剑队、解放军铁人三项队及国家队，代表国家和军队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军体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世界军人运动会、世界杯、世锦赛、亚锦赛等国际赛事。特别是在军事五项队在历次大赛中，先后夺得41次男、女团体世界冠军，36次男、女个人世界冠军，12次男、女障碍接力赛世界冠军，数十次打破世界纪录。至今，军事五项队仍保持国际军体军事五项男、女14项纪录中的8项世界纪录。

任解放军军事体育运动大队副大队长后，矫力鸣主持训练竞赛工作，他深入各运动队，对各运动项目的规律、特征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拟定了长远发展规划。狠抓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三支队伍的建设。各项目队的训练、竞赛成绩有了显著提高。至目前止，大队下辖的军事五项、射击、击剑、现代五项、铁人三项、自行车、射箭、马术等项目队，先后在国内外比赛中，夺得1枚奥运会金牌，115个世界冠军（其中军事五项队89个），49个亚洲冠军，393个全国冠军。特别是军事五项队，实现了男子团体“十八连冠”、女子团体“十三连冠”，受到军委首长的高度赞扬。

自2004年起，矫力鸣先后当选为全国击剑、现代五项、铁人三项三个运动协会副主席。参与了上述三个运动项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2年伦敦奥运会备战领导小组的备战指导工作。



矫力鸣因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荣立一等功6次、二等功7次、三等功4次，被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评为优秀运动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2次被解放军总参谋部评为优秀基层干部，多次被解放军体育工作大队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练员，4次受到提前晋升职、衔奖励。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解放军军事五项队因成绩突出，为国际军体军事五项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95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萨马兰奇代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授予解放军军事五项队银质奖杯一樽。1997年，解放军总参谋部授予该队“英雄军事五项队”荣誉称号。2001年，军事五项队因队伍建设全面过硬，成绩再创新辉煌，中央军委又授予该队“英雄军事五项队”荣誉称号。2004年，军事五项队在国际军体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十连冠”“女子五连冠”，胡锦涛主席于当年12月2日亲笔题词“热烈祝贺军事五项代表团取得优异成绩，希望再接再厉、刻苦训练，取得更大光荣”。以上荣誉在全军乃至全国的运动队中均无先例。

1995年始，矫力鸣连续7年受到中央军委首长的接见。1999年，他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部优秀基层干部代表出席迎新年晚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多次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其新闻报道及专题片多次在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报道播放。

🔴 “沂蒙史志”微信进入临沂微信排行榜前十名。近日，“临沂微信公众影响力排行榜”发布，临沂市史志办“沂蒙史志”微信进入临沂社科文化类微信排行榜前十名。“临沂微信公众影响力排行榜”由临沂日报报业集团琅琊新闻网、新媒体指数联合发布，通过对全市165个微信公众号发布次数和篇数、总阅读数、阅读平均值、总点赞数等的统计，进行排名。

“沂蒙史志”微信为全国史志系统开通的首个官方微信平台，自开通以来已推送信息1700余条，近2000人关注，被评为全省唯一的优秀信息化建设成果奖。此外，沂水县史志办主办的“沂水史志”微信也入围榜单。

🔴 市史志办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动员会。5月21日，市史志办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动员大会。会议由机关党支部书记伊永航主持，办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作党课报告。动员大会上传达了沂水现场会情况和市委林峰海书记重要讲话，传达了拟定的“三严三实”实施方案，班子成员、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朱海涛主任在会上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三严三实”的精神实质和开展专题教育的具体要求；从严从实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严以律己、干净干事，争做清正廉洁的表率；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委要求，加强宣传、建章立制，扎扎实实开展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市地方史志办公室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闭幕后，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紧跟市委部署，掀起了学习贯彻落实热潮。5月25日，市史志办随即召开领导班子会议，传达学习全委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5月27日，市史志办召开全体人员会议，系统传达了全委会精神，集体学习了市委、市政府《关于内强外拓发力赶超加快

🔴 设社会主义“大美新”临沂的意见》，传达学习了林峰海书记、张术平市长在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并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进行了安排部署。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强调，在下一步工作中，全办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这次全会精神，按照“走在前列”的定位要求，谋划推进各项工作，奋力拼搏、发力赶超，为实现全市地方志事业科学跨越发展，为建设大美新临沂做出应有的贡献。

🔴 临沭县史志办开展“志书下乡进校园”活动。为弘扬传统文化，更好地开展全民读志用志活动，临沭县史志办公室结合续修县志出版发行和《沂蒙革命根据地志》发放到每个行政村的实际，同临沭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签订赠书协议，向所属的10个镇街图书室和236个农家书屋捐赠志书，将读志用志活动延伸到镇村。此次活动，临沭县史志办向10个镇街图书室和236个农家书屋捐赠《临沭县志》（1993年版）、《临沭县志（1986—2007）》《沂蒙革命根据地志》《临沭文化概览》等志书共计994本（套），价值38.8万元，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 临沭柳庄《靖氏族谱》出版发行。近日，《靖氏族谱》在临沭县青云镇柳庄村举行首发仪式。来自湖北、河北、江苏等省及省内其他地市的部分靖氏族代表，本村靖族人共100余人参加首发仪式。柳庄《靖氏族谱》历时4载编纂而成书，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30.7万字，详细记载了柳庄靖氏的起源、发展、繁衍及现状，内容丰富、翔实。

🔴 《临沭县志（1986—2007）》获山东省优秀史志成果奖。近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山东省优秀史志成果奖的通报》，《临沭县志（1986—2007）》获“优秀市县级志书”奖，

是全市唯一获此奖的县志。

《临沭县志（1986—2007）》为《临沭县志》（1993年版）之续志，由临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全书分篇、章、节、目4个层次，卷首设序、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设29编，卷尾设人物、附录、编后记，共计187.5万字。全面记述了1986至2007年间，临沭县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临沭提供了丰富、翔实、可靠的地情资料。

🔴 沂水县方志馆被评为全省优秀方志馆。近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山东省优秀史志成果奖的通报》，沂水县方志馆被评为全省优秀方志馆。沂水县方志馆是沂水县史志办室内设的从事史志文献资料收藏、管理、服务的工作机构，始建于2005年。目前，县方志馆馆藏图书6000余册，碑文及摩崖石刻拓片100余幅，书画作品30余件。

🔴 《费县金星砚》出版。4月27日，由费县史志办历时两年多时间编纂的《费县金星砚》出版。《费县金星砚》设金星石的形成分布、石质特色、设计与雕刻、鉴赏与收藏等9章，共21.5万字，采用彩色印刷，图文并茂地展示了200余名方砚，为金星砚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 烟台市芝罘区到沂水县考察交流史志工作。5月7日，烟台市芝罘区史志办到沂水县考察交流地方史志工作。考察过程中，沂水县史志办介绍了县史志办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基本情况，二轮修志中的经验做法，落实上级“一年一鉴”工作要求情况以及县方志馆、地情资料库、县情网站建设和开通史志官方微信平台等方面的情况。座谈中，双方还就如何更好地发挥史志工作“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